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學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0.2

2020年6月 第2期 (总第86期) 第22卷
June 2020 No.2 Sum.86 Vol.22

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二〇二〇年第二期(总第八十六期)

云南社院传达学习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国华调研学院时的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措施



7月1日，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省社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传达学习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国华到省社院走访调研座谈时的讲话精神。省社院党组书记蔡勇传达了张国华部长的讲话精神，并就贯彻落实好讲话精神提出要求。常务副院长何云葵主持会议。

蔡勇指出，张国华部长走访调研省社院，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社院工作情况汇报，充分体现了省委对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和省社院建设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省委统战部对省社院的关心和厚爱。张国华部长对省社院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不断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大力加强科研能力建设，开拓创新对外交流等学院工作，以及为云南省党外干部培养、成长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这为学院全体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提振了信心。张国华部长对进一步做好省社院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创新发展办学、坚持从严治院、坚持开门办学”的指示要求，为今后省社院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蔡勇要求，全体教职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求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深入学习领会张国华部长讲话精神的基础上，针对“四个坚持”的要求，结合学院及处室实际，认真思考谋划，拿出实实在在的贯彻落实措施，持续推进落实，把张国华部长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推动学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学院副院长陈友康，党组成员、副院长杨春禄，一级巡视员袁光兴，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学院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

（文字：肖莉莉 图片：黄存书 责编：罗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0年第2期(总第86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侯晓芳
钟瑞华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郭进华
编 务:刘林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 赵 宇, 杨燕芸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及启示

——以德宏州盈江县石梯村为例 杨海东 (10)

●统战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创新发展 史 苏 (16)

统战教育方法的历史演进与创新发展 刘 杰 (24)

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强国中的功能与使命

——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为分析视角 朱益飞 (30)

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现实挑战及可能路径 徐 敏 (36)

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溪地区统战工作的做法与启示 陈从林, 段燕青 (43)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

李维汉对政协协商民主建构的思想贡献探析 秦泽念 (50)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综述 黎 园 (54)

●民族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内涵、诉求及其策略 武永江 (60)

多民族杂居区族际交往与民族团结研究

——以云南省孟连县回俄村为例 罗利群, 郝月梅 (68)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8*2020-06]

互惠与共荣：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各民族互助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马喜梅，官秀娟，杨佳 (76)

●历史文化

《论语》为政之道对新时代从严治党的启示 刘华荣，王雄刚 (82)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方式研究 李一冉 (89)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路径与融合发展启示 成正，熊必军 (96)

科技文化导向下的和谐生态伦理的建构 许 烨 (103)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贺麟文化观探析 龙 飞 (109)

●发展研究

中缅关系 70 年的经验启示 林 永，杨宝康 (116)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2, 2020

Contents

Learning and Performing th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es in Yunnan

- Enhancing Studies on Local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n Border Areas Mainly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 Zhao Yu, Yang Yanyun (5)
- Practice with Inspi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n Border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A Case of Shiti Village in Yingjiang County in Dehong
..... Yang Haidong (10)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Front

- Onward Innov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s Leadership Ideology Enlightened by Marxism's Localization in
China Shi Su (16)
-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The United Front's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in Retrospect Liu Jie (24)
- Non-CPC Intellectuals' Roles and Missions in the Growth of a Cultural N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Gramsci's
Idea of Organic Intelligentsia Zhu Yifei (30)
- The United Front's Work with New-Media Elit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ctual Challenges and Measures
..... Xu Min (36)
-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ractical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in Yuxi in Early Tim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 R. China Chen Conglin, Duan Yanqing (43)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New Type of Political Party's System

- Li Weihan's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CPPCC's Ideology 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 Qin Zenian(50)
- A Review on Studies of Democratic Parties' Social Commitment Li Yuan (54)

Ethnic Affairs

- Consoli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hared Identity: The Emotion, Appeal and Fulfilling Strategy
..... Wu Yongjiang (60)
- A Study of Cross-Group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Solidarity in Multi-ethnic Community: A Case of
Huie Village in Menglian County in Yunnan Luo Liqun, Hao Yuemei (68)
- Mutual Benefits and Shared Prosperity: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Multi-ethnic Assisted Development
in Yunna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 R. China Ma Ximei, Guan Xiujuan, Yang Jia (76)

Historical Culture

- Revelation of the Governance Idea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on the Party's Exercise of Strict Self-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Liu Huarong, Wang Xionggang (82)
- A Review on Communication Way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
..... Li Yiran (89)
- Reflections on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for
Cross-Strait Cultural Exchange Cheng Zheng, Xiong Bijun (96)
- Establishment of Ethics of the Harmonious Ecology Steer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u Ye (103)
- Analysis of He Lin's Cultural Outlook Motivated by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nfidence Long Fei (109)

Development Studies

- Experiential Revelation of 70 Years' Sino-Myanmar Relation Lin Yong, Yang Baokang (116)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

赵宇, 杨燕芸

(大理州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殷切嘱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布局,明确“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民族团结进步是云南最可宝贵的财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齐心协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全面创建“平安城市、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开展好“美丽幸福家园”“提升人居环境”活动,实施好“兴边富民”“边疆美丽乡村示范”等行动计划。云南各地涌现出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和谐发展典型示范,彰显祖国大家庭各民族和睦相处一家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关键词: 云南; 民族地区; 治理能力;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05-05

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昭通、大理、昆明等地,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五年来,全省各族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顺应新时代把握好省情,全面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抓实“三个定位”战略目标,强化“五个着力”发展举措,齐心协力、砥砺奋斗,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跨越发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等重要经济指标翻两番。

2020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传统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再一次来到云南腾冲、昆明等地看望各族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倾听群众心声,了解云南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乡村振兴、对外开放交流以及历史传统文化红色传承等方面的情况后,就云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自由贸易区建设、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激发奋进新时代的力量等方面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对云南省情和区位优势发展的基本定位把脉,为我们指明了努力奋斗前进的方向。

一、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必须正确把握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大势,明确奋斗方向

1. 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战略定力。新中国成立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者简介: 赵宇,大理州社会主义学院行管法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宗教文化、法学理论;杨燕芸,大理州社会主义学院经济管理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经济学理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与机遇并存。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祸及全世界,这是一场大考。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举国动员、团结一致抗击新冠病毒,以医护人员为代表的人民英雄逆行出征作出巨大的牺牲,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定性胜利。但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如何恢复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健全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完善科技创新医疗服务体系等问题,已经摆上议事日程。

不管何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方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砥砺前行、永远奋斗。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党员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战略定力,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明确新时代党和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

2.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是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胜利之年。但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前景更加美好。边疆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还要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健全完善减贫长效机制,培育新兴产业,培育贫困地区人口增收渠道,强化民族地区发展动力,推进新时代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正如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继续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幸福生活、砥砺前行。“幸福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党的十九大已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宏伟蓝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砥砺前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坚持不懈、奋斗到底,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在前进的征途上,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美好前景。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偏离方向、走错路。最关键的就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最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体部署,坚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贯彻落实到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当中去。

二、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这是我国最高利益所在和根本要求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腾冲、昆明等地作出重要指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云南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① 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如何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作出总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我们正确把握云南省情、明确发展方向,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能力。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创新,关键是要贯彻落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地方基层治理生动实践,善于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决胜脱贫、助力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牢基础。

1. 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是我国最高利益所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团结进步、和谐共融,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最高利益。党和国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方针、依法保证各民族权益,坚持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① 云南网:《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2020年3月2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019649257340747&wfr=spider&for=pc>, 2020年4月3日。

做到统一与自治相结合, 坚持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认同, 是最深层次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明确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思路。在抓好民族工作中我们看到,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基础工程; 坚持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制度,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好治理工作的根本方针;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3. 民族团结进步是云南最可宝贵的财富。云南全省辖 16 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 其中包括 8 个民族自治州、29 个民族自治县。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包括 51 个民族成份、26 个世居民族、15 个特有民族、11 个直过民族、16 个跨境民族,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强、达到 1800 余万人。民族众多、宗教文化多元, 各民族分布居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5 个县市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 边界线长达 4060 公里。这是基本省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云南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布局, 齐心协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全面创建“平安城市、平安乡村、平安社区”, 开展好“美丽幸福家园”“提升人居环境”活动, 实施好“兴边富民”“边疆美丽乡村示范”等行动计划。全省各地涌现出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和谐发展典型示范地方, 充分彰显祖国大家庭各民族和睦相处一家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团结精神和亲密氛围。目前, 努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已成为云南常态。

为此, 全省上下一致全面协调统筹城乡建设,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施好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战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 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 突出重心下移, 强化社区村委会(村组、小区)基层组织建设。坚持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原则和协商民主制度, 坚持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重视研究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特殊性复杂性长期性, 协同各方力量, 健全完善城乡社会治理制度机制, 实施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协同治理,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 落实到边疆民族地区村村寨寨, 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 成为新时代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

三、积极探索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路径——以云南大理为例

(一) 大理州的基本州情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滇西, 东连楚雄州, 南接普洱、临沧两市, 西通保山市、怒江州, 北达丽江市、迪庆州, 其地缘中心作用十分明显。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州府所在地大理市是滇西中心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节点。

历史上大理就是云南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 是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是中华文明与东南亚、南亚文明的交汇点。秦汉王朝经营西南夷在大理设置县,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在大理建立都城, 元明清以后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新中国成立以后大理进入最好发展时期。

大理州辖 11 县 1 市, 包括 112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143 个社区村委会, 3 个自治县、11 个民族乡、1300 多个民族村寨。全州总人口 363 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189 万人, 占 51.8%, 13 个世居民族、47 个民族成份。各民族团结进步、和谐相处、宗教文化共融, 州内世居民族主要是汉族、白族、彝族、回族、傈僳族、苗族、壮族、纳西族、阿昌族、拉祜族、布朗族、傣族、藏族等, 分布和居住同样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特点。2019 年, 大理州国民生产总值 1345 亿元, 年均增长 8.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3.26 亿元, 年均增长 6.6%;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2582

元,年均增长9.5%,减贫41.3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28%;洱海保护治理投入资金270亿元,洱海水质全年7个月达到Ⅱ类,5个月Ⅲ类,森林覆盖率62.86%;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8:31:51。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二) 大理州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大理州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但在社会治理方面还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聚居乡村发展不足,决胜脱贫攻坚到了冲刺阶段,需要高质量脱贫巩固提升,洱海流域治理转型升级任务繁重,绿色发展产业支撑薄弱,乡村振兴、美丽幸福家园建设困难重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返乡创业人员不足,城乡基层组织治理工作和居民自治能力需要提升,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不确定因素影响复杂多变,黑恶势力尚未彻底铲除,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安全应急处置制度机制必须强化,社区村委会(小区、自然村组)治理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

(三) 大理州推进社会治理的路径建议

第一,坚持党和国家制度建设总体部署,健全完善城乡治理体系。要严格按照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好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部署和战略目标落实到边疆民族地区村村寨寨。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上下一致、固本强基、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改革创新、依法治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坚持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努力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发展、和谐包容、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美丽新家园。

第二,整合力量,上下联动,群策群力群治。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十分重视谋划辖区内社会治理工作,统揽各方、整合力量、上下联动、落实责任、服务到位。必须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村委会社区、村民小组自然村、小区片区和单位责任人岗位统一高效、精准到位、科学有序、智慧化网格化的治理机制模式。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协同治理、专业化治理。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把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支持群众性基层组织理事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包括爱国卫生运动、美化绿化、提升人居环境、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慈善事业、心理咨询、物业管理等。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民生工程投入,发挥好社会保障安全阀重要作用。健全完善应急处置各种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城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三,学习好“枫桥经验”,着力抓好建立健全社区村委会(自然村、村民小组、小区)治理制度机制。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落实村民自治制度,整合村民自治组织和社会各方力量,建立健全防范化解矛盾问题网格化治理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社会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以社区村委会治理为基础,重心下移,探索精准化治理机制模式;积极试点自然村、村民小组、小区、片区等最基层的治理网格化责任制,积极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有效施行精准、迅速、及时处置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的机制模式。同时,总结典型经验,带动示范推广。大理州要以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大理市南五里桥、漾濞县平坡村、云龙团结佬猷村、永平大坪坦村、剑川寺登村、鹤庆新华村等成功典型示范带动,善于总结经验成果,示范引领大理州乡村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推进。

第四,加强乡村“五网”(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物流网、地下管网)基础设施投入,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各级党委政府要长期规划乡村“五网”基础设施项目人财物投入,强化乡村治理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手段管控社会治安。建立区域人口信息库,精准掌握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信息动态。尤其城乡接合部,往往是社会治安问题高发地带,必须配齐智能化防范、监测信息技术设施。必须建立健全快速反应、处置应急有力的现代化治理机制模式和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队伍。

第五,城乡统筹、全面协调发展。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数字化建设、滇西

中心城市建设、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事业,整合资源、共同发力、全面协调推进。尤其是要加大边远山区直过少数民族村寨帮扶,继续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计划、民族团结进步“586”工程、文明乡村示范创建等,给予民族地区优惠政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要求,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各民族。

第六,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磅礴力量。把握话语主导权、唱响主旋律,必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经常性地开展“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教育活动。中国文明崛起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明确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因素。要在全社会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活动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教材、进互联网、进公共场所、进宗教场所等。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各类国民教育校园中开展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红色文化教学活动。

第七,加快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解决好社会矛盾问题。要坚决按照省委州政府总体部署,“把大理打造成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基地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围绕抓实洱海保护、脱贫攻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四件大事,打响绿色食品、清洁能源和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大品牌,坚持以洱海保护治理统揽全州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进步。以洱海流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生态优先、节能环保、防治污染的原则,统一规划洱海流域产业结构布局,使传统粗放型农业生产向集约化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加快环洱海地区绿色发展、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暨绿色发展战略,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大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业态。健全完善大数据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市场交易空间。以新兴产业支撑民族地区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幸福家园。

第八,始终高度重视民族村寨治理,培养一大批乡土人才。一是地方党委要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后备人才,要依靠民族干部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村村寨寨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二是注重培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和乡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带头人,支持知识青年、农民工和有识之士回乡创业,乡村治理必须打牢产业发展之基,种田能手、种植业养殖业专业户、农村合作社带头人、道德模范都是乡村治理的好帮手。三是要长期规划下派工作队,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都是乡村治理需要的干部队伍人才支撑。四是主动与诚信企业家合作,加工营销农产品。

第九,重视研究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要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深入挖掘、全面整理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文化美丽乡村旅游业态,促进贫困地区人口增收。支持全州1300余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寨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创建文明乡村,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移风易俗。做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工作,发挥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事关各项治理成败与否。要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依法自主办学。建立健全宗教界人士联系报告制度,善于团结宗教界人士,发挥好他们的带头示范治理作用。要十分重视全州60余个主要宗教场所的宗教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好具体生活困难。

第十,警钟长鸣、重拳出击,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及其他分裂势力。大理州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国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必须严防其颠覆、破坏、分裂、分化、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分子、暴恐分子、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和邪教组织,坚决反对台独、港独势力,坚决清除黑恶势力、走私贩毒、金融诈骗、偷越边境、传播病毒以及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配合中央为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解放军国防力量建设提供支持,坚决维护祖国边疆和谐稳定安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杨松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及启示

——以德宏州盈江县石梯村为例

杨海东

(中共德宏州委党校经济与管理教研室, 云南 芒市 678400)

摘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指南,也是云南各民族摆脱绝对贫困、同全国一道步入小康社会的保障。文章以云南边境线上的石梯村为案例,系统梳理了石梯村保护和修复“绿水青山”的途径,并归纳出石梯村实现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实践和启示。

关键词: 边疆民族地区; 石梯村;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2-0010-06

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及其意义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答问中全面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容:“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①“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与生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则阐明了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出现矛盾时,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优先,绝不走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的老路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强调的是生态资源,“金山银山”强调的是经济资本。生态资源不是直接的经济资本,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是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要旨。^②“绿水青山”包括水、土、树木、空气等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基础,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健康休闲等生态经济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基金项目: 云南省党校系统2019年度课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践及启示研究”(2019XTZS041)。

作者简介: 杨海东,中共德宏州委党校经济与管理教研室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民族经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② 王金南、苏洁琼、万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创新》,《环境保护》2017年第11期,第14页。

尤其对贫困地区而言，青山绿水、宜人景色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大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本。^①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生态自然资源丰富，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的美誉。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又提出，云南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驰而不息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指南，也是云南各民族与全国同步摆脱绝对贫困步入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二、石梯村保护和修复“绿水青山”的途径

石梯村因茶马古道途经此地，商队为通行在陡峭的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是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一个村组，位于中缅边境大山脊梁，与缅甸山水相连，边境线长24.7公里，占中缅边境线总长的1.13%，是南方古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内终点和迈向国际的起点。截至2018年底，石梯村共有人口85户347人，村内主要聚居有景颇族和傣族，是典型的直过民族聚居地区之一。2014年，石梯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6户162人，贫困发生率高达50.50%，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属典型的滇西集中连片贫困山区。近年来，石梯村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恢复了“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

（一）扶持发展，引导植树造林

由于受历史、人文、区位等因素影响，石梯村群众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落后，长期处于“砍一山、种一坡、收一箩”的低效生产状况。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扶持形式，以退耕还林、引种经济林木等方式鼓励石梯村民植树造林；以免费发放化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粗放低效的生产方式，终结了该村的刀耕火种。现今，石梯村民把原有的刀耕火种土地改种名贵树木或经济林木，如种植橡胶、坚果、咖啡、茶叶、西南桦等。植树造林既改变了石梯昔日毁林烧山的粗放落后生产方式，也使曾经的“光头山”和“黄土地”再现树木，绿水青山的自然原貌逐步得以还原。

（二）推广新作物，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香茅草是一种用于提取香料的经济作物，适合于温热、潮湿的地区种植。石梯村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种植香茅草。香茅草种植资金投入低且经济收益高，深受石梯村民推崇。截至2003年底，石梯香茅草种植面积达3400多亩，约占全村林地和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香茅草成为了石梯村民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但是香茅草烤炼加工需耗费大量木材，对生态植被破坏严重。调查得知，烤1亩香茅草需要耗费木材750千克，3400多亩的香茅草，一年约消耗石梯地区木材255万千克。自2005年起始，盈江县有关部门发文通知石梯村民不许再扩种香茅草，尤其是在2012年后采取严厉措施取缔香茅草种植，并大力推广咖啡、坚果、荔枝等经济作物。截至2018年底，石梯村种植有咖啡923.5亩、坚果1249.5亩、橡胶341.5亩、荔枝181.5亩。经济林果逐渐替代了香茅草种植，石梯农业种植结构得以优化，森林逐步得以恢复。

（三）制定奖惩机制，以制度护林管林

制度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并要求共同遵循的准则或章程。无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规章制度是有序开展生产活动、实现发展的保障。护林管林关键之一就是要让人的行为受到一定的秩序制约，伐木者可依法受惩治，护林爱林者有章可奖。石梯村建立了明确的奖惩机制，将保护生态环境内容纳入党员积分、“最美+”等评选活动，对于捕鸟、砍树等破坏生态行为，发现一起扭送一起。

^① 陈吉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好环保扶贫攻坚战》，《中国环境报》2015年10月19日，第1版。

对于随意开荒的人员,责令恢复的同时处罚2000元交村民理事会,并上报森林公安等相关部门。对于主动举报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给予200—2000元奖励。村规民约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村民要“保护生态、爱护森林、爱护鸟类、不砍伐树木”。通过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村民的砍树、打鸟等破坏生态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护林护鸟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得到强化。

(四) 成立护林护鸟团队,以专人巡查监管

石梯村位于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洪崩河片区,与缅甸沟壑相连,森林植被密布,地形陡峭复杂,护林范围广、难度大。为了实现护林护鸟的目的,盈江县有关部门筹措和整合资金,在石梯村专门成立了护林队和护鸟队。目前,石梯村护林队和护鸟队成员共14人,其中护林员10人、护鸟员4人,护林人员每年可获10000元的经济收入补贴,护鸟人员每年可获4000元的经济收入补贴。护林员和护鸟员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进山入林巡查,一经发现有砍伐树木或打鸟者立即告知森林公安或村组等部门进行处置。2017年12月7日,两名违法嫌疑人潜入石梯村捕鸟,护鸟员余某等将涉案人员扭送公安机关。护林队和护鸟队每天行走山林,在护林护鸟中起到了“前哨员、信息员、监督员”作用,对砍树打鸟者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力,有效地杜绝了各种破坏生态的行为。

(五) 进村入户宣传,培育村民护林爱鸟意识

石梯村景颇族和傈僳族长期以来“靠山吃山”,以砍树打鸟为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为了培育和树立石梯村民爱护自然和保护生态的思想意识,盈江县有关部门与当地民众同心协力,多措并举开展护林爱鸟宣传活动。一是进村入户开展护林爱鸟宣传。盈江县有关部门采取经常性和多频次的方式进村入户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播放和张贴犀鸟录像和画贴,发放明星鸟种^①宣传画册。林业部门还以“拍到一张野生动物照片奖励60元、发现一个鸟窝奖励50元”的方式,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爱鸟护鸟行动。二是充分发挥护林员和护鸟员的宣传作用。聘请石梯村民做护林员或护鸟员,他们在与家人或亲友接触中直接或间接地宣传了护林护鸟的各类知识,形成了以身边人、身边事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在筑牢全村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中起着重要作用。三是以通俗语言开展护林爱鸟宣传。组织党员、妇女、“草根名嘴”等,采取“汉语+民族语言”、小品和歌舞等形式进寨子、进农家、进田头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用“要致富,少砍木头多种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通俗语言,把政策讲得“有嚼头、有盼头”,让群众主动放下“油锯、斧头、砍刀、兽夹”等过去赖以生存的“家当”,自觉投身于生态保护中,实现了“旧习惯”向“新理念”的蜕变。

三、石梯村实现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实践

石梯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优先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整合石梯村生态美和物种多元的自然资源优势,围绕“生态、绿色、康体、宜居”的发展理念,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把石梯村打造成“中国犀鸟谷”,并以“中国犀鸟谷”为核心发展乡村旅游业,提高“绿水青山”的附加值,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和多业态联动发展。截至2018年底,石梯村常住人口可支配收入从原来不足2000元增加到8000多元,贫困发生率从50.5%降到了1%以下。石梯村改变了昔日砍树烧山遍地开荒且生活贫穷落后面貌,走出了一条“以鸟为媒,把青山装进钱袋子”“卖风景、促脱贫”的好路子。

(一) 多措并举,全方位宣传石梯村

石梯村地处中缅边界高山脊梁,交通闭塞、地域封闭、人流稀少,外界影响有限。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石梯村“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是石梯村从“绿水青山”实现“金山银山”转变的关键前提。据此,盈江县通过网上报道、报纸刊登、视频宣传、举办赛

^① 据石梯村民讲述,“明星鸟”是指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或未出现的鸟种。

事、微信转发等形式全媒体全方位大力宣传，不断提升石梯村“绿水青山”的外界知晓度。

1. 利用报刊、网络开展宣传。网络搜索显示，自2015年8月至2019年10月，《云南日报》《德宏团结报》《科技日报》及“掌上德宏”等传统及网络媒体报道有关石梯村“绿水青山”信息13篇。各媒体公开报道文章数处于连年不断递增趋势，报道内容涉及石梯村的历史、民族风情、生态环境、丰富物产等。这些媒体以精美的图片和优美的文字宣传了石梯之美，为世界各地旅客了解石梯、认知石梯提供了丰富资料参考。

2. 利用赛事提高知名度。盈江县通过举办“犀鸟谷杯”国际观鸟挑战赛、中国犀鸟保育国际研讨会等活动吸引全球各地游客。比如2019年4月9日至12日，盈江县举办第四届国际观鸟节暨“犀鸟谷杯”国际观鸟挑战赛，吸引了我国各地及美国、加拿大等国300余名爱鸟人士参加。活动赛事公告的发布和选手的报名参赛，是提升地区知名度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赛程结束后，参赛者的亲历体验和感受经其传予他人，又进一步扩大了石梯村在外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 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扩大宣传范围。人手一部手机，看手机、刷微信朋友圈已成当今大部分中国人每天生活或休闲的重要方式。微信朋友圈以“朋友”形式传递各种信息，由于熟人关系而使得其信息受关注度高，且微信朋友圈以“朋友传朋友，朋友再传朋友”方式滚雪球般地将信息传予不同的人或人群，使得信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石梯村在向外宣传中充分利用了微信朋友圈的信息传播优势，鼓励村民在朋友圈发图片和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文章，全方位地提高石梯村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例如，2018年9月，石梯村民排中华拍摄到明星鸟——红腿小隼，分享在其朋友圈，在朋友圈转发传播下，在极短时间内就被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我国各地的爱鸟人士知晓。

（二）打造品牌，提高石梯村对外吸引力

旅游是一种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成为广大民众休闲、康养和娱乐的重要方式。旅游消费市场需求旺盛，各地纷纷以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抓手，不断挖掘、包装和开发各种旅游资源，如古色资源、红色资源、绿色资源等。但在激烈的旅游产品竞争市场中，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旅游精品，很难在纷繁的旅游市场中分到一杯羹，甚至还造成一些无效投资。石梯村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大力打造“中国犀鸟谷”品牌，以品牌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了石梯村“绿水青山”的对外吸引力。

1. 清晰定位发展特色。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以“游”养身、养心的康养旅游深受游客青睐。石梯村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鸟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常年有双角犀鸟、冠斑犀鸟和花冠皱盔犀鸟定居栖息。据此，石梯村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清晰定位，以犀鸟为旅游业发展的承载标杆，打造出“中国犀鸟谷”品牌，用“观鸟+康体养身”“观鸟+休闲娱乐”形式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2. 强化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石梯村是集驿道文化、民族文化和抵边文化于一体的地区，通过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有力地增强了石梯村的吸引力。一是驿道文化与旅游融合。石梯村是中国南方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内终点和迈向国际的起点，保存有数百年历史的马帮驿道。通过挖掘、修整古道历史遗存，以观光和体验形式把石梯村驿道文化融入旅游业开发。二是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石梯村聚居的景颇族和傈僳族都是我国的古老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淀有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通过修复和重建景颇族和傈僳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开发利用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傈僳族阔时节等节庆民俗的旅游文化价值，以观光民族传统建筑和参与民族节庆活动等形式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三是抵边文化与旅游融合。石梯村地处中缅交界，与缅甸山水相连，有35、36、37、38号国界庄。当前石梯村通过修建观景台眺望缅甸的村寨形貌、山川河流和种植作物等感受和体验异国风情。

3. 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关心帮助下，石梯村全面开

展易地扶贫搬迁和边境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共投入建设资金3736.86万元,其中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577.33万元、民房建设资金1059.53万元、产业发展资金100万元。现在石梯村内水泥路面四通八达,自来水和电力已接通家家户户,手机信号全面覆盖,昔日的“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原始落后局面已得到全面改善。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旅客前往石梯村吃、住、行、游等提供了便利和舒适的条件。

(三) 发展服务业,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石梯村以“中国犀鸟谷”品牌吸引全国各地爱鸟者前往观鸟,村民在向观鸟者提供餐饮、民宿等服务中扩充经济来源渠道,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中实现了经济增收。

1. 发展民宿和餐饮服务业。在“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吸引下,大量旅客来到石梯村,刺激了当地民宿和饮食业发展。当前,石梯村有农家民宿15户,有客房30余间,客栈都是集住宿与饮食为一体,全村约定有统一的价格标准。民宿按照是否配备卫生间分为两档价格,配有卫生间的100元/天,未配卫生间的80元/天。民宿发展实现了“民房变资本”,有效地激活了农民的存量资产,为农民经济的稳收、增收提供了可能。餐饮食材主要以村民自种和自养的产品为主,早餐10元/人,中餐和晚餐25元/人。通过向旅客提供餐饮,石梯村农民既可从食材加工中获得部分服务费,又得以销售自产的农产品,解决了长期以来农产品卖不到好价或卖不出去的难题。

2. 提供鸟塘、鸟导^①服务。鸟是石梯村吸引世界各地旅客前往的最靓丽名片。石梯村民以做“鸟导”或提供观鸟点“鸟塘”等服务获取相关报酬,形成了“以鸟为谋”的新兴就业机会。鸟塘是村民在自有林地里寻址搭建的“窝棚”,村民每天早、中、晚三次去投放面包虫,待发现有明星鸟就以拍照上传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告知各地观鸟爱好者,有人来拍照即可以收取每人每天60元的费用。2018年,石梯村民排中华因其鸟塘发现明星鸟而吸引世界各地爱鸟者簇拥前往,一个鸟塘收入就达4万多元。目前,石梯村共建有鸟塘25个,2018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1200人次,每个鸟塘平均收入约1万元。

3. 开展旅客接送服务。石梯村地处中缅交界,远离县城和集镇。旅客从芒市机场、腾冲驼峰机场或盈江车站前往石梯村都有一定的距离,且都没有直达客车。为了便于旅客前往石梯村,石梯村民自行组建车队接送旅客,车队根据里程制定了明细的接送费用标准,从芒市机场到石梯村每车次700元,腾冲驼峰机场到石梯村每车次600元,盈江客运站到石梯村每车次300元。接送车队的组建,既便利了旅客前往石梯村,石梯村民也以提供接送服务的形式获得了经济增收的新渠道。2018年2月到4月,石梯村蔡老五用其微型车接送往来游客40余次,获得近4万元的接送服务收入。

四、石梯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启示

石梯村通过“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了“砍树人变成护林人,狩猎人变成护鸟人,贫困人变成‘鸟’导游,贫困村变成旅游村”的可喜“四变”。改变了原本村民经济收入来源单一和效益低下的生产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思维定式,走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发展路子。从石梯村的发展蝶变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修复和保护生态的根本保证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和强化责任落实是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实现“绿水青山”的关键抓手,也是有力支持“绿

^① 鸟塘:指村民在自有林地里寻址搭建的“窝棚”,旅客可以在“鸟塘”坐息观鸟。鸟导:指引导旅客观鸟,并提供背负摄像机等服务的人。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重要保障。一是要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管发展的、管生产的、管行业的都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落实好环境保护责任，完善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实行严格问责机制；二是要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预警制度，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三是要坚持不断强化基层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二）坚持上下联动是实现修复和保护生态的关键着力点

生态与农业、工业等都有紧密关联，生态保护和修复实践将会使部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者的既得利益受损。因此，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高位推进与上下联动，并在长期的协同合力下才能取得实效。一是高位推进，建立和完善生态文化制度的顶层设计。引入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完善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管理制度，把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轨道，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障各项保护环境和修复生态工程落地实施和有序推进。二是上下联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发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让群众成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主体而获得更多参与感、认同感；在生态保护和修复中，要始终坚持为了群众、服务群众，协同推进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让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三）创新宣传方式是“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前提

生态资源是自然资本，自然资本要转化为经济资本才能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宣传是提升地区知名度和美誉度而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关键举措，是自然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的纽带和桥梁。边疆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地域闭塞、经济欠发达，长期处于“酒香却巷子深”的窘境。创新宣传方式，利用网络、报刊和微信平台等全方位全领域和多层次地宣传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有力抓手。一是准确定位，明确地区发展优势和特色，打造品牌并以品牌为载体，大力进行全媒体宣传报道；二是深度挖掘地区特色文化，推进生态文化和民族文化等融合开发，提升旅游产品附加值；三是充分利用自媒体优势，积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宣传报道，拓宽宣传报道渠道。

（四）改善民生是“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具体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边疆民族地区民众的生计资本主要源于发展种养业，其中种植业是满足物质资料需求的主要方式。坚持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在生态修复和保护中培育民众获取生存物质资料的新路径，群众才会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一是要完善退耕还林还草等农业生产补偿机制，确保民众耕地变林地后，仍能以补贴形式实现收入来源有保障；二是要大力开发护林员、护边员等就业岗位，实现边疆民族人口就近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扩充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收入来源渠道；三是要在生态保护中探求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转化路径，依托生态多样性大力发展绿色旅游业，打造绿色旅游品牌，发挥民族文化和抵边文化等资源优势，加大生态和人文等优势资源的整合开发力度，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附加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资产变资本，增加经济收入来源；四是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力改善交通、通信、水电、民居等，增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能力；五是要结合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推广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优化农业种养结构，改变传统落后低效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产业发展兴旺，增强农民经济持续发展能力。

责任编辑：杨松禄

统战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统一战线 领导权思想的创新发展

史 苏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 关系统一战线的前途方向, 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的过程, 是我们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争取与巩固、坚持与完善的历史嬗变过程。从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创新、实践镜鉴考察, 制度创立、基本完善定型, 到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格局体制、功能作用、领导方式、指导方针上的创新发展, 为加强党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体制构建, 制度机制完善, 党委主体责任落实, 推动统战工作的协调创新发展, 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统一战线; 领导权思想; 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2-0016-08

在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 领导权问题始终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面对当前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前所未有之形势, 统一战线的作用更加重要, 统战工作的任务更加繁重, 加强党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领导, 仍然是最根本的问题。本文基于目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化发展的历史嬗变入手, 对理论发展、实践经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 聚焦新时代, 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中有关统一战线领导权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 用于指导实践, 对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及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一) 基本研究概貌

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传入中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了居“三个法宝”^①之首的统一战线, 并在领导权问题上不断探索实践, 初步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1985年2月, 习仲勋在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上指出, “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 是一门科学。”^②此后, 统战理论研究被纳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统一战线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域下公众价值观变迁及调适问题研究”(19BKS085); 2018年辽宁省统战理论研究立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与战略意蕴研究”(20180033)。

作者简介: 史苏, 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研究员,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研究。

① 《毛泽东著作选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 第138页。

②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338页。

作的重要内容中，学术界和统战工作者开始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研究。直至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对统一战线的地位作出了三个“重要法宝”的新表述。^①，领导权问题仍然是统一战线中最为根本的问题，而且更加重要，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引起学术界和统战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笔者以2000年到2019年为分析周期，在中国知网“全国论文数据库”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为篇名检索，没有搜索到相关的论篇；分别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统一战线领导权”等为主题检索，梳理出相关的期刊文章和博士、硕士论文不足30篇。其中，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论述的4篇、研究领导权思想的1篇，其他研究党与某个时期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4篇、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6篇、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9篇，仅有3篇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虽然学术界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已在一些层面展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基本代表了此领域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概貌，但是，以论述某个时期或某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观点居多，涉及领导权的问题时，大多是在文章的某个段落进行简述，进行系统研究和关注的还不多。目前，还没有发现国外和海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主要成果观点

有关学者的论文著述中，涉及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魏晓东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究”，对统一战线历史的演进，从争取到争取和巩固，再到巩固和完善的三个阶段，阐述了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实现过程复杂而不断完善，不但要坚持反对“左”右倾错误，还离不开工农联盟的支持，并且要有大思维、大智慧。^②张献生总结70年统一战线的经验，得出结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存在。他从凝聚人心和力量的角度，指出我们党对统一战线的引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认同上。^③吴丽萍、王蔚提出了“从保证统一战线正确政治方向着眼明确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贯穿着不可逾越的底线标准”^④，这个底线就是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政治上的领导。杨卫敏认为，统一战线本质上是“党的主要领导方式”“执政的资源 and 政治优势”^⑤。包心鉴则认为，统一战线“是政治制度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制度的本质体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一致性与多样性之中。^⑥概括以上研究观点，表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始终存在，并且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领导，在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思想政治共识，确保统一战线正确的政治方向。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多数论者还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的某个历史时期、某位领导人或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的研究阐述，抑或是简短评语，还是游走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的边缘地带，但是基本系统呈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创新研究的全貌。

（三）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要防范和化解各领域的重大风险，这同样也是统一战线面临的风险和考

^①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② 魏晓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第99—107页。

^③ 张献生：《凝心聚力：统一战线的根本功能和价值所在——新中国70年统一战线的经验和启示》，《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15页。

^④ 吴丽萍、王蔚：《习近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理论视野》2019年第8期，第48页。

^⑤ 杨卫敏：《试论新形势下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实现问题》，《统战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期，第12页。

^⑥ 包心鉴：《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纲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第8—9页。

验。统一战线是一个拥有包括不同政党、团体、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数亿成员在内的政治联盟,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这一重大思想论断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镜鉴作出的重大判断。现实中不重视统一战线、不重视统战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学界多偏重于理论上的学术研究,实务界又多偏重于工作上的实践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的创新成果与实践紧密融合,特别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领导权理论,在工作实践中落实落地,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时代课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在历史嬗变中是以何种姿态出场的?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思想中国化发展的创新是什么,其在新时代是如何实现的?这都是本文的关切点,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中国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战略作了全面阐述,其核心是:无产阶级必须加强自身的团结统一,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标志着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的诞生,也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建立并领导苏联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提出了革命工人阶级联合社会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孕育了统一战线必须由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领导的观点。1905年4月,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中起领袖和领导者作用的使命。”^①其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在民主革命中充当领导者,无产阶级要实现领导权,就必须把农民当作自己可靠的同盟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同时必须孤立资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列宁第一次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动力、道路和前途,对于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们党实现统一战线的领导,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发展历程,可以从三个阶段来梳理其历史嬗变。

(一) 争取与失去领导权

这一阶段主要是大革命时期。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无产阶级政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不是附属资产阶级的,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最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争取领导权,有了初步的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过努力争取,党在局部获得了一些领导权,赢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使得此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权成为可能。然而,由于党的四大只是认识到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没有在实现方式上作出具体回答,因而在合作的后期,我们党对于通过武装斗争建立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也缺乏认识,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思想影响下,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不但没有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反而极力为自己的右倾妥协退让辩护,毛泽东等人始终坚持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并坚信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率领同盟者斗争并取得胜利,争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就是对统一战线分裂者进行坚决斗争。但是,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仍然坚持退让,使我们党无法摆脱右倾错误的影响,加上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上的附加条件——“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②,导致我们党在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斗争中的力量大大削弱,最终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下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破裂。

(二) 争取与巩固领导权

这一阶段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以前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党建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② 魏晓东:《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

立了局部政权，独立性大大增强，完成了由争取到巩固的转变。这时期主要是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到解放战争时期，巩固领导权成为当时党领导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

随着我们党对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①的决议。毛泽东继瓦窑堡会议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后，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不对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是错误的，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②这就是我们党当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争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决执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得这一阶段在争取领导权问题上成功的。所以，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③周恩来在研究了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及其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④

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有共产党员在实际行动中模范带头，表现出是群众的领导者，既要懂得争取别的党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继续合作，为一切革命同盟者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又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大量培养革命干部。这些争取和巩固领导权的方式，在后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正式发布为标志，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⑤然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政府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两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分裂，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纠正左右倾错误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断巩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这一时期，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巩固和共产党迅速成长的时期，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中逐渐成熟并不断发展。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是争取和巩固领导权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三）坚持与完善领导权

这时期主要是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八大以前。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重大转变是领导理念和领导方式方法上的转变，实质反映在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上，重点是通过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

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一部分，统战工作贯穿党所领导的工作的各个方面，^⑥必须全党上下一致努力，才能做好，而且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切实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此后的历次统战工作会议都对坚持党的领导进行了强调。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⑦其进一步强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不可以削弱，只能加强，这是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江泽民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核心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356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⑥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⑦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问题。胡锦涛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一步阐述了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些重要论述,都是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精髓,体现了党中央对党领导统一战线的重视程度呈螺旋式上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之前,随着理论创新与实践的发展,制度上从创立到基本定型形成了体系。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为坚持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代表性的文件主要有:《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199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200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200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等,都对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领导作出规定,指导和保证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和更加完善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进过程,是党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是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不断丰富和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创新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基础。

三、习近平开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全面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是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力、执行力和对统战成员的政治引领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统一战线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①等重要思想。这些重大理论创新,突出贯穿于格局体制、功能作用、制度体系和一致性与多样性方针等各个层面。

(一) 格局体制上的创新: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重要论述,与以往党的领导人对于领导权的论述相比,最大的创新点是提出了“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②,并强调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③同时,提出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这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在领导体制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中央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党委负有领导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省级党委统战部长一般由党委常委担任,强调了党委是统战工作的责任主体,体现了党在领导体制上的重大创新,为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提供了体制保障。要求党对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对象的领导实现全覆盖,统一战线是由“劳动者”“建设者”和“两个爱国者”12个方面^④的工作对象组成的政治联盟,意味着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范围进一步扩大,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贯穿全领域,尤其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培训、政治引导更为重要,是发挥统战法宝优势,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

(二) 功能作用上的创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

面对长期以来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对统一战线认识模糊甚至错误,部分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① 《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1页。

② 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3页。

③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④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第80页。

不重视统一战线、不会做统战工作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① 还指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② 并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题中之意，进一步确立了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核心地位。这些思想论断，源于对党领导统一战线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把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提升到了政治新高度。其充分表明，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尤其是促进执政和参政资源的丰富、执政和参政环境的优化、执政和参政方式的改善、执政和参政能力的提升，都需要党的政治引领。实现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引导广大统战成员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自觉跟党走。通过他们团结引导所联系的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巩固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三）法规制度上的创新：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在我国现代政治体制中，统一战线仍然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式，这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从制度层面来讲，统一战线的本质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突出体现为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法定的领导地位和制度安排，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成为党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战略优势。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③的伟大政治创造，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提高了统一战线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政治定位，辅之以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条例》和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政党协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等制度性文件，是党内法规和制度体系的重大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推进了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指导方针上的创新：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方针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④ 一致性是统一战线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之所在，是维系多样性和谐共处的根本保障。以往历史上的统战工作中，有的过分强调一致性，忽视多样性；有的忽视一致性，放任多样性，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基于两个极端的教训，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确定为统战工作的重大方针，是其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当前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一致性与多样性特点更加突出，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在一致性的基础上，根据多样性的特点，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贯穿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全过程和具体环节，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实现一致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大团结大联合，确保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能够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达到执政与参政、政治领导、凝聚力量、整合社会等目标的一致性，在统一战线体现“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重要保证。

四、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实践路径

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统战工作地位愈加重要，巩固和发展壮大统一战线，最根本的是要牢牢把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新时代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集中统一领导和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方向

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是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毛泽东在“三个法宝”思想中，首提党的建

① 《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56页。

② 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第303页。

③ 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第303页。

④ 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第303页。

是“伟大工程”，居于“三个法宝”的核心，正确理解了“三个法宝”相互关系的问题，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四个伟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②是根本保证，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同样不可或缺。统一战线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必须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党。

党的领导决定着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党领导统一战线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70余年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积极参与，任何革命和建设、改革事业也不会轻易取得成功。从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③，催生了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后实行的经济所有制制度改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都是党领导包括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因此，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④，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统一战线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⑤。贯彻《条例》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多地在省、市、县（区）三级落实了由党委常委担任或兼任统战部长的规定，成立了党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了大统战工作格局体系。在工作实践中，关键是要有破解统战工作职能不清、协调不顺等体制机制问题的能力和魄力，这要从体制上规范，尤其要进一步捋顺市、县（区）级党委统战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切实完善大统战领导体系，对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实行归口领导和管理，彻底解决在有的地方“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必须推动党政领导干部和统战干部的专业知识培训，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统战干部队伍，构建自觉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增强政治担当，提高妥善处理统战领域复杂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与水平。

（三）健全工作制度体系，完善长效运行机制

落实好党委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责，制度机制是保障。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得到加强，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有些制度机制还不够完善和优化，甚至没有落实落地。中央层面已经进行了顶层制度设计，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的制度更加定型的要求，关键是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推动者、协调者、落实者的重要职责，按照《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规定，健全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体系，形成长效机制。比如，完善各级党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协商民主规范化程序化制度机制、协商成果落实反馈机制，党外干部物色培养选拔使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民族、宗教工作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领域的社会化工作协调机制，以制度机制创新，进一步解决现行工作体制机制运行不畅、与新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实现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发展。

（四）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统战工作协调发展

统一战线协调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政治水平、政策水平，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把政策贯穿于政治引领、安排人事、联谊交友的始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在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增进共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关注统一战线成员的利益诉求，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做到用好一个人，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第164页。

④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64页。

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年，第9页。

赢得一片人心。提高统战工作专业政策水平，只有学习政策、宣传政策，才能善于运用政策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善于联谊交友，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方法，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是党对统一战线政治领导的实现形式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①，特别是面对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新媒体等领域的大量体制外党外人士，必须掌握联谊交友的艺术方法，做到善交、真交、会交，正确把握党的原则和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恪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底线，处以“公心”“公谊”交流交往。在与民营企业家交友中，做到尽职尽责，不搞利益输送，不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②

（五）增强统战政治意识，落实统战工作主体责任

要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对统战工作承担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承担第一责任，是《条例》规定的法定责任。党委重视不重视，认识高不高，特别是“一把手”统战意识强不强，是能否领导好和做好统战工作的关键。针对一直以来，有的地方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把统战工作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存在轻视和忽视统一战线、不重视统战工作的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委必须重视统一战线、做好统战工作的要求，切实强化全党抓统战的理念，增强统战政治意识，把统战工作摆上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落实《条例》规定的“四个带头”“三个纳入”^③是党的各级组织的职责所在，必须完善统战工作的领导体制和责任体系，真正扛起主体责任和政治责任，不断提升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水平。

落实基层党组织工作责任。党的基层组织是增强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的基础，负有做统战工作的职责，也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主体。作为特殊群众工作的统战工作大量在基层，工作重心必须下沉。各级党的基层组织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做好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改革发展创新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作出贡献；落实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④，把宗教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范畴，协助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好宗教事务，推动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政治意识和阵地意识，着力答疑解惑，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党的方针政策、文化娱乐、普法宣传、道德信仰等方面的宣传引领，把广大群众和统一战线成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人心向背、力量对比”问题的根本要求。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理论源泉和思想基础。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牢牢掌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中国化发展的创新成果，是指导和推动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社会整合、政治参与、民主协商、协调关系以及政治引领等工作实践的根本遵循。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巨大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必然。新时代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同心圆理论为主线，以更高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更宽的胸怀，守住统一战线的初心，担当统一战线的使命，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寻求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最大公约数，画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的最大半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广泛凝聚强大的力量，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中），第56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8页。

③ 《统一战线知识手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年，第308页。

④ 《统一战线知识手册》，第206页。

统战教育方法的历史演进与创新发

刘 杰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 统战教育是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主责主业, 统战教育方法的创新是当前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 开展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理论研究是开展统战教育创新的前提。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内涵, 概括起来是由方法创新主体、对象、方式、解决的问题、实现的目标共同构成。进入新时代, 为适应统一战线工作需要, 统战教育方法应着重从统战教育结构的层次性、统战教育授课的动态性、统战课程体系的连续性、统一战线认识实践的互补性等方面进行实践创新, 探索符合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规律的统战教育方法。

关键词: 统战教育; 方法创新; 内涵分析;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24-06

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社院)统战教育方法的创新是当前社院统战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统战教育的方法创新首先取决于统战教育方法理论根基的稳固和应用, 而对其概念内涵的深刻把握是进行理论与具体实践的首要问题。“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特有属性, 就是某类事物都具有而别的事物都不具有的那些属性。”^①统战教育有着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内在产生和发展规律, 抓其教育本质, 明晰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要素, 理清内部联系, 必须要通过社院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外部表现形态窥其根本属性, 探索指导其实践的重要理论根据。因此, 有必要先明确社院统战教育方法内涵, 进而为其教育创新提供有效对策。

一、统战教育方法的历史演进

“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②因而, 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增强斗争本领、从容面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环节。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统战教育的组织化

该时期全国各条战线的统战教育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 不同部门结合自身的工作特点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统战教育内容, 这为增进政治共识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3

作者简介: 刘杰,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 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与执政文化、党的领导与治理现代化研究。

① 金岳霖:《形式逻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15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4月30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6-04/30/c_1118772415.htm, 2019年8月20日。

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指出，工会要加强一般会员中政治教育，提高他们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使能在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目前特别在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中，自觉地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对机关和学校的工会组织中其他阶层和党派出身的脑力劳动者，则要进行适合于他们具体情况的团结、教育的工作。1954年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教育工作单列阐述，并同毛泽东同志讲的教育方法放在一起，如讲道理的方法、比赛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此时社院尚未建立，但不同战线上的统战教育方法探索一直从未间断，不仅强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还融入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统战教育在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社院成立与统战教育的多样化

1956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7年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学习问题上提出了七点要求：1. 把工作、学习和党性锻炼凝为一体；2. 党的立场一定要站稳；3. 政治方向一定要把稳；4. 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环节；5. 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6. 尽可能使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7. 依靠中央和党委的领导，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① 这为社院统战教育的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60—1962年，为克服暂时的困难而斗争的三年，减少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左”的错误做法的影响，提出了任务（改造世界观、进行形势教育），采用了新方法（“神仙会”），因而逐步出现了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不仅为保持这条战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克服暂时困难增加了助力。^② 这一时期，社院在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发挥统战教学和研究职能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多样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与统战教育的科学化

1979年8月15日，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自1963年以来，相隔十六年以后召开的一次全国规模的统战工作会议，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统战工作会议，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志在总结讲话时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为统战系统的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统战系统干部的积极性。乌兰夫指出，我们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统战系统和各单位的实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好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上来。为了顺利实现这个转移，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④ 在这一时期，统战教育在科学的指导思想引领下有序开展。

（四）新时代与统战教育的精准化

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59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第10页。

④ 邴文举、孙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49—1991）》，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2页。

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战教育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使命更加光荣。统战教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始终紧紧围绕“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开展,充分发挥统战教育功能,精准对接统战教育内容和统战工作需求,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二、统战教育方法创新内涵的审视

在众多学者对社院统战教育方法的实践基础上,透过方法实践的具体效果反观方法创新理论。笔者认为,在理清统战教育方法创新概念上,首先要把握统战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涉及的基本内容、解决的基本问题、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探讨其方法创新概念。统战教育过程是教育者(统战部门、社院等)根据统战工作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群体政治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推动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过程,包括教育主体(教育者)、教育客体(受教育者)、统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介体)。“教育主体是指教育过程中有目的地施加教育影响的教育者,教育客体则是指接受教育影响的受教育者。”^② 两者的双向互动过程构成统战教育过程。统战教育的介体是针对教育客体思想实际经过选择设计后,有目的、有步骤地向教育客体传授统战相关教学内容的各种方式与手段。在社院统战教育过程中,这三个要素贯穿其中相互制约、互相依赖、紧密相连,整个教育过程也是围绕不断解决这几个要素之间的矛盾无限循环的过程,而统战教育方法也是在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中不断得以创新的。由此,可将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内涵概括为:教育者针对统战教育对象、环境、目标、内容等变化所引起的统战教育方法的矛盾循环,在对统战教育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及时改进传统教育方法或创造新的教育方法,提高统战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持续性、统一性,从而更好地达成统战教育的目标的活动。

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统战教育方法的创新。1956年3月,全国政协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1956年4月,中央又签发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对于教育方式,明确在北京设立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人士的高等党校。在全国各地采取召开学习座谈会、举办业余政治学校(夜大学)、短期政治学校的方式组织学习。对于教育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讲道理的方法、比赛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也就是自由辩论、讲清道理的方法。^③ 统战教育方法创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适矛盾的实践过程。统战教育方法创新概念将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看作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整体,指出了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主体、客体、原因、根据、目的、目标和途径,分层次解析了统战教育方法创新内涵。

(一) 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主体

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主体是实施方法创新的统战教育者,他们依据统战教育环境、受教育群体自身情况等的变化对传统方法进行及时创新,做到历史继承性和现实革新的有机结合。有必要指出,社院不同于一般的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实施者,它是开展统战教育的专门机构,具有统战

^①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2015年5月20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2019年8月20日。

^②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③ 邴文举、孙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49—1991)》,第116、117页。

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主体地位，属于统战教育主体的范畴，而非全部，因为统战教育主体不一定是统战教育方法的创新者。因此，社院从事统战教育的教师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两种素质，可以随时捕捉到教育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准确分析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新变化，紧密联系这些变化，有针对性地辨析传统教育方法的不足和落后，及时对统战教育的基本内容进行加工重组，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教育方法。因此，社院统战教育者要注意培养自身的创新素质，不满足现有统战教育方法的执行状况及效果，善于对新问题、新方法进行探索，将创新融入教学科研的全过程，为统战教育创新的持续性、循环性、时效性打基础。

（二）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对象

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对象主要是指统战教育过程中不合时宜的旧方法。旧方法一般主要有两类：一是原有方法本身不佳，不适合统战教育要求和目标，需改变创新；二是原有方法正确，但由于教育环境或教育对象自身发生变化，这种方法的实效性逐渐削弱，无法达到统战教育的预期，需要调整教育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投向共产党，参加革命，探求真理。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创办了各种专业性的干部学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的指导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教育。^① 统战教育因时代而变，社院教育发展因统战课程而变。当前，传统的统战教育方法主要集中于理论灌输和中国革命史等相关知识的普及，缺乏统战教育课程体系的多样化设计。当今新兴媒体迅猛发展，若缺少统战教育课传统载体与新兴载体的有机融合，对各阶层、各党派、人民团体等统战教育对象的认识差异和接受能力掌握不充分，不利于统战教育创新机制的建立。

（三）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动因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统战教育方法创新，也是为适应教育环境、教育目标、受教育者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统战教育环境的变化是引起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主要外部原因，如西方的各种思潮进入国内，引起统战教育对象对陌生思想观念的新鲜感，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引诱；又如统战教育对象受国内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鼓吹产生消极思想等。因此，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与挖掘，对统战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等教育条件的创设，诸如此类统战教育方法创新都应根据统战教育环境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在统战教育方法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只有依据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的具体情况选择方法，才能增强统战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目前统一战线的思维方法是否跟得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提升，是否适应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是否贯彻了新发展理念的新指向？这些问题成为了引起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内在原因。当统战教育对象受外界环境影响发生思想心理变化时，教育者应及时分析其思想的新特点及变化原因，探索创造出新的教育方法，为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目标

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目标是提高统战教育方法针对性和有效性，顺利达成统战教育目标。统战教育目标是统战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它体现了统战教育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不仅指示了统战教育各项工作的方向，而且规定了统战教育应达到何种效果。原有统战教育方法由于自身或外在原因，不再适应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因此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以期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提高统战教育方法有效性是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直接目标，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统战教育对象的要求是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制订和创新统战教育科学方法的内在根据。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48页。

三、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路径

统战教育方法创新概念还指出了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路径,即改进传统教育方法或创造新的教育方法,使之产生新的效力,达到理想教育效果。社会主义学院自1956年成立之初就明确了教育内容:①社会发展规律,主要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②企业改革的基本知识;③时事和政策。①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等。② 社院统战教育开展60多年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和充实教育内容,而统战教育方法创新的路径必须适应教育内容和教育环境、对象、目标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优化和调适。

(一) 创新统战教育结构的层次性

创新社院统战教育结构的层次性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首先,由社院教育目标体系的层次性、受众的层次性和多元性、课程设计的多样性所决定。李维汉同志曾在总结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特点时指出:一是计划性强,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进行的。二是组织性好,它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而不是各自为政自发进行的。③ 这充分表明了把握统战教育结构的层次性对提升统战教育效果的重要性。中央、省、市、县四级社院(校)承担各地、各类、各层次统战教育培训对象的轮训的任务不同,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教育培训对象的学习需求和工作实际有效分解培训任务,使得各级社院(校)充分发挥其功能,做到统战教育的层层推进、层层深入。其次,由不同教育培训对象的岗位职级和职业类别的多元性所决定。因为不同的岗位职级、职业类别和年龄、学历、工作任务等存在差异,统战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必须要与之相匹配。最后,针对统战干部而言,统战教育的具体内容由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践相联系,构成了丰富的内容体系。通过统战教育创新主体对课程内容、教材内容与教学实际的综合加工和对教学过程的科学合理组织,确保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爱国主义精神,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了解和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增强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④

(二) 创新教师统战授课的动态性

动态性,就系统论而言主要是说整个系统随时间变化的一种属性,有时也称为“时变性”。在民主党派参加筹建新中国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动态灵活的方式,增进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文化认同,这在开展统战教育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中共中央多次安排领导干部向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作有关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助民主人士进行平时的政治学习和参观调查,向他们提供书报文件,不拘方式、时间、地点,自愿学习。中共中央还组织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并鼓励他们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民革、民联、民促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对重大的政治问题也与共产党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为《中国人民

① 邴文举、孙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49—1991)》,第116页。

②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6日,第1版。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48页。

④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6日,第1版。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① 统战教育授课的创新是一个教学系统输入和输出的创新。输入主要有统战教育创新主体精心设计教学体系，而输出则主要是把课程内容传递给学员。在此过程中，存在课程的新旧内容的筛选、加工、重组，教学创新主体自身知识的更新，授课方式方法的创新，都是创新统战教育重要的动态表现。创新授课体系的动态性又需要如何具体把握呢？针对加强对统战干部的教育培训，《条例》指出，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掌握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继承和发扬统战工作优良传统，善于广交深交党外朋友。^② 创新统战教育授课的动态性要将不同教育培训对象的学习盲点、问题焦点，授课教师的教学难点、重点、亮点，课程内容的敏感点、热点有机结合起来，实时作出更新、调整协同和动态整合，进而探索出创新统战教育的有效拐点。

（三）创新统战课程体系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③ 创新统战教育的连续性体现在“统战课程”与“课程统战”的建设上，要始终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把统战课程与课程统战教育教学相结合，确保一定的认同教育课时，处理好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兼容和协调，把统战元素融入教育全过程。因此，创新统战教育课程需要根据受众群体特点，结合教育培训目标要求和教学工作实际，在教材编写、课程设计方面用心用力，结合最新案例适时调整，做到统战教育与统战素养协同并进，教育创新与教育传承有序衔接。

（四）创新统战认识实践的互补性

统战教育开展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不论是统战教育者还是学员都离不开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作为一名“统战人”，如何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知识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水平？统战干部首先要认清自身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角色，时刻做到高标准要求自己，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绝不允许脱离、凌驾于统战对象这一特殊的人民群众之上。其次，要着力提升和培育“统战人”自身的角色认知水平和统战工作技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其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同时认识对实践有导向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统战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必须坚持在理论学习和具体实践中实现二者相互促进、互相补充的有效互动。而创新统战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互动中寻找突破口，实现理论知识学习和具体工作实践的无缝对接，避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学习认识的产生，做到学而懂、学而用、学而为。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窦爱芝：《中国民主党派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②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6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2015年5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15351358.htm，2019年8月20日。

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强国中的功能与使命

——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为分析视角

朱益飞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具有浓烈的大众色彩,他们有着道德良知,而且注重实践性。我国党外知识分子规模庞大,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借鉴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充分认识党外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他们有助于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主体以及发展先进文化的主力军。党外知识分子要履行价值引领、为人民服务、理性批判以及投身实践的使命与担当,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 党外知识分子; 文化强国; 功能与使命; 葛兰西

中图分类号: D63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30-06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号召。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贡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党外知识分子数量已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四分之三,将近900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2015年5月举行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①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②马克思主义者向来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人之一,从理论上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研究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有关理论,借鉴有益成分,对于新时代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研究”(19CKS0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南京局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8YJC71010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39—1942年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及其与整风运动关系研究”(2017SJBFDY814); 扬州大学“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朱益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①《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1版。

^②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

作，发挥他们在文化强国中的功能与使命具有积极意义。

一、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解读

葛兰西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他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对于意大利共产党革命理论与实践影响深远，其中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对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一）“有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有学者把葛兰西评价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有人认为他是“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葛兰西归属于何种理论派别，他与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葛兰西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实践哲学的认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基于实践哲学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描述了实践哲学的产生，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用实践来形容他们的哲学特征。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 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并赋予“实践哲学”新的内涵，他指出，“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线索。”^② 他主张人通过自觉和批判思维活动来创造历史，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并提出“实践一元论”概念，扩大了实践范围，指出要把意志作为哲学的基础。当然，这种意志应符合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机械论，重视人的主体性及人的意识、观念在人类历史的作用。

他以实践哲学为基础探讨了有机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实践哲学承担两种任务：一是要战胜最微妙形势的现代思想体系，组建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二是要教育那些文化还停留在中世纪的人民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任务。他指出了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哲学对人心灵净化、精神提升的功能，从而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由此展开。

（二）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有机性”分析

葛兰西认为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脑力劳动。从广义上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方式，都持有特定的世界观，并在职业以外从事着某种智力活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狭义地理解，知识分子是执行着特殊社会职能的人，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

在划分标准方面，葛兰西打破了按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划分标准，他着重从个体所履行的社会职能进行划分，将知识分子分成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两类。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他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③ 另一方面，葛兰西认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分裂，发生了一种具有历史特征的分化组合，于是形成了“有机知识分子”。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是现实与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对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葛兰西强调的知识分子是大众情感和社会关系的代表，他们是向大众传播知识的群体。传统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精英代表是一个固化了的阶层，而“有机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从纯知识领域跨越到社会道德和价值领域，体现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有机性还体现为知识分子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构建，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②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61页。

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政治实践中发挥效用。如果说前者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大众社会中的有机性,那么后者则体现了政治社会中的有机性。事实上,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与“大众社会”“政治社会”密不可分的。

(三)“有机知识分子”的特点

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具有鲜明的特性,这些特性对新时代的中国有一定借鉴意义。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有机知识分子”具有浓烈的大众色彩。从“有机知识分子”构成讲,葛兰西认为任何人都是知识分子,这种界定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大众泾渭分明的固有偏见,这是其一。另外,葛兰西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体现为知识分子能够“有机”融入广大群众中,他认为知识分子与群众在认识上是存在差别的,这构成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互补关系,对于“有机知识分子”来讲,如果不能投身到大众中去,就不能进步,也不能创造历史。

第二,“有机知识分子”具有道德良知。文化领导权理论也是葛兰西最为重要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是以认同或同意为前提,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文化领导权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联系是以“文化领导权”为媒介的,同样,“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获得是以广大民众的自愿认同为前提,要实现自愿认同,知识分子必须主动关心大众利益与价值,坚定思想信念,用道德和良知承担社会义务与责任,进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有机知识分子”是注重实践性的。如上文所述,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构筑在实践哲学基础之上,知识分子的实践性也就不难理解。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介入现实生活,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空间高谈阔论,成为新的知识分子就要做到与实践生活积极融合,这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知识分子观念。

二、党外知识分子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功能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赋予知识分子以丰富内涵,这对我们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外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分布在社会各领域,具有不同专业技能与知识,其中不少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一)有助于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就是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集中展现中国精神。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组织着信仰的网络,组织着制度和社会关系,所以,在构建社会道德认知与践行体系时,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功能。习近平总书记也充分认识到这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他充分肯定了党外知识分子重道义与勇担当的本色。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①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志向与人文情怀,新时代绝大部分党外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和历史优势。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周恩来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中要协助统治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党外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是在中共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①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在建设文化强国过程中是可以信赖与依靠的力量，他们能够做到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注重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价值引领，涌现出为真理和正义呐喊的鲁迅、闻一多，新中国成立后冲破阻力回国的邓稼先，以及为中国人解决吃饱饭问题的袁隆平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党外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把国家、社会和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他们对那个时代核心价值责任与担当。

所以，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功能。党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人文科学为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体现人类价值与精神的人文主义素养，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对问题的思索和发自内心的呼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构建的重要动力源泉。凭借自身专业优势，党外知识分子能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在此基础上深入群众，广泛宣传，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民众中的渗透力与影响力，推动实现文化强国的精神力量。

（二）有助于推动传播优秀文化

优秀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传播优秀文化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认为，在人民群众当中传播文化是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党外知识分子对传播优秀文化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方面，党外知识分子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它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深厚根基，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外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较高的基本素养，对自身文化的辨析、取舍亦较准确、到位，能够运用时代语言和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高质量地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源动力，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另一方面，党外知识分子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主体。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文化发展的地域界限被打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软实力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文化交流互鉴比较频繁的国家。当前出国、归国留学人员、华侨等群体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比重，他们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生力军。通过发挥他们的作用，把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力度，扩大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同时，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他们具有积极进取、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三）有助于推动发展先进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要求我们善于传播优秀文化，而且还要能够发展先进文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的健康积极向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党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文化知识较多的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外知识分子不仅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更是先进文化的开拓者。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需求已经从“硬”需求转向“软”需求，对先进文化的追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党外知识分子在解决新矛盾方面大有可为。他们善于建设多样性先进文化，进而满足不同层次民众的文化需求。在文化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85页。

建设中,党外知识分子身上兼具的理性批判精神有助于探索先进文化的内涵,用科学态度对待文化建设,勇于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各类腐朽文化,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作品,形成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先进文化建设格局。因此,党外知识分子作为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能够坚持弘扬主旋律,使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确保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

总之,党外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特长,致力于先进文化的创造、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精神享受,有助于满足社会发展对文化的需求,更好地推动着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党外知识分子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使命

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可以看出,“有机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群体,他提倡知识分子善于对民众开展教育,把开展批判性的思维活动作为基本职能,注重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些观点也启示着党外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过程中要担负起相应的使命。

(一) 价值引领使命

马克思在分析意识形态时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①真正的统治阶级,在实际上取得政权之前已经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他强调通过同意而取得的道德和哲学层面的文化领导权比政治领导权更重要,这也正是我们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意义所在。

近代以来,从康梁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那个时代价值的引领者,实现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革。新时代的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价值引领使命,就是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全面融入人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思潮,整合各种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更多社会共识,引导人们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为人民服务使命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创作的方向,即:“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②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落脚点和出发点。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也正是强调了知识分子应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认为知识分子应当融入大众,在群众中建立深厚的感情基础,否则“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的关系就是、或者被归结为那种纯粹官僚的和形式的关系,知识分子就变成一种特权阶级或一种教士”^③。

党外知识分子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一方面要走出象牙塔,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这是进行文化创作之基。不少党外知识分子从事着教学科研、新闻出版以及文艺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及影视传媒等方面要善于借鉴大众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凡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创作必然是经不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不合格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形式上,要尽可能建立起符合时代主流价值观念和大众审美的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33页。

通过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各类作品，让这些文化产品能够与人民群众交流、互动以及共鸣。只有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使命，才能够使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那么党外知识分子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建设主体的作用。

（三）理性批判使命

知识分子历来讲求独立人格，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实现对社会的关怀。葛兰西认为，只有对社会历史起着推动作用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许纪霖先生在谈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时，描述了他们身上体现的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疏离感、批判精神以及道德批判意识，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他还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①。这实际上指出批判精神应当是知识分子具备的基本素养。

但是当前党外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淡化理想、消解道德的价值观不正确的人有之，精致利己主义、急功近利的不良习气者亦有之。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失去真正知识分子的属性，他们发出的批判很容易变得非理性。因此，理性批评的前提首先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拾理性批判的使命，勇于揭露社会中丑恶的现象，抨击不良习气，引导全社会形成激浊扬清的良好氛围。如何切实履行批判的使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能够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良好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是哲学更是方法。在辩证法的指引下，党外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要着眼于现实，理解现实，并寻求超越现实的有效路径。

（四）投身实践使命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对理论进行检验；作为政党领袖，他提出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使之成为现实可行的政治哲学。他认为，知识分子、职业哲学家必须肩负起推动社会变革的重任，要增强实践的创造性与主动性，积极干预现实生活，介入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

党外知识分子全面发挥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必须走出书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要践行并向人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成员祛除不良观念，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要善于进行文化创新，充分体现文化创作的先进性，以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水平。认真研究并解决新时代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在文化建设中的科学管理经验和进步文化成果，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舞台，党外知识分子应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在保持知识分子道德与精神领域独立性的同时，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新时代要科学认识并处理好党外知识分子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下，把对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内化于心，把广交深交党外知识分子外化于行，把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固化于制，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与担当，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 现实挑战及可能路径

徐 敏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新媒体代表人士影响和推动了互联网空间的发展, 其变化是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指针。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面临行业发展的滞后性、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全球化进程中的流动性、统战对象的异质性与变动性、统战工作方式的单一性与时代性等内外交织的现实挑战。新时代做好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 需要从网络统战平台建设、统战文化空间扩展、价值和责任共同体构建等方面支持和优化新媒体行业的发展, 促进新媒体代表人士健康成长。

关键词: 新媒体代表人士; 民族地区; 统战工作; 挑战;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2-0036-0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 我国新媒体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拥有体量庞大且种类繁多的新媒体企业。相伴而来的是, 新媒体的勃兴吸引了大量新媒体从业人员, 同时也催生了一批网络意见人士。这些群体往往处于传播网络的权力中心和关键环节^①, 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海量媒介信息的生产内容和传播方向, 对互联网空间的信息传播和情感生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连接作用”^②。进而, 如何做好该群体的统战工作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统一战线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

新媒体代表人士伴随着新媒体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孕育而生, 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一类群体,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央统战部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署名润智的官方文章《正解“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的工作”》中指出, 新媒体的代表人士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新媒体平台的经营者, 一般可称为新媒体从业人员; 另一类是新媒体上内容的制造者, 可笼统地称为网络意见人士。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要做好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工作, 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 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 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③ 中央的定位和重视, 引发社会各界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高度关注。

当前,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新媒体从业网络, 而中西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市场化背景下的云南新社会阶层宗教信仰问题研究”(QN2017017)。

作者简介: 徐敏,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社会学。

^① 朱天、张诚、齐向楠:《“圈子”概念下网络意见领袖的本土化致思——基于虚拟社区“百度贴吧”的实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3期,第131—136页。

^② 韩运荣、高顺杰:《微博舆论中的意见领袖素描——一种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3期,第61—69页。

^③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15年5月20日,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5-05/21/c_134257226.htm, 2019年10月8日。

部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新媒体基本上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为此，我国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需要关注不同地区新媒体行业发展的差异性。目前关于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从新媒体代表人士这一整体入手，关注其概念范畴、群体特征、政治参与、统战工作不同面向的分析；^①二是集中对新媒体代表人士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或网络意见人士进行专门探讨。^②然而，不同地域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群体特征、政治参与、发展环境还有一定的差异，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才能对地区性统战工作有参考意义。既往研究对于民族地区的新媒体代表人士研究甚少，只有极少数学者部分涉及了民族地区的网络统战工作。^③事实上，相较于其他地区，民族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社会发展状况，赋予了新媒体更为独特的内外部组织环境。所以，在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中，需要关注民族地区情况的特殊性。

二、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外部性挑战

（一）新媒体发展的滞后性

新生事物往往产生和较快发展于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地区，新媒体也不例外。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这些城市的上网规模也更为庞大，新媒体代表人士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2014—2019年，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广阔前景和区域优势。截至2017年底，我国网站数量达到526.06万个，东部地区网站占68.91%，中、西部地区占比分别为18.49%和12.61%。^④2019年8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北京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较2018年底提升0.5个百分点。^⑤普及的互联网和庞大的网民规模，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新媒体的高歌猛进、从业人员的迅速形成和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产生；另一方面映射了新媒体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断构建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和对社区形态的全面塑造。

然而，我国新媒体的发展格局却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作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行业天然在通信技术成熟和资本聚集的发达地区更为蓬勃；民族地区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企业规模不大且以中小企业居多、产业集中度不高、知名度较低、创业风险较高、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等行业发展缓慢的特征。以云南省为例，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包含的四类群体在行业、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缺乏资金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问题较为突出；这种新媒体行业发展的不对称现状，导致了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数量少，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话语权，不能很好地通过新媒体发声。而发达地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由于对民族地区缺乏相

^① 参见：王资博：《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研究》，《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5—20页；栾莹、王继焜：《关于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53—57页；李大棚：《统战工作视角下新媒体代表人士的政治引导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1—8页；张佳慧：《“互联网+统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分众统战问题探讨——以浙江省为例》，《理论导刊》2018年第1期，第28—34页。

^② 参见：李雯：《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引导问题探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66—70页；李风华、赵会龙：《网络意见人士的类型与统战工作策略探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91—96页；余树英：《不同类型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及发生机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7期，第90—94页。

^③ 王立新、李平、赵旭：《网络新常态下推进民族统战工作的策略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3期，第43—48页。

^④ 中国经济网：《全国网站数量达526.06万个主要行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2018年1月9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1/10/t20180110_27652732.shtml，2019年9月5日。

^⑤ 中国网信网：《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8月30日，<http://www.cac.gov.cn/2019zt/44/index.htm>，2019年9月30日。

应的认知和了解,相关知识、信息很有可能在网络传播中被误解、扭曲。另外,由于行业发展缓慢、认同度不高所引发的统战工作对象不稳定、范围不明确等也带来了多重困境。

(二)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构成。每个民族不仅有各自的发展历程,而且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在宏观利益分配格局中,要求决策者妥善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分配,否则会导致复杂难解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社会矛盾或者疑难的“N个交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世俗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交织在一起,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合法的宗教活动与非合法的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等等。^①这样的交织,导致民族问题更加复杂而艰巨。民族地区在经历了传统向现代的急速切换,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后,“N个交织”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渗透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然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在新媒体的话语空间中被简约化、极端化或是被遮蔽。这种情况,无论对新媒体代表人士还是统战工作来说都是个相当的挑战。新媒体在不断建构超地方的“想象的共同体”^②,而非将表述本身置于当地的社会语境下,缺乏对地方社会的观察和认识。事实上,在表述的过程中有时会忽略问题本身或者说缺少对地方文化的深入认识和理解,无意间为其他民族贴上标签,人为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和刻板印象。为此,面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亟须做好拥有“地方性知识”的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这一群体,可以借助新媒体跨越时空、迅速传播的特性,全面、翔实、客观地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将同一时空中多种面向的民族样态呈现出来,避免媒介渠道的扭曲而造成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等信息的片面截取。

(三) 全球化进程中的流动性

流动性指的是包括资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文化等在内的全球性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单纯地从一个点到另一点的直线式运动,而是全方位的互动、扩展与传播。^③就中国而言,不容否认的是,全方位的互动一定程度上是在全球化的席卷和改革开放双重因素并置下迅速推进的。这种全球化下的高速流动进程对于民族地区冲击更大:一是少数民族和移民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的流动和变化;二是透过新媒体技术所搭建的桥梁,各民族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密集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单一运动,还包括后者向前者的反向流动以及突破时间、空间的全方位沟通和交流,打破了传统相对固化的结构,加速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高速的流动性是一把双刃剑:其不仅在建构、整合新的社会经济空间,同时也在不断地冲击、消融、解构传统的社会模式和组织结构。全球化进程中的流动性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比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产生既有城市方面的原因,也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④尤其是民族地区,相对封闭的治理在当下全球化浪潮和高速“流动性”的裹挟下,显得有些杂乱和疲于应对:一方面是物资、资本、信息的全方位渗入与制度、政策及管理方式的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节奏尚未

^① 龚永辉:《关于民族问题的两重属性——三十年来民族问题概念广义、狭义之争的学理反思》,《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19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③ 范可:《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92页。

^④ 汤夺先:《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论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1—36页。

真正合拍。

鉴于这种高速的流动性所产生的影响，民族地区应该积极应对，避免或减少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对于当下的统战工作而言，需要主动利用诸如新媒体之类的“流动性”生成工具。例如，正确认识新媒体对民众民族和谐感的影响效果，才能让新媒体更好地发挥作用。^①值得强调的是，新媒体技术本身虽然是媒介工具，但其并非是中立的。新媒体的发展嵌入其所依赖的制度土壤中。在运用新媒体的过程中，只有实现其与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的正能量，做好“大团结大联合”，需要我们对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清晰的把握，同时亟须厘清和处理内部性困境，以便于统筹规划、积极应对。

三、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内部性挑战

尽管统一战线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在新的形势及新的对象面前，仍需要在秉持“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观念下，不断拓宽思维，审慎对之。事实上，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问题可从地区性特点、统战对象特征及统战工作方式三个方面来剖析。地区性特点即环境，已在前文的外部性挑战中做过探讨，而内部性挑战体现在统战对象与工作方式两个方面。

（一）统战对象的异质性与变动性

新媒体的兴起不仅给传统媒体格局带来巨大的调整，占据舆论生态的前沿阵地，还推动了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促成一批新权威力量的诞生，包含技术权威（技术的自主性，技术的走向为新媒体从业人员所把控）及思想权威（网络意见人士对社会舆论走向产生的引导作用）两类利益群体的产生。此外，还催生了“自媒体”，使得传播益发平民化和普泛化。^②基于这一背景，新媒体代表人士天然具有与新媒体相适应的群体特征和时代特色，即异质性与变动性相交织。异质性反映的是该群体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与新媒体开放、融合、创新的特征相辅相成。高知化、年轻化、专业背景来源广泛等决定了其身份构成多样，价值观念多元，思维方式多维。而变动性体现的是新媒体从业人员跨界兼职多，流动空间大，行业进退灵活性高。

这一特征加大了统战工作的难度，造成了统战对象不稳定，难以联系，统战范围扩大，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士数量少、思想争锋，引导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不同的是，新媒体代表人士处于舆论和思想碰撞的最前沿，再加上其传播速度之快，必然导致文化传播更为碎片化。在民族地区，其带来的冲击更加明显。一面是新媒体人士对民族文化的推广与宣传，一面是地方文化的整体性被分解与重构。这种“一体两面”性正是现代性所投射的结果。在此特定的背景下，地方统战工作如何在地理边界相对固定、空间范围无限延展的网络语境下，增强话语权，与新媒体代表人士达成共识，寻求延续发展之路值得深思。

（二）统战工作方式的单一性与时代性

统一战线作为一种联盟和策略，在民族发展、融合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决定了统一战线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无论对外还是对内，中国统一战线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个时期表现不尽相同，但最终都沿着“大团结大联合”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范围不断拓展。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及其概念、范围的逐渐明晰，一定程度上投射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

^① 祝哲、程佳旭、彭宗超：《新媒体、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人际信任与民族和谐感知——来自×地区的证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第113—120页。

^② 成伯清：《新媒体之新空间：从大众到公众》，《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第47—49页。

事实上,在新媒体领域,新媒体既实现了人与人之间跨越时空的实时沟通、超距交换,又使得从业人员的职业选择更为自由。作为新社会阶层中的一部分,新媒体代表人士拥有的媒介方式是以即时性、交互性、立体性等具有传播学特征的一定程度上具有“动员结构的互联网”^①。由此赋予了参与主体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酝酿着一个新的“数字化生存”的社会运动的生成。^②

如此快速的网络发展正在不断重塑着社会形态,传统的统战工作方式已不能满足新的社会群体呈现出来的新需求。尤其是基层统战部门更为凸显。由于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工作方式单一,渠道相对不畅,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统战领域,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造成这一群体的统战工作比较被动。时代性是新的历史时期对统战工作方式的新要求,强调的是统战工作在应对社会变迁和统战对象范围变化的背景下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新方式、方法,构建新的媒介交流、沟通空间。解决好统战工作方式时代性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全新的网络生态信息体系中寻求有效的统战工作路径,关系到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把握住关键大多数,进而做到“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③。

四、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可能路径

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媒体既拓展了跨时空的社会交往,又给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新媒体代表人士增长的速度与变动的方向是不容忽略的。所以,统战部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政治动员和参与机制,必然需要适应新形势,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增进共识,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

(一) 积极搭建网络平台,加强软硬件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18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⑤这对于做好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尤为重要。虽然“网络统战”这一概念已提出将近十多年的时间,但仍存在明显的“东强西弱”现象。^⑥实际上,民族地区统战部门人员、经费有限,工作人员往往身兼数职,开展新媒体代表人士工作的民族地区统战部门也较为稀少,且主要集中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县市。因此,对民族地区而言,加强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需要积极搭建网络平台,为网络统战提供人员支持和技术保障。

一是有效建立网络沟通平台,改变传统工作模式。民族地区统战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类别的网络沟通平台,探索各级统战部门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发展方向。根据统战工作需求和网络传播学规律,积极利用网络沟通平台,增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信息的正向宣传,及时获取和应对负面信息的扩散与传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作用。二是提升民族地区统战部门工作人员的网络统战能力。这既需要根据网络统战需求给民族地区统战部门相应增加人员编制,及时增加拥有专业技术的统战人才以实现专人专职,又需要加强对已有统战队伍的网络统战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整体提升网络统战能力。

① 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年第2期,第178—197页。

② 关凯:《互联网与文化转型:重构社会变革的形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03—110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

④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见《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87—400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03页。

⑥ 叶介甫:《新形势下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潜力巨大》,《团结报》2017年8月1日,第8版。

（二）树立整体性统战思维，积极扩展统战文化空间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①虽然两个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范畴并非直接指向新媒体代表人士，但与新媒体行业有着重要的关联，其理念对于指导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全球性的视野和思维，彰显的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将网络空间视为“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网络所具有的时空压缩性、全球性等特征。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基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价值认同。^②从文化属性上来说，统战文化具有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激励引导的作用；从发展规律来看，统战文化具有创新性、时代性、一致性等特征，为推动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当今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战部门需要在保持原有优秀统战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支撑新时代的网络统战工作。就网络统战而言，需要树立整体性思维，开拓统战工作视野。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仅是某一个群体、地区或部门的单一性工作，而且是更为广阔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从整体性思维出发，需要构建网络统战联动机制。这意味着，民族地区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已有线下统战模式的优势，将线下统战与线上统战结合，以促进互联网治理的有力推进。更进一步来说，网络统战需要民族地区统战部门内部与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也需要增强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统战部门之间的地区网络统战互动，以实现及时分享统战信息，增强统战联动处理能力。

树立整体性统战思维，民族地区统战部门需要积极扩展统战文化空间。一是建立队伍，培养新媒体代表人士。一方面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建立新媒体代表人士数据库，制定相应的分类统战策略。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新媒体代表人士队伍，定期组织到社会主义学院按需培训，因材施教，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要发掘有专业技术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培育和引导其成为新媒体代表人士，获取一定的新媒体话语空间，增进其他地区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二是主动打造新媒体统战矩阵，积极参与媒介议程设置。统战部门自身也应当积极适应新时代网络媒介的发展变化，关注新媒体代表人士成长及其关心的话题，了解社情民意，主动利用新媒体扩大宣传力度和深度，开启相关议题的讨论，努力成为网络空间话语的引领者。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各主体参与的价值和责任共同体

虽然伴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传统民族地域概念逐渐被打破，但由于网络空间的立体性、即时性、压缩性等新的媒介特征，民族、地域等不同分类群体在互联网世界产生了更为灵活、多变的“再疆域化”。这使得原有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的舆论主导权在网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亟须在互联网空间加强中华文化宣传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中国在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③2017年11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次被写入党的代表大会，进入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观之，统一战线应当是“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④为此，开展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4页。

② 殷啸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三个维度》，《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74—80页。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④ 苏云婷：《新时代统一战线：来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照》，《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55—

人士的统战工作,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夯实。

一是加强民族文化凝聚力,铸牢民族团结之根。民族文化是民族之魂,通过服饰、语言、建筑、风俗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加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就要在保护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普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要拓展优秀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表达渠道,“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①,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正能量,激发活力。通过媒介赋权形成民族文化表达空间,有利于我国各民族增强彼此的理解、互信和交往,还有利于减少价值观念层面的误解,最终在互联网空间成为拥有紧密联系的“价值共同体”。

二是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促进治理型统一战线的发展。如果说尊重民族文化是建构“价值共同体”的重要前提,那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则是建立“责任共同体”的关键。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多元对话并不必然导致网络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任何共同体的形成都需要以一定的意识形态加以引导指导,促使多元主体在协同工作中达成共识。这就需要在民族地区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换言之,统战部门需要用柔性治理的方式,将民族地区的新媒体代表人士作为平等参与的治理主体,与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进行协同工作。统战部门可以明确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社会责任”,建立该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解决渠道,以在协同工作过程中建立彼此信任的“责任共同体”。此外,民族地区统战部门要积极利用传统行之有效的统战方法和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从而不断提高互联网治理能力,以增强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政治凝聚力,降低网络空间过度自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当前,“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②其中,新媒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网络统战的重要性日趋凸显。虽然目前民族地区新媒体行业还相对滞后,但在网络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新媒体成长步伐也会逐步赶上,从业人员渐趋增多。可以看到,新媒体自身的“去中心化”“流动性”等特征将会给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带来一系列挑战。因此,只有重视民族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善治”,推动新时代新媒体自身及民族地区的发展。

理解民族地区新媒体统战工作,不仅需要将其置于更广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语境中加以审视,还要注重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这既有助于应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新媒体带来的诸多内外部挑战,提升民族地区的网络安全,又有助于增强互联网空间的话语权,构建更有活力、更为健康的网络生态空间,进而使得互联网转变为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渠道。总之,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运用新媒体“讲好民族地区故事,传播中华民族好声音”,不但能够提升民族地区的互联网治理能力,而且能最终促进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乌镇)》,2015年12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 2019年9月20日。

^② 《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时强调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2015年12月27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5/1227/c64094-27981000.html>, 2019年9月30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溪地区统战工作的做法与启示

陈从林, 段燕青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 1950年玉溪地区解放后,中共玉溪地委认真贯彻省委“把统战作为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紧扣政权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地委中心工作,在全区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统一战线。经过一系列统战工作,稳定了全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促进了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统战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研究玉溪地区解放初期统战工作做法,从中汲取经验和启示,对当前玉溪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玉溪市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拓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玉溪地区; 统战工作; 经验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43-07

1950年3月,中共玉溪地区委员会、玉溪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标志着滇中(玉溪地区在解放前称滇中地区)地下党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已经胜利完成。从此,在省委和地委的领导下,玉溪地区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在玉溪地区解放初期,地委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复杂的矛盾和诸多困难。针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地委清醒地认识到统战工作对全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意义,及时健全了全区统战机构,为全面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此后,在地委的领导下,全区统战系统把党中央为云南制定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方针^①和省委提出的“云南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把统战作为中心工作”^②的指导思想,以及全国、全省统战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统战工作中,紧紧围绕地委减租退押、征粮剿匪、政权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对私改造等中心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区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统一战线,开创了玉溪地区解放后统战工作的新局面。经过努力,全区统战系统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稳定全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促进全区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溪地区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玉溪地区解放初期,地委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执政的考验,担负着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

作者简介: 陈从林,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市情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方党史;段燕青,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市情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方经济。

^①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二卷1950—197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

^②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宋任穷云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

(一) 多种矛盾并存且相互交织渗透

玉溪地区解放初期,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矛盾并存并相互交织渗透。从敌我矛盾上看,玉溪地处云南腹地,距离昆明较近,是国民党统治云南的重地。解放前,国民党向玉溪地区派出中央军和云南地方保安部队,把守着全区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此外国民党在玉溪地区还设有民众自卫总队、乡镇联防大队等本地武装。国民党凭借强大的军事武装对玉溪地区各族人民实行高压统治和军事镇压,人民群众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敌我矛盾十分尖锐。在云南解放战争特别是昆明保卫战和滇南战役中,被打垮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军统特务逃窜和隐藏到玉溪地区。此外,在玉溪地区解放斗争中,被打垮、解散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残余分子也流窜和隐藏到全区各地。这些国民党部队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妄图东山再起,他们与当地土匪地霸勾结,狼狈为奸,发动武装暴乱,破坏着新生的人民政权,致使有的县区党委政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敌我矛盾成为全区主要矛盾。据统计,仅1950年全区就有27个乡镇发生武装暴乱,在平息暴乱中我方牺牲485人(其中干部315人、战士100人、农村党员和积极分子70人),很多同志被匪徒剥皮、抽筋、火烧、刀割、活埋。全区剿灭土匪14股5880人,处决匪首155人,瓦解胁从分子5610人。^①从民族矛盾上看,玉溪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和民族矛盾极为突出,特别是由于旧社会汉族统治阶级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剥削,造成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歧视和矛盾,少数民族之间也因风俗习惯和地盘争夺等原因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隔阂和利益冲突,相互间经常发生纠纷、武斗和械斗。同一个民族内部或者同一个民族村庄,也存在人口多的民族、大家族对人口少的民族、小家族的欺凌和压迫,相互之间结怨较多、仇恨较深。此外,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基础、群众基础较为薄弱,干部严重缺乏,执政经验不足。这种情况下开展民族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民族关系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从阶级矛盾上看,虽然玉溪地区解放后摧毁了国民党城市统治政权,但并不代表阶级成分和阶级矛盾就此消失,相反阶级身份十分明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广大农村依然沿袭着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在土地改革运动前,玉溪地区还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此制度桎梏下,地主阶级利用其控制的大量土地资源残酷地剥削农民,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十分突出。有些边远山区还沿袭着农奴制和土司制,农奴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此外,封建统治者之间也因统治权争夺、物质利益分配等原因存在着内部矛盾纠纷。

(二) 国民经济体系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解放前,玉溪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苦。从经济结构来讲,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地主阶级霸占着大量田地。据统计,占人口总数4%—5%的地主占据着75%的土地,占人口总数4%—5%的富农占据着10%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75%的贫苦农民只占有15%的土地。^②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桎梏下,农民迫于生存不得不得受雇于地主,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经济虽出现萌芽,但与封建地主经济相比显得十分微弱,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资本主义手工业都显得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则几乎为“零”。这些,造成玉溪地区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物资短缺,生活困苦不堪,“山茅野菜半年粮、包谷拉哈装肚肠”就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玉溪地区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保住统治政权,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经济发展,致使玉溪地区解放初期国民经济体系千疮百孔,市场萧条、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生产萎缩、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仅1950年3月后的半年时间内,玉溪地区就发生了三次物价大上涨,大米价格一度上涨85%。1950年全区征收粮食才达到3995万斤,按当时100万人口计算,人

①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2010年,第22页。

② 中共玉溪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滇中地区历史大事记》,1990年,第1页。

均交粮不到40斤^①，粮食也主要用于部队和城镇供给、灾荒救济。1950年6月，玉溪地委发出“加强生产救灾工作”指示，指出：由于国民党长期统治及解放前夕混乱，造成农村极度贫困，华宁县、澄江县、峨山县、玉溪县等已出现灾荒。^②至1952年，全区年度才完成工农业总产值5731亿元（旧币），其中农业总产值5101亿元、工业总产值630亿元。粮食产量47519万斤，烤烟811万斤，油料311.2万斤，甘蔗3.7万吨，社会商品零售额3488亿元。^③玉溪地区亟待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群众生活提供物资保障。

（三）执政党面临着繁重任务和诸多困难

玉溪地区解放初期，玉溪地委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繁重任务，党的领导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同时党的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一是从执政党自身来看，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迫切需提高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能力。二是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还较薄弱，除了各县中心城区和峨山县、新平县、易门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外，全区多数乡镇农村和边远山区的群众组织和基层政权还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三是已建立人民政权的地方，群众对新政权缺少了解和信任，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四是党的干部队伍结构十分复杂，干部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系统，有的来自西南服务团，有的来自“边纵”部队，有的来自滇中地下党，有的来自其他战线系统。五是党员发展程序不够规范，有的党员政治思想觉悟不够高。由于玉溪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多数是在革命武装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部分党员入党前没有经过正规培训，不懂得党的基本知识，入党动机不明确，思想不过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党员的发展程序和监督审查也不够严格，致使一些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党员被吸入到党组织中来。统一领导干部思想、促进干部团结合作、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溪地区统战工作的做法

玉溪地区解放初期，地委从形势和任务出发，认真贯彻云南工作方针和统战工作指导思想，及时建立健全统战机构，明确统战工作地位和职责，因地制宜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全区统战工作的阶段胜利。

（一）成立全区统战机构，贯彻省委统战工作指导思想

1950年3月，为贯彻“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云南工作方针，省委成立统战部，部长由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1950年8月，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玉溪地委成立统战部，部长1人，由地委书记或专员兼任。为贯彻省委统战工作指导思想和通知要求，1950年9月玉溪地委成立统战部，部长由玉溪专区专员孙振华兼任，^④明确统战部主要工作范围是负责民主党派、工商、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工作。此后，各县委相继成立统战部，明确县级分管领导，配备统战工作专职干部。1953年3月，玉溪县、通海县、河西县（1956年通海县、河西县合并为通海县）等三县成立统战部；1950年2月，江川县人民政府成立，明确县长主管统战工作，配备专职统战干部一名；澄江县解放初期没有成立统战部，但明确县长主管统战工作；1952年9月，华宁县成立统战部；易门县解放初期没有成立统战部，但从1949年12月开始就由副县长负责统战工作；1953年12月，峨山县成立统战部；元江县解放初期没有成立统战部，但明确县委领导分管统战工作，县委办公室配备专职统战工作人员。全区统战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此后，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全区统战系统认真贯彻省委统战工作指导思想，

^①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第20页。

^②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第12页。

^③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第46页。

^④ 中共玉溪市委统战部：《玉溪统战志》，2009年，第11页。

开创了玉溪地区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二) 认真贯彻中央、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1950年3月,中央组织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基本政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和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为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1950年10月,省委组织召开了全省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了云南统战工作的重要政策界限和主要问题。1951年9月,省委又组织召开了全省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要把统战工作与土地改革等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为贯彻中央、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玉溪地委于1951年11月组织召开了全区各族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了具有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协商委员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3年5月,全区上下召开私营工商业代表座谈会,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工商业代表消除了思想顾虑。1954年10月和1955年5月,地委统战部又分别召开全区统战干部会议和全区宗教工作会议。

(三) 准确把握和落实各项统战政策

落实民主人士安置政策。在玉溪地区解放进程中,民主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玉溪地区解放后,地委十分重视民主人士的安置。在政治上给予妥善安排,突出他们的政治地位,通过召开民族代表会议等形式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组织他们到外地参观学习;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

组织民主人士积极参与建政和固政。在建政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安排一定比例的党外民主人士作为领导班子成员,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让他们参与地方领导和决策。各级政权安排统战对象担任职务,制定政策时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遇事开展民主协商,保持民主作风。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中,最大程度地发动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参与剿匪斗争,吸收民主人士加入剿匪委员会,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声望和影响,说服开明地主将枪支转入到农民手中,用多种方式劝降土匪。地委提出“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镇压为后盾”的剿匪方针,对待战俘和投诚人员,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投诚人员进行教育改造、逐步释放。在镇压暴乱中,地委根据1950年冬省委统一部署安排,充分发动群众,动员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与打击国民党残余特务和地方恶霸。

帮助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地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学习土地改革政策,劝导开明地主绅士减租退押,支持土地改革。成立土改委,组织各阶层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下乡参与土地改革运动。

团结和教育工商业者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政策,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调动他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热忱。1952年,全区工商代表会议后,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得到消除,开始增加资金,扩大门面,放手经营,打开了全区手工业和副业产品的销路。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从1955年开始,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直接过渡、公私合营、合作商店或小组、专业代购代销、批购经销等五种形式,完成了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坚持“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党外知识分子的基本工作方针。根据省委关于“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参加土地革命,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改造知识分子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的指示,地委组织知识分子分批下乡参加土改工作,规定在土改运动中不得把知识分子当成一个阶级对待,反而要特别注意照顾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救济失业知识分子。

认真贯彻中央“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促进全区社会稳定和全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民族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1951年,全区各县普遍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5月,成立峨山县

彝族自治区，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在19名政府委员中有彝族2人，哈尼族、回族各1人，正副县长中有彝族2人、哈尼族1人，县以下少数民族聚居区成立民族自治乡政府34个，占全区乡政府总数的34%。^①经济上向少数民族自治区给予倾斜照顾，帮助少数民族大力发展生产。重视民族文化，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建立民族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民族体育运动，全面推进民族社会事业。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1950年全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88人，1953年增至492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科级干部59人），推荐19名上层人士担任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级领导。^②贯彻民族团结方针，团结各民族中一切可能团结的上层人士，争取教育一切可能的中下层群众。通过这些做法，疏通了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平等团结进步。

在宗教工作中，地委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指示及公告》，向信教群众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宗教风俗习惯，不干涉其一般合法的宗教活动。帮助区内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开展“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运动。推行宗教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特权和剥削制度，清除教内帝国主义势力和破坏分子，在教会中培养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重视发动信教群众。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地委成立抗美援朝分会，制订运动计划，动员各界各层、各行各业在全区上下广泛开展大规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号召民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发动广大群众捐资捐物，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通过县区农代会、妇代会和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进行时事宣传，开展和平签名活动。至1951年5月，全区抗美援朝运动达到高潮，参加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人数达52950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8%。^③至1951年底，全区捐献飞机、大炮活动完成32亿元，超额完成分配任务110%。^④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溪地区统战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玉溪地区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经验显示，玉溪地区各族人民的解放，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巩固，各民族的平等团结进步，以及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统战工作。从1950年玉溪地区解放至1956年全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短短几年，我们就取得了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大进步的成就，这跟全区上下艰辛而出色的统战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当前，玉溪市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回顾玉溪地区解放初期统战工作的做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一）必须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全党抓统战工作就是坚持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党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成就表明，团结绝大多数人、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有政治优势和长期战略方针。党的前途命运和党的事业发展始终与统战工作息息相关，实践已经证明，凡是统战工作搞得好的时期，就是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取得成功和胜利的时期。玉溪地区解放初期统战工作之所以能够迅速开展起来，并取得出色成绩，其最根本原因就是党的正确领导。从1950年开始，全区统战系统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中央、省委统战会议精神和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开展了对民族、宗教、战俘、胁从分子、起义投诚人员、各界上层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工商业

① 中共玉溪市委统战部：《玉溪统战志》，第79页。

② 中共玉溪市委统战部：《玉溪统战志》，第96页。

③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第27页。

④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第32页。

者的工作。经过努力，在全区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统一战线，取得了政权巩固、减租退押、征粮剿匪、土地改革、对私改造的胜利，实现了全区政治安稳、经济兴旺、社会稳定和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不但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还保证了统一战线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以后继续巩固和扩大，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方向、前途和命运。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是统战事业取得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也是统一战线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政策，做好包括民主党派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港澳工作、对台工作、侨务工作等在内的各项统战工作，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二）统战工作必须服务党的中心工作

统战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统战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在玉溪地区解放初期，建立全区统战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地完成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党的中心工作。统战机构建立后，全区统战系统就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各项统战工作，当好了党的好帮手。实践证明，统战工作和党的工作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如果统战工作做得不好，党的工作就会受到阻碍，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2020年是玉溪市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全市统战系统要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任务，凝聚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非公经济组织在内的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建设具体工作中来，特别是要组织他们展开实地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市委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三）把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摆在统战工作重要位置

云南是全国边疆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稳定发展和边疆安宁，中央历来十分重视云南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针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普遍性特点，提出了“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针对云南解放初期民族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的现象，省委认真贯彻中央民族工作方针，提出云南民族工作必须遵循“首先是联络感情，搞好关系，十分谨慎稳重，长期工作，切忌性急”的基本原则，并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取得了全省民族工作的良好成效。玉溪地区在解放初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全区共有47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1/3之多，其中有8个为世居少数民族，且形成“大聚居、小分散、多杂居”的分布格局。解放初期，玉溪地委针对全区民族隔阂问题突出的现象，采取通过团结改造民族上层人士、疏通民族关系、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全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平等团结进步。1950年，地委在全区范围大规模进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宣传。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到达玉溪后，地委组织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大会，访问团在会上宣传了中央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表达了中央对各族人民的亲切慰问。会后，访问团深入元江等县份的乡镇农村和边远山区，向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和群众宣传中央民族平等团结政策。1953年至1956年，玉溪地委两次对地直机关和各县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改革开放以来，玉溪地委落实中央民

族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在民族地区推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产业、乡镇企业、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全区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1983年7月，玉溪地委召开全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云南民族工作。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新时代云南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新时代，我们仍然要把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摆在统战工作重要位置，这是玉溪地区解放初期统战工作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统战工作一贯的做法，更是将来统战工作要坚持的做法。

（四）坚持注重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做法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工作，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玉溪市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大，且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要做好玉溪市的民族工作，就必须注重和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工作。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玉溪市十分注重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玉溪地区解放后，地委围绕党委中心工作，结合全区少数民族状况和特点，注重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使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1950年，全区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88名，1952年达401人，1953年达492人，1956年更是达到1163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推进，玉溪地区加强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力度，发展壮大起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1981年，全区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4184名，占全区干部人数18%。1991年，全区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9057名，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级干部93人，科级干部863名。2001年，全市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12519名，其中厅级干部7人，县级干部138人，科级干部1867名。2003年，在市、县、乡党委委员中，少数民族干部分别占21.4%、21.7%、44.8%，在76个市直单位领导班子中，配备少数民族干部52人。^①十八大以来，玉溪市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和绝大多数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都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注重和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在玉溪地区解放初期，全区统战系统在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统战方针政策，凝民心聚力量，在全区很快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今天做好统战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时代，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和征程，我们要借鉴统战工作历史经验，把握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新特点、新规律，抓好统战各个方面的工作，强化理论武装，深化多党合作，推进示范创建，整治突出问题，突出“两个健康”，坚持分类施策，加强团结引导，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和自身建设，为玉溪市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凝聚起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中共玉溪市委统战部：《玉溪统战志》，第92页。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

李维汉对政协协商民主建构的思想贡献探析

秦泽念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党校, 重庆 400051)

摘要: 人民政协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参与广泛的协商民主。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协商民主制度之生成与发展的厚重历史实践中, 李维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期奋战在统一战线, 先后具体负责人民政协成立之前的筹备组织工作与成立之后的运行领导管理, 对人民政协这一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创制生成、坚持运行、规范发展、改革完善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与理论双重的重要贡献。李维汉提出的关于人民政协的民主之家性质、政治协商职能、合作共事关系、沟通聚智运行方法等协商民主发展原则, 把握的深邃理论建树, 时至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 协商民主; 政协; 李维汉; 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50-04

1949年,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通过精心筹备组织人民政协, 生成实现了在当时中国社会就最为充分、最为广泛的协商民主, 而且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经过70多年来不断的实践坚持、总结完善、发展改革, 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实现有序有效有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政治制度设计。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协商民主制度之创制生成、坚持运行、规范发展、改革完善的厚重历史过程中, 李维汉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统战部长, 并从1949年6月起先后担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和第二届、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战业务工作的同时, 李维汉具体负责组织推动全国政协的筹备组建与组织领导、运行管理等实际业务工作, 对人民政协这一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架构、生成、实践、改革、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与理论双重的重大贡献。

一、李维汉对我国政协协商民主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一) 推选政协委员精心周全, 为生成协商民主兢兢业业

1948年4月30日, 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大好形势下, 中共中央适应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迫切需要, 不失时机地向社会各界发出了倡议, 号召召开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成立新的人民政府。很快, 全国人民对这一倡议反应热烈, 民革、民盟等主要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备受鼓舞, 纷纷公开通电积极响应这一号召。随即, 中共中央着手周密部署开展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由李维汉担纲第一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 负责中央关于进入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要求的具体统筹贯彻、推动落实。当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时, 中央鉴于筹备工作开展的实际需要, 又进一步明确

作者简介: 秦泽念, 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

任命李维汉担任筹备会秘书长。李维汉在筹组新政协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具体而艰辛的工作，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创制生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组建后即迅速运转起来。李维汉在做好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所担负的繁忙的领导组织筹备会工作的同时，还具体负责牵头领导研究形成一份向中央提出参加新政协的具体单位及代表名单的推选建议名单工作。鉴于新政协能否成功召开取决于各参加单位和代表人员的全面性、广泛性和典型性，决定了这一推选工作的政治性要求非常高。李维汉不辞辛苦，花费大量精力亲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党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每天不厌其烦地长时间进行点对点、面对面分别谈话，苦口婆心地动员、激励各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人士加入到新政协中来。一百多天推心置腹的劝说动员激励、反复交换意见、共商共议共推，终于换来了一份包括当时中国大陆已经解放和尚未解放地区的党、政、军、民、商、学等各方面杰出人士在内的630多人的新政协代表建议名单，覆盖了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再到还在进行的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这份名单中仅专列的特邀代表一类就达到75人之多^①，例如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艺术界知名人士梅兰芳等众多知名人士均在名单之列。

在这份名单中，李维汉以其精细周到的人员推荐安排考虑，确保了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具有最为广泛的代表性，为切实实现各阶层有序的协商参与、在最为广泛的坚实民主基础和最为普遍的民意基础上建好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同时也是新政协筹备会主任的毛泽东对李维汉精细的人选安排筹组工作极为满意并大加褒奖。随着新政协参加人员的最终确定，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在1949年9月的北京正式顺利召开。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空前广泛的协商民主。而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李维汉进行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对此，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副组长、负责筹备会日常领导工作的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清楚理解李维汉为此开展的辛勤工作和付出的艰辛努力，肯定他“出力最大”。^②

（二）力推政协工作主动转型，为坚持协商民主呕心沥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在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主管全国统战工作的同时，还担任新成立的全国政协秘书长，具体主管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日常组织运行，为开拓进入新时期的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和扎实推进协商民主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很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时，一些民主党派一度认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那么自己党派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结，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行解散，要么合并重组新党。例如，当时民主党派之一的救国会认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那么其救国的使命已经完成，遂于1949年11月15日召开全党会议宣布自行解散，同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解散宣言，这一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李维汉从这一事件中及时汲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劝说工作^③，花大力说服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继续参与经济社会建设，进一步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总结救国会自行解散的教训，李维汉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重大变化，决定了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力量，为新时期建设的历史任务而奋斗。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李维汉认为，要明确和建立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提出要加强对党外人士沟通争取的工作。不难看出，这时李维汉关于进一步坚持并发展好协商民主的理念已经呼之欲出。1954年9月，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

^① 岳云、肖莉：《李维汉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开拓与理论贡献》，《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第22页。

^② 李维汉：《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2页。

^③ 慕安：《徐冰对我国统战与政协工作的贡献》，《党史博览》2013年第3期，第56页。

的产生运行，人民政协在我们国家政治运行中该如何继续发挥统一战线整合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呢？李维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53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维汉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就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开展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问题，明确了还是要继续发挥推动、协调、合作、沟通等协商民主的主要政治功能。

1954年12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把推动、协调、合作、沟通四项主要功能列入其中，以章程的形式明确肯定了各级政协要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的精神要义。这标志着，人民政协不仅已经完成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代为议政立法到发挥协商民主作用的深刻主动转型，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政协在中国社会作为组织多党派合作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已经形成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这背后有李维汉为推动人民政协顺利实现这一转变所做的大量工作。

（三）心系政协作用有效发挥，为发展协商民主出谋献策

随着1956年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也由新民主主义时期进入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时，已经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维汉继续为推进和发展我国协商民主工作出谋献策。这一时期，李维汉的主要贡献在于推动人民政协充实好活跃好协商民主工作，以求在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出人民政协更大的政治和社会作用。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李维汉在这次大会上提出，进入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仍然是继续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坚持和发挥好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政治统合功能，“特别是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我们党如果没有同有关的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那就宁肯慢一点作出决定。凡是应当经过广泛协商的问题，都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去协商，有些还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去协商。”^①

在八大会议上，李维汉再一次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既是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统一战线组织，在统一战线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强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十分重视人民政协的工作开展，应当努力使政协工作更加充实和活跃。李维汉对人民政协要更加充实和活跃开展工作的建议很快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957年3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协的新任务：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

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开始后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了严重干扰，协商民主的坚持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为减少和克服政协工作中受到的影响和干扰，1961年，负责全国政协日常工作的李维汉及时把检查贯彻落实中央政策要求、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列为这一年政协工作必须集中力量抓好的两件大事之一。中央统战部在1961年的工作安排中也进一步指出，做好这两件大事，可稳定和团结社会上多数人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将更有利于在各个战线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4月和5月，李维汉又先后两次提出把更加活跃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工作作为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之一。这些意见后来都被中央予以采纳，极大推动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我国协商民主的进一步改善和不断发展。

二、李维汉关于坚持发展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树

李维汉在人民政协的长期领导工作实践中深入调研和不断思考，在探索有效实现和有序扩大的以多党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各阶层政治参与的协商民主思想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其探索形成的发展人民政协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的政策理论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一）人民政协基本性质“民主之家”的定位

早在1951年4月，李维汉在全国政协秘书长会议上指出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不是政府机关，不是政府的上级机关，也不是政府之下的隶属机关，是同政府进行协商提出建议，是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的关系。与此同时，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则是团结合作，协商办事的关系。不难看出，李维汉对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的这一基本定位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反复思考后，1962年李维汉在全国政协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政协要民主、自由一些，随便一点，象个民主之家。”^①这样，李维汉以其“民主之家”的准确概括明晰了人民政协的基本性质特点，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机关，也不是一般在下的人民团体，而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建设中进行民主协商和团结合作的组织。

（二）人民政协职能作用“政治协商”的认识

李维汉认为，政治协商是在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既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又能够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在充分协商以后，能够有效集合和统一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同时，他还强调，注意尊重我国社会少部分人的民主权利，同样也有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据此，李维汉还进一步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实行以后，虽然政府法案已经由人大组织审议决定，但人民政协仍然可就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加以协商。

（三）人民政协中党派关系“合作共事”的把握

李维汉认为，人民政协在工作开展中，要注意改进和搞好其内部关系，但在内部关系中最主要的还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只要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那么和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就能够把握处理好。因此，李维汉强调，共产党要处理好自身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就要注意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质和平等地位。这是因为，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战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不意味着共产党可以把民主党派当作附属团体，也不意味着共产党可以对民主党派随意加以命令、干涉或者控制。换言之，各民主党派都有其各自的组织独立性，政治上同共产党是平等的党派关系，我们党必须承认和尊重这种独立地位。^②

（四）人民政协运行方法“沟通聚智”的思考

李维汉认为，人民政协在运行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做好政协各参加成员之间的思想沟通工作。各政协参加成员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社会经验、政治认知往往复杂多样，相互之间一般来说差别很大，因此需要注意下功夫做好沟通思想情绪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来自共产党的政协成员尤其要注意主动同党外人士加强沟通，注重通过积极有效的协商力求达成思想共识。二是组织问题讨论要做到自由辩论、百家争鸣。政协组织不同于人大机关就在于，既可提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就是讲错了也没有关系，要使各种意见都能够得到充分发表和自由讨论。三是落实协商民主的方式要多种多样。可以采用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常委会议、各专委会会议等各种不同层级的协商会、座谈会进行会议协商，也可根据需要召开各民主党派、社会代表人士等参加的座谈协商，根据工作开展的需要还可以列席政府、人大等有关会议参加讨论。

今天看来，李维汉对于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注重坚持和发展政协协商民主的深刻、丰富的理论认识，虽然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其自身长期的政协工作实践不断进行总结、思考、反复、提炼形成的，但经受住了长期协商民主工作历史实践的检验，对于今天我国政协协商民主发展仍然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699页。

^② 李维汉：《李维汉选集》，第331页。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综述

黎 园

(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 武汉 430015)

摘 要: 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职能, 已日益成为民主党派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笔者归纳了该领域研究的概况: 研究成果数量不少, 起步较晚; 研究队伍以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和成员为主; 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初具多样化、多维度的特征。对当前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背景和形势、定义、定位、内涵、作用和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经验与启示、对策建议等8个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 作出了归纳和评述。进而指出,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仍然是当前参政党理论建设的薄弱环节。针对该领域研究存在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 理论提炼不够等主要问题, 提出引入社会学理论, 注重跨学科整合, 整合研究力量, 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建议。

关键词: 民主党派; 社会服务; 参政党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54-06

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职能, 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积极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 在社会服务方面作出了许多探索,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创造出诸如“毕节模式”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服务品牌, 也使社会服务日益成为民主党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更好理解和宣传这一工作, 笔者对已有的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并由此对今后加强和深化这一研究主题提出若干建议。

一、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概况

1. 研究成果方面, 数量不少, 起步较晚。自民主党派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 各民主党派成员结合专业特点和自身优势, 自发地开展了属于社会服务领域的相关活动, 如民建黄炎培提倡的“实业救国、职业兴国”等, 为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树立了优良的传统。研究表明, 有组织的社会服务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的, 由于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服务主体单位一元化模式的打破, 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也经历了由启动到探索再到快速发展的阶段。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理论探索起步则较晚, 最早见于1997年九三学社陕西省委撰写的《加强参政党机制建设 努力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我们省社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情况》^①一文。著作方面, 在参

基金项目: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度重点立项课题“新时代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社会服务实践创新研究——以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为例”(ET201908)。

作者简介: 黎园, 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一级主任科员,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① 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加强参政党机制建设 努力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我们省社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情况》,《陕西社会主义学院院刊》1997年第1期,第14—18页。

政党有关专著的部分章节中,对社会服务有一些着墨,如李金河主编的《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①等。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将社会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全面建立基本社会服务制度、基本社会服务的重点任务、基本标准和保障工程等作出了规定。^②在政策刺激下,社会服务方面的文章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同年,农工党中央汪纪戎、刘峻杰主编的《同心同行——社会服务理论探索》^③成为第一本专门研究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文集;《同心同行——社会服务案例精选》^④成为第一本收集整理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一线经典案例的文集;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编辑出版了《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理论与实践》^⑤论文集。同一年相继出版的三本专题论文集,开启了系统研究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先河,但理论专著方面仍属空白。文章方面,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和“参政党”+“社会服务”进行主题检索,各有334条和186条(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剔除重复和大量宣传类文章后,理论类文章计有149篇,主要集中于近十年。其中,理论研究论文和工作体会类文章大体各占一半,绝大部分发表在中央和各地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民主党派和统战部门报刊上,还有一些发表在各级党委机关报纸和党校、高校学报上。理论文章中,硕士论文有8篇。

2. 研究队伍方面,以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和成员为主。出于对自身社会服务工作宣传的需要,加之掌握大量一手实践素材且亲历实践,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成员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同时,社院系统的一些教研人员发挥社院在统一战线中的智库作用,或承接课题,或主动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组成了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队伍的第二方阵。此外,随着社会服务的逐渐普遍化,近年来,也有少数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研究。

3. 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初具多样化、多维度的特征。这些研究成果或单独或综合运用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分别以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理论为指导,将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放在社会功能、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等视域下,或从服务文化建设、服务科技、民生、组织建设、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等角度切入,尝试对其进行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探讨,使得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对民主党派探索今后如何更好发挥这一职能提供了更多的方向。

二、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的主要观点

(一)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背景和形势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围绕中共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为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阶段性任务作出了巨大贡献。崔伟伟将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分作为“四化”服务(1978—1986)、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1986—1988)、智力支边科技扶贫(1988—2002)、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2002—)等四个阶段,^⑥揭示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时代性特征。同时,学者们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进行了分析。光雅芹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社会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行政体制改革为其提

① 李金河主编:《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86—194、249—253页。

②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2012年7月20日, http://www.gov.cn/jwqk/2012-07/20/content_2187242.htm, 2020年4月14日。

③ 汪纪戎、刘峻杰主编:《同心同行——社会服务理论探索》,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④ 汪纪戎、刘峻杰主编:《同心同行——社会服务案例精选》。

⑤ 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编:《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北京:开明出版社,2012年。

⑥ 崔伟伟:《新形势下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第19—20页。

供了宽广的探索平台,社会体制改革为其提升了服务的层次和水平。^①赵道静分析指出,工业化、城市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生活水平、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地位、社会与环境的矛盾等七个方面的新形势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②李容岑认为,新时期新阶段,参政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社会环境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社会公益事业不断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二是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三是社会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健全,成为参政党社会服务各项工作面临新的课题。^③

(二)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大同小异。如:肖朋添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通常是指民主党派结合自身特点,立足自身优势,组织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的界别群众,通过为社会提供无偿性和非营利性服务的活动,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有益行为。^④邢洁认为,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利用自身主界别的优势,选择某几方面如经济、科技、法律、医卫、文化等对社会公众或某一群体进行服务,是获得社会、群众信任的手段,也是民主党派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有效方式。^⑤

(三)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定位

在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定位上,学者们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服务从属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的范畴。如:马洪香认为,社会服务与调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参政议政的基础和载体。^⑥光雅芹认为,参政党的社会服务依托和服务于参政议政基本职能,以参政议政为切入点和落脚点。^⑦郑宪、赵剑云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是集政治价值、党派价值、社会价值于一体的参政议政行为。^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服务是独立的职能。如:李萍、秦岩等人认为,社会服务并非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延伸,而是与之相并列的一项独立职能,这一定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着深厚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基础,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助于民主党派更好地担负其他社会职能。^⑨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定位的两种观点,并未在社会服务与民主党派其他职能的关系问题上造成分歧,学者们对此有高度一致的看法,即社会服务与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三大基本职能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民进福建省委课题组则进一步分析了民主党派职能和自身建设的关系,认为社会服务是载体,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是目的,自身建设是保障,将四者紧密结合,能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目的。具体来看,自身建设是搞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基础,而卓有成效的参政议政、

① 光雅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社会服务研究》,《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2—33页。

② 赵道静:《新形势下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相关问题探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44—45页。

③ 李容岑:《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问题刍议》,《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1页。

④ 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课题组:《新时代做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的路径选择及思考——基于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的个案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56页。

⑤ 邢洁:《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5年,第8页。

⑥ 马洪香:《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第10页。

⑦ 光雅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社会服务研究》,《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2页。

⑧ 郑宪、赵剑云:《浅析参政党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的关系》,《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17页。

⑨ 李萍、秦岩:《社会服务:当代中国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26—29页。

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工作是加强党派自身建设的途径。^①

(四)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内涵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马洪香认为，随着党派组织的建设发展，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服务的内涵从直接的专业服务，转向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②王夫玉认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体现的价值是公益性、服务性、奉献性和利他性，以关注民生、关注公平、关注发展、关注稳定为服务内容，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共同进步为主要任务。^③光雅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社会服务，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引领。^④

(五)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作用和意义

研究成果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作用和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一致认为其在增强党派凝聚力、提升党派影响力、加强党派自身建设、创造社会效益方面成效明显。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代表性观点，如：赵洪鹏认为，社会服务对于加强党派成员的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具有良好教育意义，能够促进巩固多党合作制度健康发展、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⑤雷明贵提出，社会服务是参政党参政议政的“资料库”，是社会和谐的“助推器”，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黏合剂”，是参政党人才培养的“蓄水池”。^⑥陈晓晔从多维度视角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职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具有促进欠发达地区和未富裕人群兴业致富的重要的经济学意义，促进党派政治参与和提高参政议政质量的深刻的政治学意义，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明的伦理学意义。^⑦

(六)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主要形成了如下研究成果。马洪香认为，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存在工作力不从心、难以适应服务对象需求、难以取得服务对象信任、时间上存在冲突等四个方面的问题。^⑧王夫玉总结了认识欠缺、财力欠缺、人力欠缺、调研欠缺、机制欠缺五个方面。^⑨姚林强指出了服务内容形式单一、社会支持匮乏、自身管理混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⑩王勇超、沈捷雯认为，受民主党派自身资源和成员界别特点等因素限制，在社会服务理论研究、服务定位、渠道拓展、资源开发、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服务的力度和广度需要强化，社会服务地区差异较大，社会工作缺乏联动，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⑪光雅芹认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内容缺乏宽度和深度；方式较为分散，缺乏长效服务模式；对象多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忽视了其他社会群体的服务需求；社会服务的趋同化现象比较突出；党派间

① 民进福建省委课题组：《社会服务工作是参政党履行职能的重要载体》，《民主》2012年第12期，第8页。

② 马洪香：《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第6页。

③ 王夫玉：《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职能定位及创新路径分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23页。

④ 光雅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社会服务研究》，《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2页。

⑤ 赵洪鹏：《我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第6页。

⑥ 雷明贵：《定位、功能与路径：参政党社会服务辨析——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的考察》，《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12页。

⑦ 陈晓晔：《多维度观照下的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职能》，《民主》2012年第8期，第7—8页。

⑧ 马洪香：《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第6页。

⑨ 王夫玉：《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职能定位及创新路径分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24页。

⑩ 姚林强：《社会服务中的民主党派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5年，第23页。

⑪ 王勇超、沈捷雯：《浅论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以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例》，《上海商业》2018年第1期，第26页。

缺乏协作互动。^①

对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唐淑敏从执政党及政府方面的因素和民主党派自身因素两个方面,对影响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前者存在相关政策无法长期持续执行,相关部门人员对民主党派及统一战线没有充分认识及重视,民主党派外部的影响力低等原因,后者则具体有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缺乏完善、长效的机制,基层组织社会服务工作形式单一、内容老套,市级以下基层组织活动执行力低,市级党派机关的人员配备不足等原因。^②孔祥昊认为,主要是民主党派过于依靠政府、社会参与不足、角色认知不清、重视程度不够、专职人事缺乏、保障措施不全等因素造成的。^③

(七)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经验启示

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从实证角度出发,对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宣传,贡献了许多具有借鉴性和可复制性的经验做法。如:孙凡将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总结为直接参与、间接服务、社会联动三种模式。^④王复光则将其进一步具体为物资捐助、智力支持、建言推动、经济开发、定点帮扶、社区共建、国际合作等七种模式。^⑤王夫玉概括,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要坚持两个中心前提,即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个中心职能,拓宽和创新三条路径。一是核心路径,即中共统战部门牵头整合各民主党派资源开展社会服务;二是主路径,即民主党派上层组织牵头整合党内资源开展社会服务;三是协同路径,分为三种:民主党派组织牵头依托社会法人资源开展社会服务的法人协同路径,民主党派组织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开展社会服务的部门协同路径,民主党派发挥桥梁作用引导社会法人开展社会服务的中介协同路径。^⑥马传凯、王言快分析指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内容上,以智力服务为主;机制上,以整合资源为主;目标上,以打造品牌为主。^⑦雷婷、徐军提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要紧扣社会需求,依托成员优势,体现组织功能,构建完整体系。^⑧

(八) 关于民主党派社会工作对策建议

学者们主要从原则方法、打造社会服务新业态、加强自身建设、推进社会服务转型、建立健全机制等方面对提升社会服务工作水平进行了对策路径思考。符号认为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要特别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与参政议政工作紧密结合、应时顺势与以人为本、发挥优势与讲求实效、依靠党派成员又服务于成员四个原则。^⑨雷鸣强提出,打造适应新常态的参政党社会工作服务的新业态,要坚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原则,按照“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的策略,在升位、扩容、凝神、聚气、对焦、发力六个方面下功夫。^⑩雷明贵建议,推进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在基本理念上,以履行基本职能为中心,树立发展理念、和谐理念和合作理念;

① 光雅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社会服务研究》,《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3页。

② 唐淑敏:《南宁市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4年,第15—20页。

③ 孔祥昊:《我国民主党派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17年,第24—26页。

④ 孙凡:《新时期我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科技大学,2012年,第16—18页。

⑤ 王复光:《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模式选择》,《前进论坛》2016年第10期,第45—46页。

⑥ 王夫玉:《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职能定位及创新路径分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24—26页。

⑦ 马传凯、王言快:《“三个为主”开创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新局面》,《联合日报》2013年4月25日,第3版。

⑧ 雷婷、徐军:《社服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路径——以武汉市民建开展“双服务”系列活动为例》,《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3—14页。

⑨ 符号:《对加强新时期民主党派社会工作服务的思考》,《贵州政协报》2016年7月28日,第A3版。

⑩ 雷鸣强:《打造参政党社会工作服务新业态的路径分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27—28页。

在发展方向上,以“大统战”助力国家治理,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助力者;在工作模式上,着力平台搭建与服务支持,搭建以各民主党派中央牵头的工作平台、由党委统战部牵头整合同级民主党派资源的平台;在工作推进上,讲求分层推进,省市组织注重示范带动,基层组织倡导全员参与、就近参与。^①刘素英提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在服务内容上,实行由“随意化”向“精准化”转型;在服务手段上,实行由“分散化”向“集聚化”转型;在服务方式上,实行由“短期化”向“长期化”转型;在服务方向上,实行由“单方化”向“互动化”转型。^②机制方面,唐华生提出,构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激励引导、组织管理、人才保障、经验推广、理论研讨五大机制。^③张世坤提出,新时期民主党派要构建创新人才保障机制、多方参与机制、社会化服务经费筹集机制、项目带动服务机制和服务评价机制来推进社会服务社会化。^④

三、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建议

总体来看,虽然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且研究方法较多,但相较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和自身建设而言,社会服务仍然是当前参政党理论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表现在理论专著尚属空白,实务工作者的工作体会虽有一定理论提炼,但存在深度不够的问题。二是研究者以社会服务参与者为主,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视角狭窄、站位不高的问题。三是研究中社会学原理运用不够,社会服务首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属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范畴,在具有鲜明的政党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同时,也具有一般社会服务的社会属性,是民主党派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缺少社会学理论的支撑,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犹如单翼之鸟、独轮之车,难以迈向深入。

鉴于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引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注重跨学科整合。社会学范畴下的“社会服务”理论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理论探索具有本源上的借鉴作用,对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其存在的问题也能为民主党派创新社会服务提供一些思路 and 方向。在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中引入社会学理论,不仅能够整合和深化社会服务理论研究,也是对参政党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完善,能够帮助实务工作者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服务。

2. 整合研究力量,研究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特点十分鲜明。并且,不同党派的界别特色、同一党派不同地域的地方特色也有显著差异。建议多以“理论+实践”的思维整合研究力量,开展实证研究。民主党派干部和成员是社会服务的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和体验者,掌握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高校、政治学院科研人员等理论工作者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两方面人员开展合作,能从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研究能力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更好推动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的同时,还能从理论层面提炼形成更多可供复制和推广的规律,有助于推动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更好融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将对民主党派基本职能和自身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案例支撑,为新型政党制度注入更多的实践内涵。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雷明贵:《定位、功能与路径:参政党社会服务辨析——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的考察》,《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14页。

^② 刘素英:《新常态下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转型思考》,《四川统一战线》2015年第12期,第15页。

^③ 唐华生:《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价值和机制构建》,《前进论坛》2011年第11期,第23页。

^④ 张世坤:《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社会化问题探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40—41页。

民族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内涵、 诉求及其策略

武永江

(长安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情感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发挥着引领作用,其中积极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诉求表现为获取民族尊严、建构民族信任、增强民族权利、复兴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有习俗差异、情感偏见、情感孤独和民族猜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策略要以叙事激发情感共鸣、以互信建构情感关系、以共情增进彼此理解、以身份认同选择增强民族交融的牢固性。

关键词:习近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情感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60-08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因此,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①从中可以看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而这些要求的实现依赖于积极情感这一基础,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积极情感作为黏合剂。

当前,学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研究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②。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众多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其建设路径在于“强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③。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者认为,可以“从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法治基础和舆论基础六个方面着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④。从上述已有研究中发现,当前缺少情感视阈

基金项目: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统战理论研究重点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任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武永江,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陕西省委统一战线智库首批专家,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

② 邓磊、罗欣:《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路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第24—30页。

③ 李尚旗、郭文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期,第62—66页。

④ 沈桂萍:《从六方面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报》2017年11月3日,第5版。

的研究。而情感是一种动机力量，它不仅使各族人民的主观体验有序，而且赋予各族人民力量，增强民族团结行动的方向。因此，笔者从民族情感心理着手，探索解决我国国家治理中民族关系处理的情感问题，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路径方法。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内涵

民族团结重在情感凝结。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为此，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情感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部分，它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一种中华民族生命意识

人最容易认可和服从的是民族的价值。相比较于其他团体而言，人最容易感觉到自己是民族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点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情感生活里，它可能比人对国家的态度还要深刻。例如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因为“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民族的生命是长久的”。^①“中华民族”靠自己在长久生命里的深刻根源来吸引中华各族人民。

民族是历史和文明交融的复杂结果，它已然是理性化的产物，例如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民族的”和“人民的”都是以集体的潜意识为前提，以炽热的情感为基础。对自己民族的爱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和良好的情感。个体的人很少直接关切和意识到自己属于人类，他通常首先意识到自己隶属于更近的和更具体的民族共同体。通过民族生命，人感觉到代与代之间的交融，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交融。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一种中华民族思维意识

人的思维与情感结合在一起。“情感在个人感觉的产生中可以起引导作用”。^②人的日常思维充满着感觉，同时，它也充满着情感。日常思维、日常感觉和日常情感在人本学上是第一性的，决不能把它们从人的存在整体中抽离出来。正因为如此，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孤立地出现。它们同时并相互联结构成人的认识和行为特征，在实质上是彼此不可分的。其中，积极情感可以增强各族人民的能力，使他们的活动充满新的蓬勃的活力。例如，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这些中华民族情感引领着中华儿女的知与行，是一种动机，赋予各民族人民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

只要人们在一起生活和行动，就会形成一个“我们”的共同体。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中，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秉持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不断铸牢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其中对话交流，特别是民族、宗教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话，并不单是一系列的会谈，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领会和反映世界及其意义的方法，也是中华民族思维意识的显现。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一种中华民族文化意识

共同体意识有五个核心要素：互动、空间、活动、情感、规范，其中情感成就共同体家园般

^① [俄]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② [匈]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11页。

的感觉。人就是他们的情感。要知道人是什么,必须懂得他们的情感。反过来说也一样,要知道什么是情感,就必须理解我们称之为人的这个主体。情感是人这个主体的核心。一个民族是一个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当一个共同体的绝大多数人自认为要组成一个民族时,或者好似一个民族集体行动时,一个民族就这样诞生了。当一个重要的团体坚持这一信念时,它就产生了“民族意识”^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语言的群体能够成功地实现和平共处,主要得益于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对不同语言群体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强有力的因素,是隐藏在对同伴的社会承诺背后的力量。不仅如此,情感也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但同时,情感有时也是摧毁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

情感形成一种“能量”。它反映在人们的世界观中,构成社会组织、政权机构乃至人类的团结和纷争。抛弃中华民族遗产,拒绝捍卫中华民族,是衰败而非进步的表现,是国家病人膏肓而非健康的征兆。这种“疾病”不仅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到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虚无中华民族意识,抛弃中华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身心健康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病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每一共同体均有其个性化的价值体系,在此体系中的个体不应该在其日常生活中违背共同遵守的观念。如果共同体成员违背了这一价值体系,那么他就是在损害共同体。因此,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最终形成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诉求

很大程度上,理性和情感是相互兼容的。民族是一个人民共同体,成员通过一种信任感、凝聚感、公共文化以及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同时表现出以下诉求。

(一) 获取民族尊严

情感可以用来克服自卑感、改善性格和获得他人承认。其中共同体道德鼓励成员发展以关心与合作为基础的良性关系,而不是促进理性化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相互之间的漠不关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成员们把自己的自尊与福祉看作是受其各个同胞成员和作为整体的群体的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尊严是伴随着对所有生命的价值和弱点进行认同和接纳的过程,所获得的一种内在平和宁静的状态。”^② 尊严就是向自己和他人展现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值得被关怀和照顾。人们在任何关系中都不错过可能的机会,运用自身拥有的所有力量提醒身边的人,每个人存在的意义都是难以估量、无法取代的,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要想同时获得他人的尊重,也就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必须在符合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做出某种具有超越意义的高尚行为。因此,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尊重民族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深化创建活动,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

以各民族间的相互价值认同促进联结。每当各民族能够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每当各民族存在的价值能够得到彼此的认同,那种生而为人的满足感便会油然而生,而且关系当事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联结得更加紧密。同时,在互动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感也能够给予双方当事人某种必要的生命安全感。在各种人际互动行为之前,人们对尊严的初始渴望往往就已然存在,一旦在互动过程中感觉尊严受到侵犯,人际关系随即就会遭到破坏,进而激发争论、变革、分裂和战争。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各族人民以既不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等的方式接近对方;给予

^① [英] 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② [美] 唐娜·希克斯:《尊严》,叶继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对方无须害怕被负面评价并能够真实表达自我的自由；不带任何歧视和偏见地相互影响；相互接受民族、信仰、家族等可能构成各自身份的核心因素；坚信每个人都是诚实守信的。

（二）建构民族信任

一个国家应该有允许文化差异存在的空间。从长远的观点看，一个国家的视野必须足够宽广以容纳不同的文化经验。例如对于网络舆论，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评价任何事物的优劣，都是基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对于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必须允许他们参与讨论并贡献意见。这种鼓励民族之间的合作在三个方面是有益的：“首先，它使小民族的成员得以过充实而满意的民族生活；其次，它通过减轻少数民族成员的同化压力而赋予个体以自由；第三，它巩固了以下的观念：发展繁荣的民族生活并不依赖于排外或孤立，而是依赖于跨民族性的发展。”^① 上述合作模式意在使各民族的差异得以充分表达，并尝试通过强调共同的跨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而缩小不同的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安排鼓励特定民族的所有成员在特殊情况下建立统一的阵线，在一般的情况下推进跨民族的联盟或合作。

（三）增强民族权利

少数民族群体希望成为现代自由社会享有充分和平等权利的一员。他们寻求全面融入自由民主社会的主流中，以便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技术和大众媒体等等公共资源。其中社会性文化促进民族交融，用来强调它是由一种共同的、团结合作的心理认同基础和情感联系，而不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家庭习俗或个人生活方式等组成。参与共同的社会性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促成民族团结的基本条件，因为它宣扬了一种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

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如果国家机构不能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文化和认同，结果可能就是严重伤害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主感。”^② 因此，要求主流群体必须愿意承认少数群体为平等的公民，也就是说，愿意让少数群体分享全部的权利和机会，愿意与少数群体成员一同生活和工作，并在必要的地方调整主流机构以包容少数群体独特的需要和习俗。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

（四）复兴中华民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好。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③。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国家强大、民族强盛，是每一个中国人尊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各族人民

^① [以] 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② [加] 金里卡：《少数的权力：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

民族是由文化、政治和心理等因素所促成的复杂现象，其中情感是人这个现象的核心。相反的感情总是相互排斥的，相同的感情总是相互吸引的，而且感情越强烈，这种相斥相吸的力量就越大。

（一）习俗差异

习俗差异常常是形成民族分歧的基础。每个民族个体总是成长于某个特定的文化习俗共同体中，并使自身符合这个共同体的规范。每一个民族个体都是通过他的“风格”而被认识的，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独特的“模式”而被认识的，这种模式给他的活动以潜在的统一性和区别性。其实，不同文化习俗背景中的民族总是生活在不同的“构想世界”中，他们总是试图运用自己的思维模式，把握周围事物的表象和结构，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关联。但是，文化习俗的差异常常引起各民族的误解和冲突。这种多元文化情境中的基本问题是，各自宏观文化中的成员会彼此产生意见或者偏见，或者这些成员虽然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只承认自己文化的正确性。

文化有民族优越感倾向。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时，这成为非常明显的潜在摩擦来源，特别是我们常常不注意自身存在民族优越感的态度。人们往往由于缺乏对其他文化习俗的明确认识，总是趋向于用自己的文化模式去理解和判断他人的文化，并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同化他者。尽管看起来好像是平等地对待了他者，但是结果还是有失偏颇。平等要求既要忽视无关痛痒的差异，也要全面考虑那些合理的和重要的差异。差异没有影响各自要求的平等性以及相互平等对待的责任，但的确影响了各自要求的内容以及自我该如何平等对待他者的观念。民族平等要求不考虑种族起源，所有的民族群体应被平等地对待，应当享有平等获得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和能力的权利，并且要求重要的、合理的民族文化差异应该被考虑进来成为相互平等对待的因素。

（二）情感偏见

情感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识别力、有逻辑并前后一致的。情绪研究表明，积极的感情状态有助于形成解决问题的全面的、灵活的而又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而消极的感情状态可能会形成呆板的、分析式的思维方法，甚至造成认同冲突或导致一定紧张关系。当冲突的任何一方过于依赖自己对事件的理解，有时以非公认固定表达的含义来解读情境时，冲突就会激化。

偏见是超前判断，不符合实际的主观臆断。民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会形成不同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态度，其中偏见使他们倾向消极对待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人，这会影响到这个民族群体或其中某个成员个体的交往。偏见还可能形成一种文化。我们一旦将这种刻板印象与某个民族群体联系起来，我们就倾向于根据对该群体的总体印象去观察个体成员，然后，定型某人。当偏见发展到憎恨的时候，就会变成固执。民族认同不仅受到自己民族独特或“特别”的信仰的塑造，而且有时会以消极整合的方式塑造，即另一民族或种族被描述为威胁或敌人。不同民族的生存不应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应是共生共存。

（三）情感孤独

无法融入导致情感孤独。当某些民族个体融入不了周围群体时，他会感到空虚和害怕，从而产生某种孤独感和落寞感。这不仅是因为他想要得到周围人群的保护，更基本的原因是人类在与他人的关联中能获得其成为自身的最初体验。孤独感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需要与他人的关系以对自己进行定位。因为真正的威胁是不被他人所接受，被抛出于群体之外。

情感孤独导致心理失衡。如果一些少数民族个体长时间处于孤独的状态或者边缘境况，很少有其他人与之交谈，那么他们通常就会害怕，害怕失去自我的边界，伤害自尊心，以至于难以参照他者来定位自己而导致心理的失衡。喜悦没有同伴分享，郁闷没有同伴沟通的状态，是会令人

恐惧的。因此，只有感情到位了，思想上才能要求进步，行动上才能团结。这也是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根本所在，即促进各民族人民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使各民族亲如一家。

（四）民族猜忌

各民族之间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持久并经得起考验的积极性。缺乏信任，一切都走向反面：高尚的行为会遭到怀疑，被认为是居心叵测；一切为民族之间积极关系的倡议和努力往往被理解成某种伎俩，以便实现政治操纵。如此一来，一切都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无法采取进一步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措施。这样就存在一种危险，即一些民族个体可能会认为另一持不同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的民族不如他们那样成熟、有知识或“正确”，甚至更为严重的是认为他们低人一等。

没有一种深刻的团结情感，一个政治社会将会解体为争吵不休的派别。我们需要团结来让人们关怀彼此的命运，愿意为他人做出牺牲。没有这种意愿，和平的政治社会的可能性就会消失。例如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风俗习惯，在重大民族节日期间，组织慰问活动，用真情和温情感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灵。因此，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策略

一个民族的建构源于包容和排斥的逻辑。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其成员有着对政治先例的共同认同，拥有共同的民族历史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共同记忆，对过去共同的经历有着荣辱与共、同喜同悲的感受。虽然国家的基础是法律和权力，但是共同的民族意识则要靠许多复杂的因素来维系，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等。其中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潜在因素。

（一）以叙事激发情感共鸣

有什么样的群体，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共识，也就存在什么样的群体，这种共识使人超越自我中心观点来看待事情，建构共识的群体。民族就是以民族的共同性建立的民族共同体。为此，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要形成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一个好社会所必要的团结一致的重要基础，源于交往的一个共同场所，源于大家共有的记忆、传统和风俗习惯，源于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共同的文学所表达的情感与思维的共同方式。另外，每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都有独到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都是通过故事、神话和历史传达出来的，这些记忆都有助于理解各个民族互不相同的现状。正因为对过去的理解构成了现在的一部分，民族的概念才有一个纵向上的时间成分，即民族的“时间深度”。

人类喜欢分享对事物的情感和态度。当人们开始越来越密切地关注其共同的行动、更知道彼此的所做所感，也更了解彼此的意识时，他们就会更强烈地体验到其共享的情感，在有着共同文化和共同语言的故事讲述者与听众中讲述、改造、再讲述和评价故事，形成并传播诠释性观点。因此，这些故事可以拉近领导者与各族人民之间的距离。通过讲故事来说理很有效，比简单的断言要有效得多。这样的故事激发情感共鸣，而这样的情感共鸣会久久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正是各种故事构成了一种文化——共同体文化。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社会主义参政党，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命运，都在其参与者心中烙下了内在统一的印记，使他们连在一起，融为一体。“领导人打造并分享这些故事，通过分享这些故事，他们也打造了某种文化。”^① 历史总是充满了感人的以及煽动人

^① [英] 西蒙·兰卡斯特：《感召力》，田金美、洪云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38页。

心的故事，直击人们的内心，直面人性，从而激起人们共同的希望。

（二）以互信建构情感关系

不同民族之间潜在的不安全感源于个人在一个敌对世界里的孤立状态。当一个民族不能给民族成员的个体提供安全、发展和自由，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就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根据。就个人而言，人被划定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不同的地区。当他在一个特定的民族里失去了生存权和其他权力时，就不会认同该民族，这取决于他所认定的价值观念。因此，要给予中华民族中不同民族成员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充分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在做好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中，要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在做好民族学生工作中，必要时要建立民族餐厅，聘任少数民族厨师，严把食材质量，丰富饭菜品种，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优质生活服务。

信任和身份认同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人们之间积极的情感关系如果没有信任几乎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① 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和行为的可能性，哪里就有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加，也就有能与结构相调和的诸多可能性的增加，因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式。信任总是与关键性的选择有关，背信弃义所造成的损害难以弥补。因此，要求有共同的承诺，并且只能由卷入其中的双方以一种固定的次序，信任者在前，被信任者在后，对它加以检验。信任的形成可以加强相互认同，同时信任一般以相互认同为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开阔的胸襟、平等的心态、民主的作风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努力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氛围。

（三）以共情增进彼此理解

理解是一种分享功能。民族的感受及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理解、建构以历史为基础，这一建构过程，往往结合理解和诠释。其中理解是一种分享功能，而非私人功能。理解意味着要以彼此都共同采用的方式去解读，通过某种彼此共享的媒介让人们联系在一起，并接受中华民族的普遍经验。反之，互相谴责对方是毁掉一段关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双方一直维持这种“错不在我，都在对方”的谴责态度，那么这段关系想获得改善就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谴责对方，也就意味着把改变这段关系的责任归于对方，这种态度让两个主体之间瞬间就能产生冲突。但是，共情让人们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里，去慢慢感受对方以不断消解相互之间的理解壁垒，从而让人们们的担心、压力源和偏见都暂时搁置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创造了有意义的关系。

共情增强人们的感知能力。“共情是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做出反应的能力。”^② 共情能够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主义的行为。当你表现出共情时，对方的防范意识会下降，积极的能量会取而代之。这意味着人们可以用更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共情能够让人们准确地理解所处的环境和情感关系。例如透过近代历史风云，两岸同胞深刻体会到，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国家强大、民族强盛，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生存、发展、尊严的保障。当人们生活共情中时，将会设身处地对待另一个人，懂得他过去的经历，用他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世界，感受着他的情感，想象着他的想法。共情增强各族人民的感知能力，拓宽理解的深度，能够真正理解遇见的另一个人或组织是如何想的。共情倾听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感，有助于富有同情心的情感的释放，可以减少恐惧、偏见，从而增加民族理解力和安全感。

（四）以身份认同选择增强民族交融的牢固性

个人身份能够得到集体认可和公开表达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和命运共同体。如果人们关

^① [德] 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② [美] 亚瑟·乔拉米卡利：《共情力》，耿沫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3页。

心彼此的命运，并且希望分享彼此的命运，那他们就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民族只有在其成员共同拥有一种群体成员身份认同感的时候才存在。认同是一种互主性或者主体互动性观念。认同的形成不仅需要发展一种“我们是谁”的集体意识，而且需要一种“我们与他者是如何区别”的集体意识。但是，没有某种身份是固定的，每一种身份都需要被阐释和建构，而且没有什么能保证这种建构总会完成。人们这种相互关系的基础是关联性，并且是这样一种信仰：我们都属于一个群体，我们认为这个群体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成员发展出相互的情感，这种情感为承担相互的义务提供道德上的正当性。没有这种道德正当性，“关爱型国家”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共同体的团结创造出关联性与共同命运的感觉，它使特殊取向的关系充满道德的力量，它支持“美德始于群体”的主张。

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归属，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许多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争端都与有着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有关。因为“关于自己身份的观念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①。不幸的是，许多主观上试图制止这类争端甚至暴力冲突的良好意愿，也往往由于认为关于人们的身份没有多少选择可做而遭遇挫折，这严重损害了人们克服暴力的能力。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其结果或是简单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只有承认人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而理性地思维，也许才有可能实现当代世界的和平。

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会造成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常常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认同感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彼此，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也就是说，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同伴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认同感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将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基于身份的思考中，推理与选择的作用极其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个体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归类，而每一种都可与人们的生活有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层、职业、社会地位、语言、政治立场等。由于出身、社会联系和联盟，每个民族个体实际上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如果允许且鼓励人们去过他们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让现存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生活，那么，文化多样性就会得以提高。追求不同民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自由，如饮食习惯或音乐艺术，这能够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更富有多样性。

责任编辑：杨松祿

^① [印]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多民族杂居区族际交往与民族团结研究

——以云南省孟连县回俄村为例

罗利群，郝月梅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孟连傣族佤族拉祜族自治县内的回俄村是一个以傣族、拉祜族、佤族和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村，村内各民族家庭间纷纷结成“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关系，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生产互帮，生活互助，文化互融，一同团结进步，成为孟连县“族际间团结和谐机制‘宾弄赛嗨’的示范点”。“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模式形成于回俄村的生活世界中，具有主体间性、缘起多样性、深度互嵌性，促进了回俄村的社会整合与团结。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回俄村“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理性的研究，可为多民族杂居区的民族团结事业提供一种理论视阈和现实方法。

关键词：回俄村；宾弄赛嗨；族际交往；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D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2-0068-08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东部和东北部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接壤，西北部与西盟佤族自治县毗邻，西部和南部与缅甸佤邦交界，其1893.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以傣族、拉祜族、佤族为主的21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6.4%。^①孟连县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境地区，分别在1990年和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先进县”^②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③。孟连县民族团结局面的形成既是党和政府民族工作的成效，也有民间族际交往的突出功劳。在孟连县的生活世界之下，不同民族的家庭间以地缘为基础，发展出代际相传的情缘，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关系，满足哈贝马斯所提的交往理性，长久性地促进孟连县各民族间团结和谐的局面。当地居民推介的微信公众号“云南微生活”中有一篇文章：《“宾弄赛嗨”：云南普洱开出的民族团结之花》，文中提到，“孟连县景信乡回俄村的景信一二组是孟连民间族际互动传统——‘宾弄赛嗨’的发源地”，回俄村也将这一族际交往传统发扬至今并注入新的时代血液，因而成为孟连县“族际间团结和谐机制‘宾弄赛嗨’的示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云南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CMZ020)。

作者简介：罗利群，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郝月梅，云南民族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① 孟连县人民政府网站：《孟连县基本情况》，2019年3月10日，<http://www.menglian.gov.cn/info/1111/1017.htm>，2019年10月7日。

② 孟连县志编委会：《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③ 普洱统一战线：《孟连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成效显著》，2018年12月20日，<http://www.peswtzb.gov.cn/nd.jsp?id=1102>，2019年10月10日。

点”。笔者以回俄村为田野点，围绕“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模式进行调研，了解“宾弄赛嗨”的现实情况，梳理其缘起与发展。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分析回俄村“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模式的内涵与特征，进而促进对“宾弄赛嗨”的深入研究，为其他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建议。

一、回俄村概貌

回俄村委会距离景信乡政府驻地1公里，全村国土面积41平方公里，属南亚热带湿润气候类型，年温差较小，地形属于山区与主谷坝相间的复合类型，群山环抱中有一些宽谷盆地，因地貌差异大，境内的气候垂直差异明显，气温随海拔上升而递减，故有“立体气候”的特点。加之南磊河支流途经回俄村，故河谷地带的气候资源和水土资源比山区更为适合农业生产，回俄村村民的居住地往往具有地势差异。回俄村共有14个村民小组，各小组只有一个主要民族居住，其中傣族聚居于景信一组、景信二组、东岛寨子；拉祜族主要聚居于撒拉科大寨、撒拉科小寨、回俄一组、回俄二组；佤族主要聚居于班艾小组、回亮新寨、贺糯一组、贺糯二组；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的民族杂居区包括东岛新寨、付恩新寨、独固小组。2004年和2012年，独居山头的撒拉科大、小寨和班艾小组分别搬迁，完全实现各村民小组空间上的互嵌，形成多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全村共有804户3044人，傣族、拉祜族、佤族占总人口的80.7%，傣、拉祜、佤族分别占比33.4%、31.1%、16.3%；其余人口为汉族和少量的哈尼族、彝族等。各民族族源不同，具有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或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认同。据统计，回俄村的景信一二组，共有136户傣族群众与周边其他民族结成了579户“赛嗨户”，占比达到52%，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回俄村的族际交往甚密，各民族间具有以家庭为单位的族际来往。

二、“宾弄赛嗨”的内涵与缘起

（一）“宾弄赛嗨”的内涵

“宾弄赛嗨”系孟连傣语，“宾弄”意为亲戚，“赛嗨”意为朋友，“宾弄赛嗨”则为“像亲戚一样的朋友”，^①特指传统上傣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结交的“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十分友好、来往密切，不是亲戚但胜似亲戚的隔代传递的朋友关系”^②。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将交往行为定义为“个人之间（口头上或外部行为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由此达成主体间的理解和共识，以实现行动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③从内涵上说，回俄村的多民族家庭间结成和保持“宾弄赛嗨”关系的过程就是多民族家庭之间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对话过程，并理解主体间相互的状况，遵守共同的伦理规范，建立协调共通的生活世界，形成共同信任的互动过程。

哈贝马斯提倡不同民族之间，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彼此学习对方的长处。回俄村各民族间存在族源、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异性，进行交往行为的主体间大致包含以下四层涵义：第一，它是不同民族的两个家庭间全员共同参与的主体间行为，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代际继承性；第二，它以语言为沟通和协调关系的重要媒介，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结交“宾弄赛嗨”的年老村民除了傣语外，还具备拉祜语和佤语的听说能力，年轻人除了傣语外，多使用

^① 任新民、陈娜：《以利益协调为着力点，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难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8页。

^② 孟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宾弄赛嗨”宣传册》，2018年。

^③ [德]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洪佩郁、蔺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21页。

汉语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第三,遵从一定的交往规范,这些规范一部分来源于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的“礼”:不需要外在的权力机构来维持,而是在教化中形成的个人的敬畏之感,是社会公认正确并被主动服从的行为规范;^①另一部分是在主体交往的相互理解过程中达成。比如一方主动借钱给急需用钱的“赛嗨”,不需要借据、担保人,而“赛嗨”只要粮食收成获得收入就及时还债,并附礼物以答谢“赛嗨”施以援手。第四,交往以对话为主要形式,即你来我往的平等接触,彼此尊重,互相理解差异、共同信任情感,和谐共存、友好相处。

(二)“宾弄赛嗨”的缘起

“宾弄赛嗨”在2018年4月正式注册为专利商标^②,其交往行为植根于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世界。回俄村的生活世界是结成“宾弄赛嗨”的家庭主体间共同信赖和熟悉的背景,是为交往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相互理解可能的,建构性范围的因素的总和^③。哈贝马斯依据康德意识哲学的先验框架,将生活世界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外在实体的总和为物质世界,人际关系的总和为社会世界,主体经历的总和为主观世界。^④对于身在其中的成员而言,生活世界不言自明、无需论证,他们甚至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通过史料和访谈资料,得知在官方族际互动的引领下和传统农业社会互助模式的促进下,“宾弄赛嗨”得以形成并确立。

孟连土司历史上的官方引领作用。孟连土司与周边各民族的互动关系对于民间族际互助具有引领作用。据孟连傣族史料记载,公元十三世纪,勐卯(今德宏州瑞丽)傣王逝世,二子为继位引起内乱,朝廷派兵干预,首领罕罢法率臣民分三路南下寻找新的领地。在途经佤族西盟时,受到佤族头人布岗的盛情接待,双方互相钦佩,罕罢法向布岗的女儿求婚得到应允。在婚宴上,双方互换象牙和牛角为信物,盟誓“牛角不会枯,象牙不会烂,永世长存,傣族和佤族永远是亲戚”。罕罢法将很多黄牛、水牛和男女衣服送给马散头人,并向马散讨得地盘。布岗闻知罕罢法即将迁往孟连坝子时,遂将女儿名字改为叶连。公元1289年,罕罢法在孟连建立政权后,形成“以傣族为父,佤族为母(傣语,波傣咩佤)”的政权特征。^⑤到孟连第二十七世傣族土司,因战后和亲,与萨尔温江东岸的蟒冷佤王联姻。末代土司刀派洪也娶缅甸冷王之女召嫡罕弄为正室。^⑥

明永乐四年(1406年)设孟珰长官司,隶云南都司。辖地东隔澜沧江与威远州(今景谷县)相望,并与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州)接壤,南与勐艮府(今缅甸景栋)相连,西与木邦宣慰司(今缅甸东枝、腊戍等地区)以喳里江(萨尔温江)为界,北与猛緬司(今临沧、双江县)和勐定府(今耿马、沧源县)毗邻。嘉靖时期(1522—1566),因孟定长期互侵仇杀而衰败,孟珰长官司被废。^⑦公元1770年前后,勐艮府土司与车里宣慰司争战多年,车里土司失利,求助于孟连宣抚司。后来在孟连土司的帮助下,车里土司赢得了战争。为酬谢孟连土司,车里土司将女儿嫁给孟连土司为妻。随着车里宣慰司和孟连宣抚司之间的联姻,芒景布朗族从西双版纳辖区转入孟连,芒景布朗族与孟连傣族开始频繁的族际互动。^⑧

公元1835年,孟连宣抚司的官员们经历了经年不断的战乱之后,深刻认识到应当与周边地区的土司建立友好关系,把广袤的土地变成“亲亲戚戚”居住的“勐”。经过孟连土司官员的一番

① [德]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52—54页。

② 孟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宾弄赛嗨”宣传册》,2018年。

③ 艾四林:《哈贝马斯论“生活世界”》,《求是学刊》1995年第5期,第4—9页。

④ [德]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141页。

⑤ 孟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宾弄赛嗨”宣传册》,2018年。

⑥ 张海珍:《〈孟连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访谈稿》,孟连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2016年。

⑦ 孟连县志编委会:《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第25页。

⑧ 郝亚明:《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4—20页。

努力，孟连、车里、景栋三方土司达成了共识，派官员在景洛的一座佛寺内举行了友好仪式，并请长老念经祈福：愿天神帮我们牢牢记住，从今以后，孟连、车里、景栋三地的百姓永远都是亲戚，三个召贺罕要相互尊重，互不侵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①

传统农耕社会中百姓的互助往来。孟连土司与其他民族土司几百年来就有着联姻联谊互相往来的传统，土司之间既有政治上的互相需要互相帮衬，也产生着同甘共苦的“宾弄赛嗨”情谊。继土司官员开此先河之后，孟连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具有地缘关系的民族间长期的共同生产劳作，为建立这种关系提供了基本条件。笔者访谈中得知，回俄村的傣族民众首先定居于此，接下来撒拉科、班艾、回俄等处的佤族、拉祜族才相继到达。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付恩新寨和东岛新寨才有大规模的汉族迁入。笔者在田野访谈村民时，东岛新寨58岁的拉祜族WJ谈到，由于饥荒，在他年幼时姊妹六个便随父母从澜沧搬了过来，那时候村里只有十多户人家。回俄村刚刚迁入的村民，往往面临着人地生疏，缺乏生产生活资料的境况，因此后迁入者主动向周边村民寻求帮助，周边村民也朴实真诚地向后来者提供实际的帮助，因此族际互动从各民族的聚落形态生成起便开始产生。

以坝区傣族为主体的“宾弄赛嗨”族际互助后来也围绕山区坝区的基本模式发展起来。各民族为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各自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空间，使民族间的聚落分别呈现出水平空间分布和立体分布的规律性，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多样性特征。回俄村的14个村民小组中，景信一、二组分布于坝区；撒拉科大、小寨分布于山区，2012年班艾小组搬迁以前也是在山区，搬迁后位于半山区；东岛新寨、回亮新寨、东岛傣族寨、回俄一组、回俄二组、贺糯一组、贺糯二组、付恩新寨、独固小组都是位于半山区，居住地也对应各小组的土地分布，因此山区和坝区在生态环境和生计模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孟连县形成了“山上缺粮、缺物找坝子，坝区缺草料、烧柴找山上”，形成了山区-坝区物资互补。^②

回俄村中，稻谷作为粮食作物，坝区河谷水稻种植一年两季，半山区的盆地水稻一年一季，山区的旱稻一年一季，产量最低。因此，在早年间，山区向坝区借米借谷子的情况很多。景信二组68岁的BAN讲述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佤族的“赛嗨”会来跟他借粮食，借走的谷子往往无法还上，坝区农忙时，“赛嗨”会主动来帮助家里干活；或者活不太多时，会把自家的八九头牛送给牛草丰富的山区“赛嗨”帮助喂养，产下小牛两家平分。景信一组79岁的BYZ谈到自己在外村有四个拉祜族“赛嗨”，都跟他借过粮食，也帮过家里收割水稻、甘蔗等。58岁的BZK讲述了他们家的“赛嗨”以前也借过大米，到了山区的玉米收成时，就归还玉米喂鸡；或者会以小猪崽交换。

三、“宾弄赛嗨”的现实表现与主要特征

（一）“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的现实表现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以合作化为基础的意义过程。^③回俄村“宾弄赛嗨”的合作共融是长期性（甚至是隔代的）、全方位的，基本体现在生产、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生产互帮，共同发展。据笔者田野调查了解到，每年傣族关门节前夕，也就是公历7月底，早上9点左右，班艾老寨的佤族LNL的丈夫都会早早地去跟傣族“亚搓”耙地，回俄一组的拉祜族LJM的儿子会开着“光头强”（当地人对微耕机的称呼）去跟景信一组的“跨婆波嘛”耙地。种旱谷的班艾小组和回俄小组，这时还不到收获季节，但坝区傣族的第一季稻米已经收割，需要趁着好气候尽快插第二季的秧，于是山区、半山区的村民都会纷纷出手帮忙。据研究者赵芳等人的采访资料，景信一组的AX

① 孟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宾弄赛嗨”宣传册》，2018年。

② 中共景信乡委员会：《景信乡民族团结示范乡创建工作汇报材料》，2018年。

③ [德]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135页。

曾回忆道,十来年前,她和丈夫岩晃在每年的1、2月份,都要到附近的班艾小组去帮自家的佤族“赛嗨”户撒秧。“以前他们寨子种的是老品种的谷子,品种不好,种的技术也不好。我们去帮忙,也会提意见,他们也会来我们这里学怎么播种、施肥、管理,然后就跟着做,做着做着就会了。”^①

自古以来,回俄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大多都是傣族同胞聚居在坝区、拉祜族同胞聚居在半山区、佤族同胞居住在高山区,后迁入的汉族同胞杂居村落位于半山区,因坝区、山区的地理位置及纵向生态环境的差异,逐渐呈现出了傣族、拉祜族、佤族、汉族们不同的农忙时节。大包干时期,当山区拉祜族、佤族同胞播种玉米、旱谷及收割的农忙季节,傣族同胞便纷纷来到山区寨子主动帮助他们,同时每逢坝区插秧、收割稻谷的农忙季节,山上的拉祜族、佤族也会来到帮助过自己的傣族同胞家里帮忙插秧、收割。在后来的生产劳作中相互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相互传授先进种植技术,相互推荐新兴优势产业,积极探索“一地多用”立体产业模式,利用咖啡园、茶园套种澳洲坚果,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砂仁。目前,回俄村的景信一、二组和回俄一、二组的砂仁和澳洲坚果均已投产,而其余小组也相继种植,即将投产。

生活互助,情同手足。据笔者调查,回俄村党委书记岩相(傣族)家有15户“宾弄赛嗨”,其中10户为代际传承,5户为新结交。AX家结交最久的一户佤族“宾弄赛嗨”已经传了四代,有近百年历史。上世纪70年代粮食不够吃,爷爷辈的佤族“宾弄赛嗨”专门从缅甸背粮食送给他家。改革开放以后,傣族发展快,他家又反过来给拉祜族“赛嗨”送粮食。他家这一辈的佤族“宾弄赛嗨”的名字叫AEL,50岁,现在依然经常联系。他家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也会打电话来,比如咨询建房或种蔬菜的技术。岩而来回忆,两年前家里建房子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够,AX给了石棉瓦和水泥,去年还送了一百斤谷子等。

虽然回俄村的傣族历来种植双季稻,粮食充裕,但有时也会因各种原因缺粮,如在20世纪前叶以及“文革”时期就曾经几次不得不“背金背银去换包谷、麦子”,最后靠山区“赛嗨”的帮助才熬过来。所以每逢节庆,他们一定要带上米、酒、肉和葱等佐料去山里“串亲成”。同样,山里的拉祜族、佤族“赛嗨”们也会带着鸡、野果、野菜、蜂蜜和猎物等来串亲。“彼此离不开,就成亲戚了”,许多老人说起最艰苦时期的族际互帮情景现在还会流泪。现在各民族生活水平较20世纪大大提高,生活上的互相帮助不再仅限于粮食,而是相互借钱、借农耕机器、学习新作物的种植技术等,共同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与进步。^②

文化共融,血肉相亲。在以上的生产互帮、生活互助的过程中,在双方的精神性互动与物质性互动中也进行着文化互融。在语言交流方面,村内五十岁以上的男性老人,均不同程度会使用至少一种周边民族语言,女性老人也会一些简单的日常语,这些语言往往是在和他们的“宾弄赛嗨”“跨婆波嘛”“亚搓亚巴”“干亲”等的族际交往中学会的。而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年轻一代们往往是以汉族方言为中介语在新结交的“宾弄赛嗨”间进行交流。正是基于“宾弄赛嗨”关系,不同的民族间纷纷打破界限,进行族际通婚。在笔者访谈中,59岁AH说他们这一辈在村子里没有和其他民族结婚的,因为长辈传说,寨内如果娶了外族女子,这一家的后人要经过九代才是纯正的傣族人。在73岁的BAH等老一辈的眼中,其他民族的女子不及傣族女子勤快,嫁进来会导致整个家庭生计落后。因此,以前回俄村各自然村小组多是近亲婚、同村婚的民族内婚制。但是在最近十年之间,几个少数民族寨子的通婚禁忌已被打破,现在每个寨子中均有通婚现象。特别是在汉族杂居村内,通婚早已是普遍现象,东岛新寨铁金发一家四代就融合了傣族、拉祜族、彝族和汉族四个民族。在房屋建筑风格上,“赛嗨”之间起房盖屋会互相帮忙,一起设计规划出主

^① 赵芳、纳梦月、孙铭:《比“边地绿宝石”更美的是“宾弄赛嗨”的情》,《今日民族》2018年第5期,第6—9页。

^② 赵芳、纳梦月、孙铭:《比“边地绿宝石”更美的是“宾弄赛嗨”的情》,第6—9页。

意，所以目之所及的各小组房屋风格除屋顶各民族的标志性图腾各具特色以外，其他基本一致；“赛嗨”的交际不仅体现于农忙需要劳动力时，而且岁时节庆和人生重大庆典时，皆邀请“赛嗨”共度。如拉祜族的葫芦节、佤族的新米节、傣族的泼水节、汉族的春节都会打电话或亲自上门去请他们的“亚搓亚巴”“跨婆波嘛”“宾弄赛嗨”和“干亲”到家中做客，客人来时会上自家做的糯米粑粑、酒水等作为礼物，同时隆重地穿上本民族服饰加入到节日音乐和舞蹈的狂欢中。

（二）“宾弄赛嗨”类族际关系的主要特征

回俄村“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主要有三个特点：主体间性、缘起多样性、深度互嵌性。

一是交往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由胡塞尔提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一个衡量标准，它是指交往双方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或“人与物”的关系，交往中的每个人对相互关系保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可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回俄村的“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关系。“宾弄赛嗨”是孟连傣语，被回俄村傣族村民用来称呼其他民族的“亲戚一样的好朋友”，而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中，回俄村除傣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都主动与周边民族缔结类似的互助友好关系，并且都形成了相应的民族称谓。拉祜族称之为“亚搓亚巴”，意为朋友；佤族称之为“跨婆波嘛”，意为娘舅一样亲的朋友；^①汉族称之为“干亲”，即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戚”。^②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时常问起傣族以外的民族“宾弄赛嗨”是什么意思，拉祜族以外的民族“亚搓亚巴”以及佤族以外的民族“跨婆波嘛”分别是什么意思，但凡结过这类关系的老年人都像回俄一组拉祜族居民张娜儿一样，满脸笑意地告诉我们这些词的正确意思，可见各民族对此的表述不同，意义却是一致的。在回俄村，只有傣族信仰人为宗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同时傣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信仰自己的原始宗教，结成“宾弄赛嗨”的各民族家庭间互不干涉信仰。各民族族源不同，分别有各自的语言，有各自的民族服饰、饮食、礼仪和禁忌习俗，但是不同民族的家庭并不以某一个民族为主体，要将其他民族被动涵化，而是各民族地位均相对对等，且相互结交的各民族间具有稳定的文化互渗，文化圈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结交关系的各方充分发挥主体性和主体意识，主动地共同构建和维系关系。

二是交往缘起的多样性。回俄村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缘起多种多样，且随着时代发生一定的改变。通过整理访谈资料，“宾弄赛嗨”的缘起主要有以下几类：20世纪的“宾弄赛嗨”主要产生于一方借米借粮，而另一方以帮工偿还并答谢；由于20世纪交通不便，有时回俄村人从集市卖完菜要走到深夜才能到家，于是会歇脚在路过的邻村人家中，因类似情况也会互结“宾弄赛嗨”。近几年，村内各养牛合作社成员间分工合作，村民也会结成“宾弄赛嗨”；到如今，新一代年轻人的“宾弄赛嗨”一部分来源于家里老一辈关系的传承，遵从傣族俗语“埋波档进，宾弄档朱”，它的意思是“是竹子就节节相连，是亲戚就代代相传”，虽然很多老人已渐渐过世，但是下一代相互之间又结成了“宾弄赛嗨”；有的是回俄村党员之间互结关系而形成“宾弄赛嗨”；有的经朋友介绍，有的是节日庆祝场合中相识而结成“宾弄赛嗨”。以前这种关系主要来源于家庭的男主人，现在家中女性也有一定的结交机会，比如女子出嫁后形成的新家庭依然会跟娘家的“宾弄赛嗨”互相来往，村里组建的舞蹈队女子成员居多，妇女们接触增多，这些不同民族的妇女之间也会因此相互结交，此外，共同到别的寨子做工的女性劳动力之间也会互结友谊，然后将个人关系相应地扩至两个家庭之间成为“宾弄赛嗨”。

三是交往的深度互嵌性。郝亚明将民族互嵌型社会定义为，“各民族通过频繁而有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共同体社会形态”。^③回俄村的“宾弄赛嗨”

① 赵芳、纳梦月、孙铭：《比“边地绿宝石”更美的是“宾弄赛嗨”的情》，第6—9页。

② 王丹、龙潞娇、张积家：《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7页。

③ 郝亚明：《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第14—20页。

的家庭间互动密切，彼此之间具有全面的了解，情感联系较深，具有维系共同心灵的感情纽带，富有“人情味”，成为彼此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耕耘和收获的农忙时节相互帮助，在无法外出干活的阴雨天和农闲时节相互串门，在另一方家庭遇到起房盖屋、家人生病、红白喜事等帮钱帮力等，并且将此“亲密无间”的关系代代传承等形式，满足彼此的生产、生活需要和情感补充。长此以往，带动了傣族、拉祜族、佤族、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融，甚至是越来越多的通婚而结成亲缘关系。因而回俄村的这类族际关系超越了一般的短时、随机、不稳定的族际交往，而是“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族际关系。

四、“宾弄赛嗨”的挑战与发展

（一）回俄村“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行为面临的挑战

“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彼此的生活世界发生关联的程度相关，目前“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也面临着时代和现实的挑战，各民族自发接触的必要性减弱。从客观世界而言，民间“宾弄赛嗨”团结和谐机制主要形成于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接近与产业结构的趋同，使得各方直接接触的客观互补性减弱；另外农业生产的逐步机械化，除草农药的使用，优良稻种的推广，使得人力劳动需求降低；加之各民族对于市场化的适应，日常生活中向农户借粮借物借钱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相互之间的需求度大大降低。从社会世界而言，年轻一代以及土地资源不佳的部分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增加人口流动性，地缘关系被打破，使得老一辈结交的“宾弄赛嗨”关系淡化或名存实亡；智能电话的普遍使用，为村民开辟新的“消遣之地”，减少了对同村人的人际需求；同村人之间原有的交往规则被外来文化打破。在主观世界里，主体的经历出现差异化，难以在意愿、情绪、情感等方面取得同一性，人际隔阂增加。因而，部分人家的“宾弄赛嗨”关系渐渐淡化，甚至不再来往；年轻人之间的族际交往难以持续。

（二）“宾弄赛嗨”的发展

为传承和发扬“宾弄赛嗨”类族际关系传统，由孟连县委牵头，孟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以“政府搭台，百姓唱戏，情感联系，社会收益”的模式，首先在回俄村创建示范点。据笔者调查，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多措并举，努力营造助推氛围。县委县政府专门组建工作班子，邀请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多次开展专题调研，同时多家媒体进行专题报道宣传。二是，统筹兼顾，严格把关评审表彰。为了表达县委政府对这一民间传统机制所蕴含的当代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坚守的伦理价值观的褒扬，采取村民推荐、村级初选、乡镇初评、全县汇总进行终评的方式，公开开展县、乡两级表彰。三是，跟踪服务，探索开展试点工作。以前期的调研报告为依据，结合实际，综合考虑，以回俄村为试点，乡党委工作队对14个村民小组的702户开展进村入户调查，建立“宾弄赛嗨”档案；四是，因地制宜，引导组织专题会活动。引导帮助群众制作“心连心”友好联系卡，开展“亲串亲”走亲戚活动，组织“手把手”传授特色经验技术，引导“情系情”互助活动。^①

五、“宾弄赛嗨”对我国多民族杂居区团结进步建设的启示

（一）建立交往理性对于多民族杂居区的重要意义

哈贝马斯打破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为防止科技理性昌明而人际关系疏离，人的情感需要难以得到满足的现象发生发展，提倡建立交往理性，认为具有交往理性的多民族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能够服务于民族文化知识的传递和更新，服务于个人的社会化，服务于多民族社会的整合

^① 艾四林：《哈贝马斯论“生活世界”》，第4—9页。

与团结。同样，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认为如果我们要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就必须有民族间团结互助的具体措施。^①对回俄村的“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而言，这几项功能兼而有之、相互渗透：傣族、拉祜族和佤族等民族在保有、传承了本民族文化内涵、形式的同时，也吸纳、融合与之相交的其他民族的文化特点，尤其是在音乐舞蹈的表演和多民族语言的使用上。同时，在“宾弄赛嗨”间的日常交往中，实现了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使得少数民族村民能够进一步了解学习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等。正是在这种“亲密无间”的相处模式下，一个多民族杂居村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小家庭间通过“宾弄赛嗨”类族际互助模式形成稳固的代际传递关系，带动傣拉佤汉等各民族真正做到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血肉相连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之间通过这类多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和谐共存的良好局面，为民族共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②处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之下的多民族杂居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地需要建立这种交往互动关系。

（二）回俄村“宾弄赛嗨”交往理性的建立

新时代的“宾弄赛嗨”族际交往关系厚植于回俄村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中，这是一个理想的话语环境，双方交往在没有强制与压力的环境下进行，并长期保持平等、诚实的交往和对话。从交往主体的内部而言，满足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在外部环境上，孟连县各级政府的领导助推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交往主体的内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和族群差异，具有平等的话语权，满足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任何交往主体均可同等参与话语论证，包括赞同或反对、质疑；任何交往主体都能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表达不应受到压制；每个人都能真诚地表达好恶、情感和愿望，达到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和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行为期待具有相互性，如发出命令或拒绝命令、作出承诺或拒绝承诺等。^③总之，多民族杂居区之间的多民族交往主体需要尊重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客观差异的真实性，如生活习俗、语言、宗教信仰等差异；遵守正当的交往规则，如非利己主义、守信用、不跨越对方禁忌等；并符合自我同一性，真诚地表达自我的情感、意愿、情绪等。

交往主体关系外部的生活世界营造也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一是，回俄村村委会在宏观政策上提倡与贯彻文化多元主义，村干部带领村民们将其落实到生活世界之中，于是村民们在面对“他者”时，不漠视差异，不敌视差异，也不被动涵化，而是在平等地位上平和地接受差异。二是，政府将经验取之于民间用之于民间，政府与各族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宾弄赛嗨”关系，并且利用新媒体工具将结交“宾弄赛嗨”作为一种优良社会风气进行传播。他们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引导助推这类关系模式，利用媒体舆论专题报道宣传、对“宾弄赛嗨”户进行评审表彰、帮助群众制作“心连心”友好联系卡、开展“亲串亲”走亲戚活动、组织“手把手”传授特色经验技术等措施，使得这一老传统得到新巩固新发展，持续为回俄村的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费孝通：《乡土社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② 曾礼：《民族共治理论研究评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第81页。

^③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6—187页。

互惠与共荣：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各民族互助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马喜梅^{1,2}，官秀娟²，杨佳²

(1.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云南 昆明 650504；

2. 云南行政学院 民族和文化教研部，云南 昆明 650199)

摘要：各民族互助发展、互惠共荣是云南民族关系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关系经历了重构与发展—曲折与缓滞—转型与调适—深化与发展四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互助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宽、互助方式更加多元、互助效益更加显著、互助模式更加规范等特点，其经验在于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关键词：民族互助；民族团结进步；新中国成立70年；云南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2-0076-06

民族互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之一。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得以稳定繁荣、长治久安的重要经验。从云南地方实践来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发展既是云南和谐民族关系的鲜明特色，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卓越成绩的重要法宝。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要求云南要“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不仅是对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出的新要求。因此，从民族互助的角度对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进行总结、分析和探讨，不仅是对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将为更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要求提供理论参考。

一、历史上云南各民族的互助发展

互助发展与互惠共荣是历史上云南多民族和谐关系的鲜明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云南各民族吸收借鉴中原文化，在各民族多元文化互鉴共融的总体架构下，以中华文化的共同构建与传播为纽带，以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共享为动力，建构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共生格局。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中有利于民族文化有机交融，逐步形成各民族聚居区之间开放流动的文化共生格局。在自身发展和与区域内其他民族交流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族际认同；并且自秦汉时期就在主动不断寻求中原王朝认同中，逐渐形成各民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南边疆扶贫搬迁村落族际交往困境及差异化破解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9CMZ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喜梅，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讲师，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民族关系问题；官秀娟，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杨佳，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族、地域和与中央政权间分层有序的认同格局。同时，自发形成了以亲缘关系、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为纽带，依托族际生计互补、跨越族群边界和地域边界的民族往来，构成了各民族互通有无、相互依存，共同抵御生产生活风险，互助发展、合作共赢的生活方式。^①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各民族互助发展、和谐共生为主流的历史。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生活物资匮乏的时代，云南各民族为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自发结成互助合作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平等参与到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经济交流活动中，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差异，主动寻求彼此间的文化适应，各取所需、各显所长、相互扶持、互惠互利，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族际关系。如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居住在红河南部山区、半山区的哈尼族、彝族、汉族和居住在河坝地区的傣族互结“牛马亲家”，进行生产生活互助；藏彝走廊西部地区彝族和汉族相互结拜“干亲家”“干兄弟”，纳西族和藏族之间互结“乃仓”关系，纳西族与汉族、傈僳族、普米族等互结“客巴”关系进行族际交换互助；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上，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德宏、大理、丽江、迪庆等地的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回族、普米族、傈僳族等沿途各民族围绕茶叶产出、加工、运输、消费进行的经济生活互助，都是云南各民族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进行生产生活互助的具体体现。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各民族的互助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国家主导的民族互助关系建构为主线，中央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积极开展互助合作，互惠互利，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不断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1950—1956年：重构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仍面临国共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三大突出矛盾，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了。”^② 1950年，党中央派遣中央访问团和工作队到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访问团和工作队到达云南后，一是真诚地开展与各民族代表和民族上层的座谈沟通，从心理上打破少数民族对新政权的疑虑，联合民族上层共同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外国敌对势力；二是针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一些少数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之间存在的历史矛盾和纠纷，党中央组织工作组进入云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举行盟誓仪式、订立“团结爱国公约”等方法，协助民族之间互相谅解，疏通关系，缓解民族矛盾；三是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采取分类指导的策略，通过和平协商土改以及实施“一少、二多、三公道”等一系列差别化经济扶持政策，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和地区恢复发展经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逐步融入国家经济体系，从根本上瓦解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彻底消除阶级矛盾。在此基础上，新政权协助普洱、蒙自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帮助傣族建立了云南第一个民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标志着统一政治体制在云南的初步确立。新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互助关系的确立，为驱逐外部敌对势力，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1957—1976年：曲折与缓滞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关系建构在极左思想的指导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导致中央与民族地区的互助关系呈现出在曲折中缓滞的状态。在1958年到1961年这段时期内，最初党中央仍延续“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和平协商土改”地区和“直接过渡”地区开展互助合作，对合作社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和合作社进行持续帮扶，并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殊需求也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使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适度的提升。但1958年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现了“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条件论”等错误言论，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大跃进”、刮“五风”运动，导致民族关系产生裂痕。1962年，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

^① 马喜梅：《族际通婚对滇西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调适与优化》，博士论文，云南大学，2017年6月，第14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4页。

会”上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使民族工作重新回到正轨上来。这一时期,中央与民族地方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党中央持续从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干部队伍培育和尊重少数民族称谓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体现在民族地区不断加大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屏边、河口、南涧、西盟等一批自治县先后成立。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展,得以缓慢恢复与发展的国家与民族地方的关系开始呈现出停滞。

(三) 1977年—2012年:转型与调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果断摒弃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论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①,肯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同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民族互助关系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支持少数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②在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引领下,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各民族充分享受自治权利,加强民族互助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互助关系逐步进入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正向建构过程,民族间的互助关系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党中央通过大规模扶贫开发、对口支援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协作,不断强化中央与民族地区的关系。1983年,上海开始对云南进行对口支援工作和智力支边工作,使各民族之间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发展民族互助关系,推动云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拉萨“3·14”事件爆发之际,云南各族人民始终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为首要任务,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有违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不法行径,迪庆州还于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四) 党的十八大以后: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自上而下不断加大对各民族的帮扶力度。针对人口较少民族,党中央郑重宣示:“不让一个民族兄弟掉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因地制宜、因族施策,实事求是地进行分类指导,使云南各民族更好地走上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之路。这一时期,云南各民族的团结稳定和繁荣发展也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对云南民族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对云南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根据党中央指示,云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出台了《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16—2020年)》,启动“十百千万示范创建工程”,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富于时代特征、符合云南实际的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子,创造了民族工作的“云南经验”,形成了民族团结和谐的“云南现象”,有力地助推了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三、云南各民族互助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精准扶贫、“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战略的不断推进实施,在市场经济的强力助推下,云南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民族间的互助领域不断深入拓宽,互助方式更加多元,民族间的互助实现了从道义型互助到效益型互助的变化,互助模式不断朝着规范化、制度化和具体化的方向发展。

(一) 互助领域不断拓宽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国家层面来看,民族互助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封闭运行模式,主要通过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扶持的形式表现出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没有发展自主权。从区域层面来看,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居住格局,使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民族间的互助关系多是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互助合作关系,民族互助主要局限于有限理性的个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为更好融入社会并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组织起来的,如乡会、商帮、宗族等,围绕着地方的寺庙或祭祀场所,通过不同行业、宗族、地缘关系构建的不同民间组织,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② 杨顺清:《民族互助关系论略》,《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16—20页。

通过定期的庙会或者集市来共同开展一些公共或公益活动，在公共活动之余则主要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维护各民族成员的利益，解决各种纠纷等等，民族互助处于民族、地域双重封闭环境之中。

在改革深化和社会巨变的过程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间的互助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助推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逐渐便利的交通条件、信息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市场经济助推下的全面开放、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变革，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逐渐增多，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互助逐渐突破时间、空间向更多领域延伸，在脱贫致富、非遗保护互助、生态保护互助、特色经济产业扶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推进实施，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互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助合作日益增多，汉族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更多地流向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也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傣族与周边其他民族互结“宾弄赛嗨”，西盟佤族自治县干部和贫困群众互相“结亲戚”进行族际互助。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利用“宾弄赛嗨”“结亲戚”生产互帮、生活互助、经济互通、文化互融的良好传统，确保“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

（二）互助模式更加多元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传统的民族互助多以国家对民族地区单向扶持的形式表现出来，缺乏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有效联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不断加大，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开放的步伐。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希望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新定位使云南从边缘地区和“末梢”成为开放前沿和辐射中心，作为畅通“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云南的开放优势愈加明显，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起来。社会各界对云南民族地区尤其是贫困民族山区的关注和帮扶也越来越多，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云南地区建设希望工程，社会各界积极捐助生活用品，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下乡和智力支边的社会扶贫救助活动。

为适应生产方式的多元化和最大限度追求经济利益，各民族间还自发形成了许多民间组织进行互助合作。经济性的民间组织主要有手工业合作协会、种植业合作组织和畜牧养殖组织等以营利性为主的组织，如滇西北的金银加工合作协会、藏族聚居区铜质生活用具加工组织，禄劝等地的果树种植合作组织，德宏各县的甘蔗生产合作组织、手工刀具生产合作组织，西双版纳等地的橡胶和农作物生产合作组织，文山的药材专业合作组织等；社会性的合作组织主要有诵经会、老人协会、“纠会”以及其他满足乡村居民精神生活的组织等，民族互助呈现出多边参与、多元互动、多方互助的格局。

（三）互助效益更加显著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间的互助主要表现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互助以及族际间基于特殊的地缘、亲缘、血缘关系的道义互助，带有明显的效益低下、无偿帮扶特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各民族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竞合共生关系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单向、道义型互助模式，使各民族在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原则基础上，充分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创新提高效率和收益的载体。

2009年，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云南省也先后发布了《云南省扶贫办、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云南省民政厅、省扶贫办关于做好农村扶贫互助社登记工作的指导意见》《云南省扶贫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贫困村互助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在云南民族地区广泛建立互助资金组织，有效缓解了民族地区生产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为民族地区创新扶贫模式，提高民族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提供了有效支撑。

（四）互助模式更加规范

传统民族间的互助关系，极易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对民族地区扶持的内容、方式和力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有所变动，因而，互助随政策波动明显。从族际间的互助来看，传统的族际互助，如纳西族地区基于密切关系的亲戚、邻居、好友之间的互助性较强的借贷“化踪”，山区农户和坝区民众之间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物资交换需求而结成的“客巴”关系，主要依靠其内

在隐性习惯约定法则,各民族在商贸交流活动中始终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诚然重诺”等原则,相互信任、诚然重诺、淳朴无欺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互助合作行为往往以道德、口头或简单契约的方式加以维系,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具有明确内涵的制度形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法制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民族互助的模式不断朝着规范化、法治化、市场化迈进。国家从公共政策层面规定应以东部地区的公共资源适当帮扶西部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各民族在族际互助过程中,在政府的引导示范下,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在自愿自由原则基础上,在互助方式、运行机制、利益分配、风险防范上不断朝制度化、法治化、具体化的方向发展。

四、云南各民族互助发展的经验启示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云南是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典范。各民族在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过程中,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差异,主动寻求彼此的文化适应,发挥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和自我发展优势,共同参与、相互扶持,在互助中实现互惠互利,创造了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云南现象”。

(一) 前提: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

“尊重民族差异、包容文化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①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推进民族发展的总结概括。“任何民族,不论人数多少,历史长短,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凹凸,都是共生体系构成单元的平等单位,只有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才能互相帮助,才能提高共生的关联度、亲近度,即民族团结,才能协调多元民族关系,减少共生阻力,加快缩小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的差距,协调共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走向繁荣与富强。”^②云南族际之间经济交流与互助共生关系的不断拓展,得益于民族之间尊重彼此文化形貌差异并主动寻求适应与互信。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互助深入开展,民族关系和谐,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党和国家对云南民族工作取得的经验成就和对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优秀传统的充分肯定和褒奖。基于云南各民族在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开放、包容、互助、互信的地域民族性格,党和国家尊重并大力发掘弘扬不同民族自身在协调应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在差异化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丰厚的和谐发展内涵,善待不同民族在特殊生存环境下所形成的自我发展能力,尽可能从云南各民族积淀形成的内在发展特色和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充分认识云南多民族地区在发展路径、发展内容和发展模式上不同于内地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给予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是云南发展民族互助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 动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消除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能够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成果,是实现各民族互助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不让一个兄弟掉队,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庄严承诺。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和谐关系的发展有赖于党和国家对云南的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散居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和“直过”民族地区大量的资金投入、政策优惠和对口帮扶,千方百计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使云南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30日, 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2014-09/30/content_336571111.htm, 2020年4月26日。

^② 沈再新:《散杂居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49~2008)——以湖北省仙桃市沔阳回族镇为例》,博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第65页。

治制度，要做到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① 这为解决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侧重民族因素而忽略区域因素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区域内各民族进一步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三）关键：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云南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跨境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和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与其他民族保持着联系、交往和交流，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其他民族差异性明显。但特殊的自然地理、生活方式和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云南各民族交错杂居、立体分布、开放流动的居住格局。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经历过数次迁徙流动，但始终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互相取长补短，在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中形成了分层有序的社会认同格局。广泛的族际通婚是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好的佐证。各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打破了民族之间的界限，跨越民族藩篱，两个或三个以上民族在一个家庭中和谐共存，认同彼此的风俗习惯，包容彼此的宗教信仰的现象十分普遍。云南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稳定和谐，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平等互助、互惠互利的局面，与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为促进各民族在交往交流过程中互助互信、彼此认同、共生共融密不可分。

（四）保障：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果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② 纵观云南民族互助发展取得的成就，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把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入、团结信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社会事务作为重要的推进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云南历届省委、省政府从云南地方实际出发，积极践行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断创新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方式，创新民族团结创建方式，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创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方式，创新做好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工作方式，创新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和运转方式，不断推进云南民族关系迈向新的台阶。

五、结论

纵观云南民族互助关系发展实践，云南民族互助关系的发展是以国家主导的民族互助关系建构为主线，经历了重构与发展一曲折与缓滞一转型与调适一深化与发展四个发展阶段，并通过国家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助等方式进行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云南各民族的互助领域不断深入拓宽，互助方式更加多元，民族间的互助实现了从道义型互助到效益型互助的变化，互助模式不断朝着规范化、制度化和具体化的方向发展。新时代，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指示要求，要继续将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引导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作为云南民族互助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使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云南民族互助关系和谐发展的动力；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共生认同作为云南民族互助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将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云南民族互助关系和谐发展的保障，不断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责任编辑：杨松祿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30日，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2014-09/30/content_33657111.htm，2020年4月26日。

^②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30日，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2014-09/30/content_33657111.htm，2020年4月26日。

历史文化

《论语》为政之道对新时代从严治党的启示

刘华荣, 王雄刚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论语》中“内圣外王”的为政之道强调为政者的德性修养是安民治世的基本前提,并遵循使民以时以求富、乐民取信以求安、尊礼守度以求序、安民教化以求和的实践理路,追寻国家的长治久安。“内圣外王”的为政之道启示我们,为了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全体党员干部务必要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维护群众利益、推动社会和谐,以对自身高标准的要求和实践激发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 论语; 为政之道; 内圣外王; 党员思想道德修养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82-07

儒家为政之道在其经典著作——《论语》一书中表达得全面详尽,该书蕴藏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为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提供了许多启示,对新时代推进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防范和化解新形势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论语》为政之道的内涵

儒家学派提倡的为政之道常被后世以庄子提出的“内圣外王”理念涵概之。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作,《论语》处处体现着这一理念和原则。“内圣外王”理念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是实现良风美治的基本保证和前提条件,“内圣”和“外王”并列,体现了儒家主张的政治和道德须有机统一的原则,即二者对于安民治世而言缺一不可。同时,“内圣”和“外王”也有因果承接的意蕴,即为政者只有达到“内圣”的标准或者要求,才有可能成就“外王”的万世之业,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换言之,“内圣外王就是将内心修养的道德外化为民本观念,为民兴利

基金项目: 甘肃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般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七进’协同创新机制研究”(2018GXSZGZYBKT8);兰州交通大学高校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实践研究”(2016027);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深度贫困区高价彩礼治理研究”(19YB179)。

作者简介: 刘华荣,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王雄刚,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民族社会学。

除弊。这就是德治,也就是仁政、王道”^①。内心修养的道德除了《中庸》总结归纳的智、仁、勇“三达德”之外,结合新时代从严治党的要求,笔者认为,《论语》中强调为政者的自省、自爱与模范榜样品质等道德修养要求,更加需要在新时代条件下加以提倡和弘扬。

(一)《论语》强调为政者务必自省

人人修德为上是实现治世的基本前提,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刀笔小吏,个体必须注重自我修为和良知良能,否则无法论政、无从执政。如《学而》篇中,曾子自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②此种对日常修为的躬耕自省,被认为是进行道德内在修养的必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过程,如果不能做到,则无法走通“内圣”之道。《尧曰》篇也引用“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称“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③。此处援引圣王自责罪己的言辞表明一国之君应该勇于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如果出现问题,需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能敷衍塞责,唯此,方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二)《论语》告诫为政者务必自爱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仁爱”之德是为政的必备要素。“仁爱”既讲求仁民爱物,也讲求自知自爱。例如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④。因此,他根据弟子入仕的实际,指出作为辅佐之臣,治国理政须德行良厚,爱惜自己的羽毛,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出良策、为善政,帮助国君安民治世,否则就不称职。比如,在“季氏将伐颛臾”事件中,作为孔子的高足,冉有、子路当知一国之要“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道理,为此,在“远人不服”的情况下,“当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邦国由此可定,人心可齐。然而,两弟子囿于季康子“不正”的环境中而不自爱,为此受到老师“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的言辞斥责。^⑤孔子批评弟子不知道自己的责任,不分是非敌友,不考虑邦国存续的关键而盲目为季氏辩护。

(三)《论语》强调为政者务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如在“季康子问政于孔子的故事中,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⑥朱熹就此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范氏的解读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意在说明为政者自身修为的模范和榜样作用。同时,朱熹进一步引用胡氏的告诫,说明孔子的原意是要求季康子必须“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可惜季康子沉溺于利欲之中而不能自拔,不能自知,国乱邦坏就是显然的了。^⑦可见,作为领导者,在孔子看来必须以圣王先贤为标准要求自己,既要学习尧的“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克明俊德”的德行,也要领会舜的大孝至爱和百折而不悔的诚意,如此才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论语》中强调的“内圣外王”逻辑,注重“内圣”为先,“外王”在后,内圣之所以能成,也是因为仁心为内心之德,人品生而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低贵贱皆可为圣,德性修养全凭个人修为和道德自觉,所谓“为仁由己,欲之则至,何远之有”^⑧,与外在环境影响关系不大。只有具备优良品德,才有资格为君、为臣,参与到国家治理活动中去,否则会出现“人而不仁,如礼何?”

① 周桂钿:《“内圣外王”疏》,《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第40—44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0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0—91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9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6页。

人而不仁，如乐何”^①的失序格局。易言之，如果统治者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修养而不能自制，纵有礼乐制度加以规范也是无法挽回的。

二、“内圣外王”为政之道的实践路径

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②。所以，为寻求天下大治，儒家学派在《论语》中主张通过使民以时以求富、乐民取信以求安、尊礼守度以求序、安民教化以求和的实践路径为“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寻求实践逻辑的自洽。

（一）使民以时以求富

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先天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自古走上了迥异于西方国家海洋扩张的农业生产之路。儒家深谙以农立国之道，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就是顺天时、求地利，以农为本是为民爱民理念的基本体现。“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③朱熹对这一段做注解时认为，“时，谓农隙之时”^④。简言之，统治者对于民力的使用必须遵循季节时令，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肆意侵夺民力而荒废农业生产，只有“足食”为先，才能取信于民。如果像鲁哀公那样在“年饥，用不足，若之何”的情况下意欲更多地侵夺百姓利益，那么只能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⑤来批评他的无道了。这就是所谓“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⑥倘若靠搜刮民脂民膏来满足私欲，必将“上下困矣”。所以针对土地这种最关键的生产资料，“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⑦如此，方能“近者说，远者来”^⑧。

（二）乐民取信以求安

儒家为民、重民，使民信、民乐以求安是一以贯之的理路，尤其把躬亲实践取信于民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⑨，足见取信于民对国家善治的重要性。同时，《论语》中时常提到先王之治以表达孔门子弟对上古时期的羡慕怀念之情，希望当世者能够学习效仿。“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⑩这五人就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等青史留名的明君贤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以万民皆服；皋陶掌刑法，明典狱，“惟明克允”，天下咸平；伯益辅佐大禹治理洪水，教民种植稻谷，促进农业生产，百姓历代传诵其贤德。孔门弟子通过对这些明君贤臣的赞美表明了他们的基本政治观点，即乐民取信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称需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问，倘若“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三者何先？”孔子的回答是可先“去兵”，其次“去食”，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万不可失信于民。^⑪朱熹认为，“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⑫儒家提倡的乐民取信以求民安之道在此彰显无遗，这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2页。

② 范文澜：《儒家谈德治》，见王曰美主编《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3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8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8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7页。

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

⑩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3页。

⑪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7—128页。

⑫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8页。

种为政观念是其一贯主张的君子修为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自然延伸，因为君子不仅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之人，更是“修己以安百姓”之人，^①唯天下有道，庶人方可不议；天下大安，万世和合方可期。

（三）尊礼守度以求序

就尊礼而言，一方面，孔子看重礼制规范对于国家秩序的重要性。例如他对季氏以大夫之名僭用天子之乐非常气愤，面对“八佾舞于庭”这种不遵守礼制的行为，严词斥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②意在要求为政者不能做有损礼法规范的事情，否则就会导致社会陷入失序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儒家也特别讲究辩证看待礼制规范。如“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为“天礼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之意，“和”则为从容不迫之意。^③言下之意是礼法虽严，但要明白它是自然之理的流淌，在应用过程中才能从容不迫，才能见到其中表现出的和谐之美。反之，如果生搬硬套，一味追求为和而和，则有所偏颇，也可能肆意妄为，这是儒家所不允许的，礼也会失去本真的意义。此处着重强调尊礼致用的辩证法，也就是要求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古代圣王明君以及贤臣，既要以礼治身，又需推己及人、及天下，讲求活学活用，辩证看待这一原则。

就守度而言，孔子提倡正确对待功名利禄，义利分明，以义为先，不能越度。世人常言儒家“学而优则仕”，讲求“书中自有黄金屋”，此一点亦为众多学者诟病。章太炎就此曾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才，可使从政。”^④然而，此种看法有失偏颇，于儒家并不公平。孔子曾经特别强调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⑤追求富贵利禄为人的本性，儒家并不反对，但如果失去礼义法度，乃至底线和原则，就是君子修为的大病，儒家对此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另外，孔子也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是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之辈的原则，“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⑥所以，一味批评儒家为功名利禄之辈实不可取，我们从这些经典论述中已经看到，孔子虽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始终致力于劝说君王，建议他们施行仁政王道，积极入世救万民于水火，但同时也强调行事有度，既有为君解忧、力在为民的仁心，也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豁达，更需坚守明辨义利的做人原则。

（四）安民教化以求和

家和万事兴，国和天下平。国家免于动荡，百姓才能过上小康生活。孔子和冉有的对话就在满足基本物质条件的前提下，提出了教化的重要性。“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⑦孔子在此的逻辑是民富方可安、安方可教、教方可和，当天下皆守礼乐，则治世可成。礼乐教化之道是儒家培养君子贤人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统治者化风归俗的主要方法。《论语》中随处可见用礼、乐、诗、书教化万民的事例。例如，“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⑧简简单单9个字，概括了诗、礼、乐的社会教化功能。朱熹认为按照这种规律学习，起初可以帮助人们“兴起其好善恶之心”，然后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最终“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9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1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

④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王日美主编《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9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2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0页。

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①同理，“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两种治国方式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齐之以刑”会出现不敢为恶的结果，但为恶之心或许未曾减少，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爆发出来；“齐之以礼”这种以德为本构建起来的礼法规制可使民心归厚，培养起来的知耻之心可以远恶、制恶。所以，合德者自立于天地，自和于诸人，并以此影响和感染周围的人，如果这种教化方法普遍施行，和谐社会亦当可期。

由此可见，《论语》中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思想既是儒家为政之道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儒家士人追求的为政理想，即“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以美德为基础的政治，强调政治事务不能脱离美德”^③，也就是它的基本原则必须行仁义之道，以德为主，这样才能做到家齐国治天下平，特别看重“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④在此基础上，通过富之、教之、守之、和之的层递实践，达到社会和谐，民心归化。

三、《论语》为政之道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建设问题告诫全体党员“打铁必须自身硬”，多次明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文化自信理念的指导下，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吸收儒家为政之道的有益内核，是“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⑤的必要工作。

（一）注重学思践悟提高品行修养

《论语》中多次强调是否具有君子品行是判断一个人出仕的资格和条件，所谓“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即是此理。孔子指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为“五美”，“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四恶”。^⑥所以，根据儒家提倡格物致知、重在克己、讲求慎独、行忠恕之道、“三省吾身”“学而时习之”的道德提升建议，党员干部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治国理政能力。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曾写到：“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⑦《论语·里仁》篇也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⑧孔子对颜回不吝赞美之辞，是因为他看到了颜回身上那种“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的“圣人之心”，颜回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非其他弟子可比，这是品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所以，当子贡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而洋洋自得时，孔子依然对他提出进一步要求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⑨所以，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讲求万事义为先、行事德为首应该是自我道德修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建构道德监察考核培养机制加强德才培养

建构规范的党员干部道德监察考核培养机制和党内法规体系，从党员干部的日常家庭生活、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0—101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

③ 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④ 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第174、179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5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

工作学习环境和群众评价中见微知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追寻当代中国政治“内圣外王”理想的必要步骤。儒家讲“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表明,处理好家庭关系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备君子品格的重要标准。孔子告诫世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①用以强调孝道,不孝不可为人,更不可为政。儒家所推崇的《尚书·尧典》记载尧当初遴选接班人的时候,众人推举舜,其原因在于他有着至纯至孝的品德。他的家庭情况虽然“父顽、母嚚、象傲”,但他“克谐以孝”,进之于善,孝德为众人见,以至于万物皆被其感化,“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帝尧以此“事以九男,妻以二女”,最终通过长期考察,“以天下让焉”。这个故事对于党员干部提升道德修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同样,“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②原因在于晏婴为人厚道,待人接物特别重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③,推己及人,追求“和而不同”,尊重他人,从而得到了他人的尊重。

(三) 借鉴儒家为政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于注重和谐是儒家思想重要的理论特点之一,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内在一致性。这为儒家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奠定了理论的可能性。”^④为了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党员干部队伍必须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在思想上保持共产党员一以贯之的榜样示范作用。

首先,党员干部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日常工作中化消极应付态度为积极热情态度,力争把有损于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⑤因子张少仁,故孔子告诫子张,对民众、对国家要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尽心竭力,不能欺民负国。共产党员要提高组织纪律性、坚定大局观、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警惕消极被动思想,将各种消极不利因素通过科学的工作方法、真诚的服务态度、高超的业务水平转化为积极有利的因素。其次,要在工作中化被动应付的工作方式为主动解决的工作方式。“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⑥孔子于此告诫子路,强调为政者需身先士卒,以身劳之,如此才能不令而行,百姓亦虽勤不怨。其中道理带给今天共产党人的启示就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主动走进街道、村镇、社区、工厂,俯下身子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善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将一切威胁和可能威胁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天地人万物和合也就为期不远。最后,在工作中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联系的观点,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单一的平面工作转变为多元推进的立体工作,也即根据各地方实际,切实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同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协调统筹,全面布局。

(四) 坚持人民中心立场,走好群众路线

借鉴儒家民本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解“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深刻内涵,“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⑦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实现群众的需要,满足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8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

④ 李翔海:《论儒家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意义——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核心》,《江海学刊》2012年第2期,第47—53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3页。

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88页。

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①。

一走好群众路线,坚定鲜明的人民立场,积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学习劳动人民的善良美德,吸取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做亲民、爱民的模范。各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做到以情感人,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共产党人的高度责任感关心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以高尚情怀感动乡村、街道的一草一木。二要以理晓人。党员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不仅是政治工作方面的先锋队,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不仅是社会和谐促进者,更是群众利益的维护者。所谓“体不宁则神不安,神不安则事不进,事不进则体亦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三要以法正人。构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以法正人不是以法压人,更不是以法欺人,而是在社会主义法制框架范围内,针对群众关心的各种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教会他们正确运用法律武器,帮助他们提高法制意识,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法治精神与法治素养。四要以德服人。以德服人既是工作方法,也是工作目标。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以廉行事,以德服人,自觉抵制腐败,坚决遏制腐败,严厉打击腐败,才能获得百姓认同。总之,只有深入基层,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吃一碗饭、同想一件事、同画一颗心、同走一条路、同连一片情,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仁者不忧”才能实现。

四、结语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②《论语》体现的为政之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总体来看,儒家孜孜以求“内圣外王”的天下大治,既注重提升为政者的能力素养,更强调“为政以德”,不断追求进步,做亲民爱民的模范,其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带给今天治国理政的启示意义非常鲜明。其内涵意义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共产党人坚持和提倡的初心使命均有相通之处。学习、借鉴和弘扬《论语》中内含的传统为政之道的精华,既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挥出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优势,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4—405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0页。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方式研究

李一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基础,其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以一批学者为载体的人内传播;以书籍报刊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课程和演讲等载体的群体传播;以书信为载体的人际传播。这些传播方式相互补充协同,积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生根发芽。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方式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089-07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然需要吸收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革新与经济实践的指导。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与不断完善,其传入中国的条件日趋成熟。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五四时期的传播主要有四种方式,即以一批学者为载体的人内传播、以书籍报刊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课程和演讲等载体的群体传播和以书信为载体的人际传播。

一、以一批学者为载体的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是指个人接受信息并在人脑中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这种传播既是个人需要也是社会需要。作为一般传播的起始性环节,人内传播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关键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正是以一个个学者为传播起点的。作为传播载体,这些学者大致又可以分成两类,即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

(一) 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信仰且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影响中国发展的一批学者,其中不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建设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施存统等人。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作出最突出贡献的当属李大钊。李大钊赴日本留学之前就在北洋法政学校接受过政治经济学教育,进入早稻田大学后主修了国家原理、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教育是李大钊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载体的重要思想基础。后来李大钊受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李大钊同样受到河上肇影响的还有李达、李汉俊、郭沫若、陈望道、王亚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2019MZD017)。

作者简介:李一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教育。

南等人。^①

从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代表的文章和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代表的演讲中不难窥见，李大钊对于价值、剩余价值及其创造等观点已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也指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性地位和剩余价值论的核心地位，李大钊对这些理论内化于心是其成为传播载体的前提。李大钊也较早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在《庶民的胜利》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而成的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的源头。而通过对大量列宁著作的阅读，也让他能够科学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但李大钊作为早期研究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把握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其中固然有避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盲目崇拜的原因，但也造成了李大钊对于如劳动价值论等理论观点理解的片面^②，在肯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价值的同时，也有失偏颇地认为有些理论并不科学或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如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注重经济组织改造而不注重社会道德改造等等。尽管如此，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者，其所创造的价值是开创性的。

陈独秀同样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播者，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曾至少三次赴日，其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国汉学和西方新学的研究上，这是陈独秀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开端。目前有关陈独秀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资料较少，其理论水平只能通过其发表的文章窥知一二。陈独秀刊载于《新青年》上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对《资本论》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介绍，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也对《资本论》有过细致的研究，并且已经能够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把握和应用，对于价值形成、剩余价值、地租等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准确。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杰出贡献。1918年留学日本期间，李达也受到河上肇的影响，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可以说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李达翻译的考茨基著作《马克思经济学说》，于1921年在国内出版（因年代久远文本丢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必读书目之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达在五四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李达认为解决经济问题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前提，他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的社评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③，可见李达不光对马克思经济学观点融会贯通，更注重用经济理论指导革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开端。

此外，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学者在五四期间也翻译和创作了一些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著作和文章，这些作品体现了学者们较高的政治经济学素养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载体的自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一样熠熠生辉，但篇幅有限，不在此一一赘述。而对周佛海等后期背叛革命者，也应充分肯定他们在五四期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非马克思主义者

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朱执信早在1906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用了3000多字的篇幅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其中涉及了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理论，是少有的十月革命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研究的中国学者。

在五四前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为之传播作出贡献的学者则当推陈启修。陈启修留学日本期间翻译过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概要》，这也是对其早期研究经济学的佐证之一。作为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学生，陈启修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20年，

① 梁艳萍：《河上肇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决策与信息》2019年第2期，第22—30页。

② 左继亮：《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初探》，《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第1—4页。

③ 李达：《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46页。

陈启修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戴季陶也是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也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并曾短暂加入过共产党，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认识主要通过翻译考茨基所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商品生产的性质》获得。由于其在翻译中十分注重本土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此外，戴季陶还写就了《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等文章，充分展示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和对原理的娴熟运用，尽管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但五四期间他对传播所作的贡献依旧是可圈可点的。

除了以上学者，在五四期间还有诸如胡汉民、叶元龙、马君武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研究，尽管他们对于马克思的有些观点持质疑和批评态度，但他们作为传播载体的事实也是不容否认的。

二、以书籍报刊为载体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人类传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指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向不特定的多数人群体进行的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五四前后，大众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过程中最能够广泛引发社会反响的传播方式，而传播的媒介主要就是报纸杂志的印发和专著书籍的出版。

（一）报刊杂志

1915年至1923年，刊登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章的报刊杂志，受期间一些历史事件如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影响呈逐渐增多趋势，按照发文量多少进行排序，五四前后部分研究或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报刊和杂志的名称和刊发文章的标题和时间如表1所示。

表1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报刊杂志及篇目^①

报刊/杂志（篇数）	文章标题	署名	发表年月
《新青年》（11）	《选举权理论上的根据》	高一涵	1919年4月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肇著；渊泉译	1919年9月
	《劳动与资本》	河上肇译；食力转译	1919年5月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	1919年9月至11月
	《马克思学说》	顾兆熊	1919年9月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凌霜	1919年9月
	《马克思略传》	刘秉麟	1919年9月
	《马克思还原》	李达	1921年1月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山川均著；李达译	1921年5月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	存统	1921年8月
《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书录）》	周佛海	1923年4月	
《晨报》（9）	《社会改造及其运动之二潮流》	转译日本 《中央公论》杂志	1919年4月
	《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渊泉	1919年4月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肇著；渊泉译	1919年5月
	《劳动与资本》	河上肇译；食力转译	1919年5月
	《马氏资本论释义》	河上肇译；渊泉转译	1919年6月至11月
《马氏唯物史观概要》	转译日本 《社会主义研究》杂志	1919年7月	

^① 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本书编写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之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

报刊/杂志(篇数)	文章标题	署名	发表年月
《晨报》(9)	《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转译日本《改造》杂志	1919年7月至8月
	《西洋之社会运动者·马克思》	筑山醉翁译	1919年8月
	《马克思(Karl Marx)年表》	绍虞译	1919年12月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李大钊;黄绍谷记	1922年2月
《时事新报》(7)	《社会改造及其运动之二潮流》	转译日本 《中央公论》杂志	1919年4月
	《社会党泰斗马格斯(Marx)之学说》	刘南陔节译	1919年5月
	《社会主义之进化论》	河上肇;摩汉译	1919年6月
	《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	南陔	1919年6月
	《马克思社会主义 之理论体系》	河上肇著; 罗琢章、籍碧译	1919年8月至12月
	《我国之劳动问题》	黄典元	1919年8月
《民国日报》(7)	《社会主义之沿革》	徐松石	1920年1月
	《劳动问题》	北泽新次郎著;存统译	1921年1月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山川均著;李达译	1921年7月
	《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	河上肇著;存统译	1921年5月
	《马克思学说》	转载《马克思纪念册》	1922年5月
	《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 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	汉俊	1922年6月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	李大钊;黄绍谷记	1922年2月
《东方杂志》(7)	《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	周佛海	1922年6月
	《挽回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		1915年4月
	《社会主义》	刘大钧译	1918年11月
	《社会主义检讨》	北吟吉原著;君实译	1919年9月至10月
	《社会主义之未来》	佐野学原著;昔尘译	1920年6月
	《知识阶级对于劳动运动之地位》	山川均著;君实译	1920年11月
	《马克思底理想及其实现底过程》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	1922年3月
《今日》(6)	《劳动价值论之研究》	叶元龙	1922年
	《劳动者当权》	胡南湖	1922年3月
	《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 《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 《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	邝摩汉译	1922年3月至5月
	《哥达纲领批判》	熊得山译	1922年4月
	《马克思传》	胡南湖	1922年5月
	《唯物的中国史观》	邝摩汉	1922年7月
《建设》(4)	《马克思著作史》	胡南湖	1922年7月
	《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胡汉民	1919年12月
	《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考茨基著;戴季陶 (传贤)译	1919年12月 至1920年12月
	《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河上肇著;苏中译	1920年8月
《天平洋》(3)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阴格尔著; 河上肇译; 苏中转译	1920年12月
	《社会主义论》	一湖	1919年7月
	《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	高一涵	1919年11月
	《论所有权思想之变迁》	张嘉禾	1920年1月

报刊/杂志 (篇数)	文章标题	署名	发表年月
《学艺》(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陈昭彦	1921年
	《经济价值论概略》	陶因	1922年
	《亚当斯密之价值论》	史维焕	1923年
《每周评论》(2)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著； 舍摘录	1919年4月
	《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若愚	1919年4月
《每周评论》(2)	《社会主义简明史》	筑山醉翁	1920年1月
	《社会改造家略传》	绍虞	1920年8月
《新潮》(1)	《“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	谭鸣谦	1919年5月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	《社会问题》	张闻天	1919年8月
《广东中华新报》(1)	《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译述	1919年11月至12月
《星期评论》(1)	《马克思传》	威廉·李卜克内 西著；季陶转译	1920年1月
《法政学报》(1)	《马克思之经济论》	河上肇著；罗琢章译	1920年
《复旦》(1)	《经济学的派别》	瞿宣颖	1920年
《国民》(1)	《资本论自叙》	马克思著；费觉天译	1920年10月
《先驱》(1)	《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重远	1922年1月
《北京大学日刊》(1)	《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大钊、陈仲瑜	1922年
《互助》(1)	《马克思经济史观底真价与其谬误》	白露	1923年
《批评》(1)	《马克思价值论的疑点》	丘咸	1923年

根据以上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以前约4年半时间里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为8篇，五四运动后3年半时间里则发表了64篇，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也从侧面反映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由于可能存在因年代久远导致的资料丢失和统计遗漏，粗略推算五四前后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可能在百篇左右，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期刊和杂志包括《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和《东方杂志》《今日》等。其中，1922年2月创刊的《今日》更是第一家公开宣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今日》上刊发的文章通过记述马克思生平的方式介绍了《货币劳动与资本》《经济学批评》的创作背景并简述其主旨内容，有些文章还介绍了唯物史观中的经济思想。此外，《北京大学日刊》《清华学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以高校和学生群体为阵地的期刊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 专著

1915年至1923年，介绍或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排序的书名、作者、出版时间和出版社信息如表2所示（共计19本专著）。

表2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①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社会问题概观》	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周佛海译	1920年	
《马克思经济学说》	考茨基著；陈溥贤转译	1920年	商务印书馆

^① 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本书编写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之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各国社会思潮》	邵振青编	1920年4月	商务印书馆
《科学的社会主义》附录《恩格尔传》	郑次川译	1920年8月	
《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	1920年9月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马尔西著；李汉俊译	1920年9月	文化印务局
《社会主义史》	克卡朴著；李季译	1920年10月	新青年社
《经济史观》	赛格利曼著；陈石孚	1920年10月	商务印书馆
《欧洲政治思想小史》	高一涵编	1920年10月	中华书局
《到自由之路》	罗素著；李季、黄凌霜、雁冰译	1920年11月	新青年社
《近代思想解剖》	樋口秀雄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	1921年1月	商务印书馆
《阶级争斗》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	1921年1月	新青年社
《社会问题总览》	高阜素之著；李达译	1921年4月	
《社会问题详解》	高阜素之著；盟西译	1921年4月	
《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 毛泳堂、林本、李宗武译	1921年9月	
《最新经济思潮史》	邝摩汉、徐冠共译	1922年1月	
《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	班纳科支著；施存统译	1922年1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	罗素著；陈与漪译	1922年5月	
《工资、价格和利润》	李季译	1922年10月	商务印书馆

根据以上不完全统计来推测，五四前后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应在几十本左右。这些专著既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史的一部分进行介绍的，也有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经济史的一部分进行介绍的，还有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来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更有陈溥贤转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李汉俊译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专门介绍的专著。

此外，周佛海还曾在《民国日报》上介绍过马克思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学生底马克思》《人民底马克思》三本著作，并宣称已经译完《马克思经济学说》并将不日出版。由此可见，五四期间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应不止于此，而专著书籍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承担了十分重要的传播任务。

三、以课程和演讲等为载体的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是指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行为，这种传播方式必须将一定数量的人聚合在一定场合以方便交流从而达到传播效果。在五四期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群体传播的载体主要是两种，即课程和演讲。

在五四以前，经济学课程就已经成为国内大学的重要课程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陈启修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陈启修早年留学日本，修过一些财政学和经济学的课程，后来受到其老师河上肇的影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国之后，其马克思主义经济概论课主要按照《资本论》的体系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介绍，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邓中夏、刘仁静和罗章龙等。后来陈启修还受邀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讲解《资本论》。1924年出版的《经济学讲话》就是对其课程讲稿的整理。

演讲作为群体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大钊1922年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归纳为两大原理，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二是现代经济组织的趋势。李大钊还提及了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等概念，阐释了价值的含义，

并通过介绍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引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学说，其讲稿由黄绍谷整理刊发在《晨报》和《民国日报》上。

此外，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也曾于1921年在北京大学进行过名为《马克思主义底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的演讲，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观点进行了比较和阐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弊病，着重介绍了唯物史观，讲稿由矛尘与小峰整理刊发在《民国日报》副刊上。

除了课程和演讲，上海学界还在1922年组织了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的纪念大会。为了宣传本次纪念大会，纪念会工作组事先在《民国日报》第5卷第5期刊登了举办大会的通知，称“毋需持券，可以入场”，还在大会当日分发了马克思纪念册约2万册。纪念册特别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以书信为载体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中最常见的行为，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其形式既可以是面对面的直接信息交换，如通过语言、表情、姿势等进行信息传播；也可以借助媒介作为中介进行间接传播，如借助对讲机、电话、新媒体等作为传播的中介完成传播行为。而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之下，除了已不可考证的人际交流外，书信是人际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的重要方式。

五四期间，在以书信为载体的人际传播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俩人的思想均在五四前后发生了转变，其中蔡和森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1920年给毛泽东的几封信中，在8月13日的信中，蔡和森就称要“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来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指导，而在提及无产阶级革命四种利器中就提到了“合作社”，并指出要将合作社作为劳动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①恩格斯早在1886年给倍倍尔的信中就提议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强调了要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显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此时蔡和森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9月16日的信中，蔡和森再次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的支持。毛泽东也在同年12月1日的复信中明确了对“马克思式的革命”的支持，并主张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此外，蔡和森还在其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信以及同时期的一些文章中分析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经济，从而得出了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道路的重要结论。^②

总而言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各种传播方式发挥单独传播作用的同时，不同传播方式也存在着相互补充协调关系，如学者作为人内传播载体是其他三类传播方式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而作为不同传播方式载体的报刊杂志、课程演讲与书信也必然具有内容的关联性和逻辑的继起性。正是在多种传播方式相互配合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积极推动中国本土经济学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开始运用先进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李大钊就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论证和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王亚南也运用相关经济原理分析了中国商品货币的性质及工资的形式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② 吴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路径与融合发展启示

成正, 熊必军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福建 厦门 361027)

摘要: 中华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 是推动两岸融合乃至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动力。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 西方文明的涌入, 尤其是“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策动, 台湾主流社会虽仍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 但不可否认出现了亚文化、甚至价值理念的差异。幸而, 蕴藏于两岸社会的中华文化得到源源不断的传承, 并没有被人为或外来冲击所隔断。近年来中国大陆综合实力日益增强, 为中华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当前两岸文化融合呈现难得的机遇。推动两岸文化融合, 需要以“建构论”为指导, 营造两岸文化共有的外部环境, 突出两岸教育领域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功能, 加大两岸青少年交流以建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新认同。

关键词: 文化自信; 两岸民间文化; 融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2-0096-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三个自信”扩展成“四个自信”,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谋远虑, 这对推动两岸民间文化融合, 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主要基于一个事实: 由于几十年的相对隔离, 两岸民间文化认知出现了相应的差异, 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为此, 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弥合两岸 70 多年来形成的亚文化认知差异尤为紧迫。通过运用“建构论”, 从文化自信层面寻找两岸共同的际遇, 塑造共同应对外部环境压力的氛围, 以两岸教育合作和青少年交流为载体来推动两岸民间文化融合。

一、“建构论”理论与两岸中华文化复兴

“建构论”强调通过共同的历史回顾及共同的未来愿景培养共同的心理感情和认知, 乃至共同认同。“当大陆积极宣扬民族文化复兴, 并据此唤起台湾文化归属意识时, 希望的焦点是放在‘一个中国原则’或‘统一’的基础上。反之, 当台湾省思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并兴致昂然地寻找一种属于本土情怀的新兴民族意识时, 希望的焦点是放在‘台湾优先’或‘维持现状’的前提下。这样的逆向发展, 与两岸初始交流前几年双方对于前景抱持乐观的情况相比较, 实是大相径庭;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台民间信仰交流对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功能研究”(FJ2018B166)。

作者简介: 成正, 厦门市社会主义学院、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熊必军, 厦门市社会主义学院、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教授,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对于主导开放政策与政治精英本土化的蒋经国先生而言，也是始料未及的突兀结果。”^①因此，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如果持续在这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为主导的结构下进行，那么未来出现更大反差的可能性将会激增，甚至在期盼与现实之间出现“难以接受的空隙”（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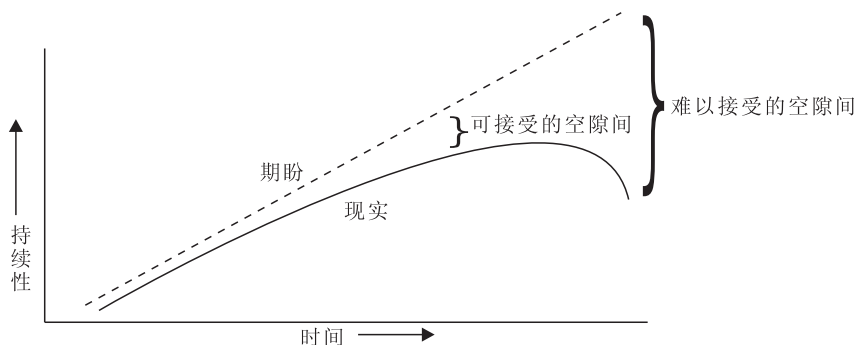


图1 民间交流中期期望与现实的差距^②

为缩小这种差距，一方面要警惕“台独”势力利用“建构论”来制造文化差异。有学者指出，“台湾人是在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下，才真正反中国”。^③这夸大了历史事实，事实上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国民党更多是侧重党派和政权之争，而不是反对中国，因为两蒋主政时期“言必谈统一”。虽然不能否认国民党的对抗意识影响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知，但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差异最主要的制造者还是蒋介石、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尤其蔡英文试图用原住民文化来树立“去中国化”史观的策略值得警惕。为了获取权力和政治利益，他们采取了与中国文化划分界限、对中国文化“消毒”等政策，并通过人为想象的建构，夸大了中国大陆文化与台湾地区文化（包括原住民文化）的对抗性。如近年来台湾当局废止2014年通过的课纲微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公开向台湾少数民族道歉，试图否定中华史观，塑造原住民史观来达到“文化台独”的目的。所以说，“建构论”也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些政治人物尝试运用“建构论”理论，通过构建区域文化的共同想象来实现从中国分离的政治目标。正如“台独”分子在寻求所谓“身份认同共识”过程中，通过人为政治操弄建构出“只是为政治资源分配目的而产生的‘想象的社区’或甚至是马克思所说的由政治因素杜撰的‘虚假意识’”^④。

另一方面，将两岸各自的文化自信纳入同一轨道。当前，两岸都在重构中华文化，并推向国际社会，但存在各自为战甚至内耗的情况。例如，国民党政权曾通过大兴中华文化建设来彰显其“正统性”；在中国大陆提倡共同维护和振兴中华文化，并积极论证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辩证关系之时，民进党当局却推动“文化台独”和文化“去中国化”。近年来，当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时，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的台湾地区也试图在美国洛杉矶和休斯顿兴办“台湾书院”。尽管两者都是为了传播和振兴中华文化，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很大程度上没有形成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讨论时也指出，台湾除了原住民，大陆去台的以闽南地区为主，讲的就是闽南话。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大有文章可做。^⑤

① 王正旭：《文化、发展与两岸社会民间互动》，《“展望两岸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4年10月，第43页。

② 施正锋：《台湾政治建构》，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③ 施正锋：《台湾政治建构》，第17页。

④ 欧阳新宜：《新台湾人：国家自主议题的第三次挑战》，蔡璧煌，陈俊明主编：《转型与发展——迈向新世纪的台湾》，台北：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00年，第55页。

⑤ 《建设两岸的共同家园—习近平、俞正声参加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讨论侧记》，<http://www.cppcc.gov.cn/zxww/2015/03/05/ART11425520465339832.shtml>，2020年5月10日。

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共同资产，“孔子学院”尚在进行时，如今新一波的文化传承机遇呈现，“一带一路”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两岸可以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合力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华故事。

二、塑造两岸中华文化融合的外部环境

要让两岸中华文化步入同一轨道，离不开共同的外力环境。共同的环境压力有利于实现从“你”“我”的认同转向“我们”的认同。为此，有必要从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高度来思考两岸问题，没有这个宽广的架构与视野，两岸恩怨很难消解。“只有把百年来台湾的苦难摆在帝国与殖民的脉络中，台湾民族主义者才能看到中国的苦难，才能比较同情地看待中国，也才能梦想未来、建构未来。”^① 当今世界，虽然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强调同属一个文明也显得十分重要。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② “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③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国正开始经历的。”^④ 无论是中国大陆文化，还是台湾地区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维系两岸关系的一根弦。

当前，世界文明相互较量。为培养文化自信，两岸都有义务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为了维护中华文明，从台湾存在的亚文化的角度来看，就需要反思日本、美国文化对台湾地区的“殖民化”。否则，中华文化在台湾将受到其他文化的重大冲击，这对台湾地区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灾难，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西方文明并不是台湾地区所能复制的。亨廷顿曾经指出，“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⑤ “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生活是荒谬的。”^⑥ 也许当前台湾当局正因输入的西方民主文化而自豪，但长远来看，受西方民主文化“病毒”入侵的台湾将会无所适从，经济持续颓废、社会持续分裂。“过去20年，台湾人民辛苦地追寻民主的解放，但得到的是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一个被市场力量穿透的政治领域，以及一套无法有效规范市场带来的不平等的虚弱民主。”^⑦ 幸而，在世界文明较量过程中，具有强烈韧性的中国文明并没被其他文明所征服。相反，随着中国大陆的不断强大，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反而更加根深叶茂，并且对国际社会其他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为了中华文化复兴，构建同属两岸的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共用同一套价值体系的多元个体虽具有其差异性，但当全体成员共同面临威胁其价值体系的冲击时，这些多元的个体却可以

① 陈光兴：《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参照两韩思想两岸》，《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9年第8期，第34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18页。

④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页。

⑤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6页。

⑥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页。

⑦ 张铁志：《台湾新民主的诅咒——金权政治与社会不平等》，思想编辑委主编：《解严以来：二十年目睹之台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122页。

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抗拒外力,而体现为多元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新典范。”^①“处在不同的世界文明与历史较劲场域中,海峡两岸人民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将更加紧密结合。”^②为此,在世界文明之林,要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就需要共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深深影响了两岸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过去七八百年来,包括朝鲜、越南、日本都是笃信孔孟思想的,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理由不传承和发展好。两岸中国人应加深对于孔子思想的共同研究,以增强文化认同。因此,可发挥台湾信息产业优势、大陆文化传播平台和人力资源优势,通过两岸文化传媒集团等民间团体展开合作,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

三、以教育合作为契机塑造共有价值观念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的全球化已初见端倪,并成为经济全球化之后的又一新兴领域。在此背景下,两岸的文化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合作将是两岸民间文化整合重要的一环。“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民间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民间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③2015年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两岸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同胞精神纽带,为民族未来培养优秀人才。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教育给文化以生机活力。“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④时任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贺之军也曾指出,“民族兴盛,教育为本,基于此,海峡两岸的教育交流得以成为两岸人民往来以及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领域。从教师的相互聘任到教育资源的相互共用,从学生的相互交换到学分的相互承认,从各种论坛的相继举办到各种活动的相继开展,人员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校际合作的内容更加务实,显示出了教育交流符合两岸教育界人士以及广大民众的心愿”。^⑤

由于长时间的分离和封闭,两岸教育政策差异明显,导致了两岸学子间相互认知的缺失。一方面,教育政策的差异导致两岸学生不同的认知。众所周知,公民的政治态度是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各种政治社会化活动中塑造而成。教育机构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特定的教育政策框架下,教育机构通过各种活动向学生输入特定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强化了学生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扩大或者改变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所确立的政治认知、政治价值取向。在两岸政治对立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自教育政策差别难以避免。公权力部门常常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民间社会不同的政治认知和价值取向。另外一方面,两岸学生因信息获取不足而缺乏相互了解。“台湾学生与大陆资讯的互动很少,自认为是‘低互动群’和‘从不互动’的合计达78%。去过大陆比例是14.5%。有七成以上表示学校没有提供大陆高等教育资讯,而他们获取大

① 陈重成:《全球化下的两岸社会交流与互动:一个从他者转向自身的历程》,《台湾远景基金会季刊》2008年第1期,第39—73页。

② 梁华杰:《由欧洲整合论海峡两岸整合可能模式》,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3年,第68页。

③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31日, http://www.fjzen.com/b/2008-12/31/content_2439170.htm, 2020年5月10日。

④ 贾庆林:《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09年7月11日, <http://www.chinanews.com/tw/news/2009/07-11/1770865.shtml>, 2020年5月10日。

⑤ 贺之军:《在“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西安论坛开幕致辞》,2007年9月5日, <http://www.huaxia.com/xw/zhxw/2007/09/362473.html>, 2020年5月10日。

陆高教资讯的最主要管道是网际网路。许多印象，两岸青年学生都是从教科书或新闻上得到的。”^①只有通过教育合作，才能促进两岸学子相互了解，逐渐降低意识形态的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要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教育机构承载这一重任。正如淡江大学黄天中教授所说：“若两岸要朝向统一之途径迈进，必须先从消除彼此敌对的价值意识入手。而学术、文化的交流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学术可以将真理客观化，有助于消除主观意识的对立。”^②平心而论，在两岸政治对立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两岸教育体系和内容都存在差异。“通过两岸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两岸人民对对方政治体系的认知和理解。教育交流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关系上的一种价值创造活动。”^③敌对的意识形态只会导致两岸情感分离和相互否认，而合作的现实主义态度可能会达成两岸同情的理解或者相互认可。除此之外，两岸高等教育合作原本就有诸多优势。两岸的一些知名公立大学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其中有些大学还秉承相同的校训，甚至系所设置上也保持一致，这就为两岸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此外，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也是推动两岸教育交流迅速发展独一无二的优势。

四、以青少年交流为支点追求共同复兴

青少年代表着两岸统一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培养文化自信，首先得从青少年开始。“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需要做好台湾青少年一代的工作。当今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不仅是塑造未来两岸共同民意和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环。贾庆林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讲话中强调：“青年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应当走在两岸交流合作的前列，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生力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了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两岸青少年群体的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积累了巨大的正能量。两岸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要通过切实解决好台湾同胞，尤其是青年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强年轻学子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台湾青少年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从根本上改善两岸关系，为两岸最终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然而，台湾青少年对祖国大陆认知相当缺乏。“在台湾2300万人口中，青少年人口约占1/3，他们长期生长在两岸敌对和隔离状态下，85%的人从未到过祖国大陆，65%的人表示对大陆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不了解，其生长环境、价值观和世界观都与祖国大陆存在很大差异，容易受到台湾当局歪曲宣传的误导。”^④他们经历了李登辉挑动省籍族群矛盾，塑造台湾“命运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过程，陈水扁八年执政时期陆续推行教育和文化的“去中国化”，以及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废除课纲微调，台湾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和错误的认知。另外，由于两岸相对封闭，台湾青少年也容易受到传媒的误导和民意调查的误导。在媒体的误导下，台湾青少年很难对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形成客观的认知，而在某些不客观、不公正、不认真的民意调查机构的误导下也容易产生错误的认知。在这种政策误导、信息失灵，加之社会舆论的多元扭曲背

^① 杨景尧：《两岸文教交流现况思考与展望》，“展望两岸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4年10月，第18页。

^② 黄天中：《两岸教育交流之现状与展望》，黄天中、张五岳主编：《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第432页。

^③ 贾馥茗、杨深坑：《教育学方法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第77页。

^④ 浙江绍兴政协市委会：《发挥古城优势，进一步加强绍台两地青少年交流工作》，浙江绍兴政协市委会六届一次提案，2008年3月31日。

景下,台湾青少年对两岸历史文化认知几乎陷入混乱,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日趋低下。为了还原两岸社会真相,培养两岸青少年未来的客观认知和共同价值情感,两岸青少年需要直接的交流和对话,通过社会实践来体验两岸社会真实,尽可能避免被人为政治操弄所误导。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陈猷龙指出,“两岸学生近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有利于排除沟通障碍,求同存异,达成更深的理解和信任”。^①

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在现有条件不足的情形之下,两岸双方应高瞻远瞩,从祖国的未来出发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毛泽东曾说过,“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来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介石)过来也有困难,应逐步地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②马英九在其就职周年记者会上重申,“台湾和大陆未来的关系应该由下一代决定”。^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行时强调“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他们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前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由此可见,两岸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新动力。因此,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文明复兴,就需要从青少年一代的认知和认同着手构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谁掌握了他们,谁就掌握了未来。能否加强对台湾青少年的中华文化教育,能否增强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凝聚力,是能否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④当前“在全球都热衷学习汉语的背景下,两岸语文教育交流与合作大有可为。在语文教育的目标上,两岸是一致的,借助语文教育培养更多具有中华美德和文化素养的青年精英,少一些功利,多一些品格,让两岸下一代更好地成长。”^⑤

五、文化自信背景下两岸民间文化融合的启示

“文化扮演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认同、团结和自我表达等多重角色,替政治斗争做了最好的代言,而不是政治斗争中超然的另类选择。”^⑥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两岸民间文化的“断层”或“失焦”呢?钱穆先生提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⑦在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公权力需要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积极开放地主导两岸民间文化整合。同时,在公权力尚未具备条件时,有必要依靠两岸民间社会来推动文化整合。“事实已经证明,两岸关系尚不具备彻底解决政治问题的条件。两岸政治问题固然重要,但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先搁置下来,在发展中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也是明智的选择……在政治问题已相对缓和的情况下,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点放在解决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上,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解决现阶段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⑧

蕴含在两岸民间共有的文化与情感语言完全可以穿透人为制造的政治围墙。“两岸文教研究学会”理事长杨景尧曾指出:“两岸高等教育的热络交流是挡不住的必然趋势……如果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不正常,台湾的高等教育本身也会是受害者……民间的这种热络交流,在我看来是一种规

① 林娟、朱力南、黄璇:《两岸高校紧携手,合作交流迎“浪潮”》,《两岸关系》2007年第1期,第52—53页。

② 《毛泽东主张“和平解放台湾”》,2003年11月22日,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11/22/content_5440643.htm,2020年5月10日。

③ 范凌志:《马英九称两岸关系的未来应由下一代来决定》,《环球时报》2009年5月20日,第1版。

④ 张映彬:《实施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作用与对策》,《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69—72页。

⑤ 孙冬雪:《让两岸的下一代更好地成长》,《两岸关系》2008年第4期,第57—58页。

⑥ [英]泰瑞·依格顿:《文化的理念》,林志忠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第49页。

⑦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2页。

⑧ 刘国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课题浅析》,《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4期,第1—6页。

律,是自然往这个方向演变,也不是说谁刻意去操纵的。年轻人想去,想看看大陆,想了解大陆。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①随着两岸民间文化教育交流的深入发展,一切人为政治围墙将会被推倒,两岸共同认同也因文化而生。台湾学者指出,“文化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文化可以突破两岸所有的防线,而台湾特色中华文化不仅在内部可找到新的认同基础,也可提供两岸从文化角度切入的议题。”^②随着两岸民间文化教育交流成果的积累,中国大陆和台湾两股中华文化合流,两岸中国人将更有文化自信,真正“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没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就不可能从苦难的历史走向辉煌的未来,由于近代中国的衰败,台湾被殖民入侵,一些台湾人觉得中国人很差劲,甚至一度不愿意做中国人,宁愿做日本的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回归中国。直到今天,一些台湾人的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如何化解台湾同胞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特殊心结,习近平总书记也开出了自己的“灵丹妙方”,那就是以“两岸一家亲”的亲情去换位思考,耐心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痛,以同理心去感受台湾同胞的历史境遇,以包容心去化解台湾同胞的心灵隔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熨平心理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但更有信心。亲情不仅能疗伤止痛,化解心结,而且能实现心灵契合。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已经崛起的重要时间节点,经济的自信还需文化精神领域的自信跟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在文化、价值观领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从单一到多样,从贫乏到丰富,从封闭到开放,从革命到改革,从无序到有序,从狭隘到包容,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变。中华传统文化和曾经的辛酸终究成为了两岸共同珍惜的历史的经验和记忆,走出文化阴影的两岸人民须共享中华文化的复兴,以自信的态度将内化为民主品格的中华文化遗产好、发扬好,共同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六、结语

伟达先生在《第三类把握》一书中提出,“在21世纪,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再清楚不过:振兴古老的文明,一改前150年的颓势,恢复自己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应有的特质、创造力和领导地位”。^③“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现阶段两岸理应携手合作,在文化上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两岸应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把中华文化推向国际社会,努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共同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杨锦尧:《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不正常伤及台湾自身》,2007年8月17日, <http://news.sina.com.cn/o/2007-08-17/154712403128s.shtml>, 2020年5月10日。

^② 马绍章:《两岸文化交流台湾需提振自信》,在“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意义与影响”座谈会上的发言,2009年11月, http://www.taiwan.cn/jl/wh/200911/t20091120_1148603.htm, 2020年5月10日。

^③ 伟达:《第三类把握:现代智慧启示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④ 俞新天:《两岸文化交流有成果也还有问题》,2013年6月30日, <http://www.CRNTT.com>, 2020年5月10日。

科技文化导向下的和谐生态伦理的建构

许 焯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 要: 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和谐生态伦理建构的指向。在科技文化的正确导向下,基于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建构和谐生态伦理必须遵循人本、生态、公正等基本原则,从“认识论”角度,拓宽和加深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从发展观的角度,把握“绿色发展”的方向;从方法论角度,实现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解决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和谐生态伦理;科技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 Q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2-0103-06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放在了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将“推动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层面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充分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从对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关切,到相关制度的完善,再到一种发展理念或模式的倡导,关注问题的日益深入和抽象,既是对实践的反馈和总结,又是理论日益成熟的表现。

目前,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伦理研究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流派、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等都从各个不同角度,试图弥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裂缝,实现生态化与现代化的有机和谐统一。生态伦理不仅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而且呼吁人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①。和谐的生态伦理是一种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德基础,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和谐生态伦理建构的指向。坚持文化自信就必须在科技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将现代科技文化融入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和谐生态伦理构建之中。

一、科技文化是和谐生态伦理建构的指向

科技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系统中相对独立的文化分系统,是人类心智凝结的一种智力文化,是“人类在科学技术这种认识和变革客观自然并使人类自身生活方式不断变革的特殊活动中所获得的

作者简介: 许焯,法学博士,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学报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

^① 吉静静:《“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伦理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4期,第150、151页。

成果总和”^①，既包括人类认识和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也包括科学技术活动的全部成果，集中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和精神功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境下，由科技精神与生态理性价值观念所构筑的科技文化努力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这是和谐生态伦理建构的文化基础。

（一）从逻辑起点上消除科学技术的异化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其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人类幸福增加福利。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异化问题日益凸显。“异化”可以简单理解为本末倒置，即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科学技术的异化表现在“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在“社会控制机制方面”发生的“质的变化”，即机器、技术等彻底控制了人，人不仅要充分发挥生产力，变成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还必须形成“消费力”，变成高速运转的消费机器。受此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壤等被严重污染，地球长期保持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些显然有悖于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不管是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水污染防治，还是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等，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合理利用科学技术，防止科学技术异化的先进理念。作为人类变革和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及其表达，科技文化的最大功能就在于教化人，帮助人们形成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和理念。科学技术是蕴含价值追求的社会事业，它需要科技文化的指引。科技文化是以消除科学技术异化为逻辑起点的，必须加强科技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努力消除科技异化，保证科学技术持续、健康发展。

（二）从方法路径上夯实和谐发展的理念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前提，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发展。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到农业社会对自然的学习与利用，再到工业社会对自然的开发与改造。当我们顺应自然规律做事时，就会更好地造福人类；一旦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受“科技万能论”和“技术决定论”影响，不受限制的科学技术让自然界伤痕累累，与此同时，自然的反噬也让人类的发展面临重重危机。要化解危机，必须以科技文化引导生态文明健康发展，防止科学技术滥用。现代科技文化提供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性的、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将科技发展置于科技文化理念的要求之中，强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和谐共存理念和互惠性价值观为支撑，加强全球性整体生态系统循环意识，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新模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五大新发展理念，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的新发展战略，与科技文化的价值观相一致。新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战略指引，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目标。要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科学技术发展纳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系统，以增强人与自然的和谐度为最高准则，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文化统筹协调发展。

（三）从价值追求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本质上讲，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固有的物质前提，人

^① 俞丽君、余发良：《科学技术文化的内涵及其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理论月刊》2013年第4期，第153—156页。

^② 俞丽君、余发良：《科学技术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兰州学刊》2013年第6期，第190—194页。

的发展也须臾不能离开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方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生态”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全面的阐述，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尤其是“自然具有先在性”的思想包含着深厚的生态文明底蕴。党的十九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充分体现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切科学技术都应应以善为目的。用科学技术重构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科技文化的价值追求所在，其与和谐生态伦理所提倡的“保护自然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追求相一致。然而在实践中，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让生态环境走向了崩溃的边缘，生态危机一触即发。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在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

一方面，科技文化为解决突出生态问题提供理性指南。强调实事求是与科学理性的科技文化理念认为，人们在面对突出的生态问题时，治理的必要性、技术的可行性与实施的可能性是需要统筹考虑的，必须遵循“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充分重视生态环境的协调，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的均衡与合理，力求实现最佳的生态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科技文化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建立。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与完善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是在价值追求层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中的环境评估必须包含环境损害、资源消耗、生态效益等合理标准，蕴含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不可缺位，要建立系统的环境保护制度，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体系，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同时，要全面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问责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要在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崇理性消费，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风尚。

二、和谐生态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

和谐生态伦理与科技文化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科技文化本身的人本、生态、公正等原则。

（一）亲和关怀的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但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单向受制约的纯粹客体。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相联系的中介形式，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由于人能够依靠自身实践获得生活资料。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要看到自己的主动性也要看到自己的受动性，既要依赖和尊重自然，又要利用和改造自然，将自身的主动性与受动性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改造自然。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同时提升自我，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样，人本原则是科技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之一。具体包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的最大利益，指引生态建设的目标和方向，确定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最低限度，要求生态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人的利益。以人为本的原则既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导原则，也是建设科技文化的价值指导原则。

第一，人类的科技进步、社会科技事业的发展，其出发点与终极目标都是为人服务的。因此，科技文化的人本原则是追求在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人对客观世界的自由与解放，使人类从“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人生存的痛苦，体现出科学技术的人道价值；二是科学技术向人道主义回归，主张还科学技术以亲和的、良性互动的“合情理性”为发展导向。

第二，科技文化的人本原则强调重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这里，以人为本表现为在提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全面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水平。在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实践中，科技文化倡导以人为本，以社会为重，强调协调发展，这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文化建设都十分重要。科技文化建设应当以人道主义为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科技进步真正成为人类的

福祉。

第三,建立和发展体现科技文化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必须建立在科技文化人本原则的基础上,应当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动态性与可操作性,必须适应现代生态科学技术发展方向,能应用最新的技术方法与设备获得的成果,用以评价其对社会生态环境是否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二) 天人合一的生态原则

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强调人与自然万物为有机整体,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告诫人们需尊重万物生长的规律,不可肆意获取自然资源。《论语·阳货》也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充分强调了世间万物的内在关系,指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荀子·王制》云:“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①。荀子所说的正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向自然索取时应遵守适度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生态良性循环和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文化的生态原则就是关怀生态系统的平衡,重视人、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生态原则拓展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调整范围和发展空间,也确立了科学技术发展与实践应用的最高限度。

科技文化突出生态关怀,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与应用与生态环境相容,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生态价值与科学技术应用的生态化,以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协调发展。科技文化倡导生态价值观,它既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又注重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种生态文明价值观,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助于保护而非危害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

新时代和谐生态伦理的构建要坚持生态原则,就要努力践行生态价值观,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展人类改造自然的的活动,创造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加强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生态审查是促进科技进步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屏障。

(三) 良性互动的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现代科技文化与新时代生态建设良性互动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并明确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更加明确“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这些措施和制度,清晰表达了科技文化与新时代生态建设良性互动的公正原则,体现了新时代生态建设需要制度的公正。科技文化和新时代生态建设要保持良性互动,必须从制度层面来构建。

首先,科技文化的公正原则规定着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强调在资源利益分配方面建立人际间和区域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坚持科技文化的公正原则,就应建立一个适应生态建设的全面保障体系,包括强化法规、生态补偿、区别发展、司法救助等。

其次,科技文化的公正原则还规定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行为和基本的权利义务。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平等和自由,主要功能在于“确保平等”和“确保自由”^②,使每一个守法的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尊严、自由、平等、幸福等。科学技术的最高宗旨就是造福人类,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形式、速度和规模都必须考虑到公正与公平。在新时代生态建设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0日,第02版。

^② 吴忠民:《社会公正与中国现代化》,《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8页、242页。

中,要真正体现公正原则,一要对科技活动的成本、效益和风险进行公正分配,二要使科技成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共享。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更加自觉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利益分配的不公正。

三、科技文化导向下的和谐生态伦理建构路径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兴衰论”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联系,强调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科技文化的深刻内涵除了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和对于自身的认识之外,还具有认识物质世界的实际价值。

(一) 拓宽和加深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

发挥科技文化的认识功能,不断拓宽和加深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为和谐生态伦理建构提供基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人们以科技文化为标准,确立自己对自然的行为限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过分张扬了人的主动性,以“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姿态谋求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以科技的革新为主要手段提升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强行冲破自然的警戒线。作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成员,人类有保护共同家园的责任,必须彻底抛弃“违反自然”的生存方式,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对自然进行保护,从而兼顾人类生存发展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因此,要立足发展实际,解决好科技文化“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发展已经跨越了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意味着要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推进绿色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这种发展才是符合规律的、可持续的发展。一是要实现科学技术的高质量发展,使其在推动经济增长、满足人民需要、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全面地考量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将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发展。三是要强化生态伦理意识。由于生态系统不可切割、生态后果不分疆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涵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采用多种形式,将生态科技文化的理念融入到群众性活动中,使社会成员在参与中陶冶生态文明情操,在社会文化活动中提升自身的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素养。

(二) 把握“绿色发展”的方向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想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要把一切经济活动和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给自然生态环境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要全面理解科技文化对“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的战略意义,就要积极倡导并牢固树立科技文化观、新发展生态观和全球利益观。

第一,要彻底改变陈旧的发展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新发展生态观变革之路的核心,体现在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经济发展模式上。从现象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口、技术、经济增长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人口的增长、技术的盲目发展和经济的快速扩张都会带来很大的环境压力。新发展生态观在“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态度、发展方式、发展行动等方面达成协调一致”^①,共同创造出富足充裕的成果并共享。

第二,在科技文化导向下,积极践行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绿色发展观引领社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是绿色发展理念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的具体体现。落实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在于转变环境治理理念、

^① 刘红玉、彭福扬:《论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31—134页。

改进治理方式。各级政府部门要根据区域间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安排政策，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实现绿色治理，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鼓励支持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第三，要树立全球利益观，积极探索全球生态治理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国家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科技文化发展的全球性特征毋庸置疑。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要树立全球利益观，突出生存权、发展权、创造权和平等权，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藩篱，强化全球一体意识，以生态建设项目为契机，倡导各国进行绿色外交，相互包容、交流借鉴，健全全球生态治理机制。国家不是一个单独的主体，而是命运共同体中的一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成果共享的全球生态文明共同体。

（三）实现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

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当前全球面临的臭氧层空洞、气候变暖、森林面积锐减、淡水资源减少、土地荒漠化等生态危机，对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已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先污染、后治理”甚至“已污染、未治理”一度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集体无意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激烈矛盾在世界各地纷纷上演，且愈演愈烈。世界各国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治理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必须协同合作、共同承担。因此，要积极运用科技文化的“方法论”，实现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更好地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

首先，实现科技创新理念的生态化。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还是“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和高瞻远瞩的五大发展理念，它们无一例外地高度回应了“科学技术生态化”诉求。新形势下，生态化理应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必然诉求。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是在科技革命过程中将科技文化作为导向、生态价值作为核心，既保证科技发展的经济价值，又确保环境优美和生态平衡的生态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创新新格局。绿色环保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微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的应用等都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的创新与发展。

其次，实现科技创新过程的生态化，将生态效益融入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新形势下，一是科技创新主体必须要实现从传统社会的“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换，积极践行科技文化共同体理念，全面提高素质。二是科技创新全过程要把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减少经济负外部性，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创新经济增长点，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优质化和技术进步。三是要从整体性出发评价科技创新效果，寻求人与自然的“双赢”。^①

第三，将循环整体性分析介入科学技术创新思维方式。科技创新必须基于具有自组织、自调控、自发展性质的地球系统，不是由部分组成整体而是由整体统摄部分，整体性存在于动态的结构和功能中。科学技术创新必须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

总之，构建尊重和关心生命的共同体，维护生态系统完整，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的生态伦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公民是否具备科学素养的重要标志。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应以科技文化为导向，构建和弘扬生态伦理道德，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还要把科技文化和生态伦理融入中国文化，契合中国民众的价值需求，凝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李国锋、林美卿：《新时代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方略》，《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95—101页。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贺麟文化观探析

龙 飞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 贺麟的文化观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学习, 尤其是从哲学层面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解读, 他提出的“体用合一”的文化体用观、“返本开新”的文化继承发展之法, 对文化重要作用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去认识和探析贺麟文化观, 对当今中国如何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化, 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现实性上为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等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 文化自信; 贺麟; 文化观; 理论价值;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2-0109-07

贺麟 (1902—1992), 四川省金堂县人, 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 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创立的新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贺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及西方文化的研究, 提出了返本开新、学术救国、文化体用观和吸收西方文化补充发展中国儒学等方面的文化观, 这对于新时代培养中国文化自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及成都建设文化名城和中国哲学小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贺麟文化观中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贺麟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注重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体用观、学术文化救国论和返本开新的文化观, 这其中贯穿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重视之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 以“体”为主, “体用合一”的文化体用观

贺麟文化观的首要观点是其独特的文化体用观。贺麟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概念, 指出要实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 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体”和“用”。在贺麟看来, 文化一般分为两个层面表现: 一是现象和表象, 也就是文化的“用”; 二是本质和精神, 即文化的“体”。“贺麟在《文化的体与用》中认为, 精神是文化真正的本体, 精神在文化哲学中居于‘主要、主动、主宰’的地位, 精神具有主客观统一、体用合一、兼为主体和文化本

作者简介: 龙飞,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23页。

体的特殊性质,同时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所以它对于文化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①贺麟通过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发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于“体”,中国文化之所以在近代以来没落的原因就是“体”的丧失,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和做法,严重冲击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精神。因此,贺麟对新文化运动这种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持批判态度。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而历久弥新正是由于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尚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重整体倡协同、崇古重老、重道轻器,等等。”^②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重合之处,当然,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要说明的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民族精神的发扬和继承也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文化自信的培养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着手,同时要兼顾中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讲,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

贺麟文化体用观的方法论是“体用合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体用不可分离。‘凡用必包含其体,凡体必包含其用,无用即无体,无体即无用。’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均包含体和用,不应作人为的分割。第二,体用不可颠倒,即不可以用为体或以体为用。第三,各部门文化‘同是一个道或精神的表现’,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着这个道或精神,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文化整体。”^③贺麟根据“体用合一”的方法论原则,批评了当时中国文化界产生的“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等观点,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他的理想文化模式——‘真文化’,展示了他文化观的超越性”。^④贺麟的真文化概念提出要以人类文化精神的共性和最高追求“真善美”为体,“以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为用”。^⑤这表明贺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文化模式应该是以追求真善美为最高目标,吸收汇聚融合中西文化精髓的文化发展方式。文化的发展要有自己的根基和追求,但不能固步自封,要海纳百川。

(二)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之法——“返本开新”

贺麟文化哲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是“返本开新”。贺麟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化特别是新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要做到“返本”,即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返本开新’既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态度,只有在充分掌握已有的资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真正的创新。”^⑥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发展和积累,在天文历法、文学哲学、医学地理、书法绘画、饮食服饰等方面都有深厚积淀,并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和崇高地位。新时代,中国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必须要做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只有在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推陈出新,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贺麟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发展新文化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即所谓‘有渊源’。贺麟对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不能完全割裂新旧文化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可能在彻底打倒旧文化之后再另起炉灶搞新文化建设,这种想法不但是有害的而且是不可能的。”^⑦贺麟对于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彻底打倒旧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观点持批评态度,在

① 柴文华、马庆玲:《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第39—42页。

② 李宗桂:《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252页。

③ 柴文华、马庆玲:《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第39—42页。

④ 柴文华、马庆玲:《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第39—42页。

⑤ 柴文华、马庆玲:《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第39—42页。

⑥ 韩柱、邵宛梅:《贺麟的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以〈文化与人生〉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4页。

⑦ 韩柱、邵宛梅:《贺麟的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以〈文化与人生〉为例》,第14页。

贺麟看来，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旧有文化基础之上的，抛开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精神的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站不住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一直都是精华，其中必然有其糟粕，比如“三纲五常、三妻四妾、女性地位低下”等，但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糟粕就全盘否定，而要去挖掘其中蕴含的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古为今用。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体”是正确的，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体”和“用”。

“贺麟又很重视思想文化的承继与创新的内在融合，明确指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① 贺麟认为要实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必须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学的新开展和中国文化的复兴都要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一旦抛弃这个传统，从头再来，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创新的根基。所以，贺麟文化观和同时代思想家的文化观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大多数人主张“西化”，而贺麟主张“化西”。中国近代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导致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全面衰落，任人欺凌，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进行了反思，大多数思想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文化也不如人，所以需要以西方文化（包括平等、民主、自由、理性、科学等）为主要模式进行文化的重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主张打倒一切旧文化，全盘西化。贺麟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体”是必须要继承和发展的，离开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去重建中国文化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不仅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反而对中国文化有害。贺麟反驳了“西化”的观点后，提出自己的主张——“化西”。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要在坚持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也就是要在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和本质之基础上，将其有益之处吸取转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贺麟的这一文化主张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文化的作用——学术救国论

贺麟文化观的第三个重要观点是提出了文化学术救国论。贺麟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失去了应付新文化的能力，因此，“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② 贺麟认为中国近代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危机，之所以山河破碎任人欺凌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落后了，也就是传统儒学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再加上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文化发展缺少了必要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有鉴于此，贺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倡导‘学治’即‘学术治国’，这源于他学术文化的视角与思维。他曾说：‘老实说，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袭，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而中国之所以复建国之展望，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以数千年浓厚的文化基础，与外来文化接触，反可引起新生机，逐渐繁荣滋长。’因而，他十分强调德治必须以学治为基础；要有以真理与学术作基础之真正德治，就要在整个民族生活中形成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氛围与学术文化。”^③

对于贺麟的上述观点，也需要辩证地认识。就他提出的儒学要与时俱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补充发展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归根于中国文化的危机则是欠妥的。中国文化在近代确实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也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的确暴露了自身的一些弊端，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但远未达到成为造成中国危机的根本原因的程度。这是在研究贺麟文化观时应该

^① 吴仰湘：《贺麟对中西哲学的融贯创新及其学术建国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92页。

^② 柴文华、马庆玲：《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第39—42页。

^③ 赖功欧：《返本开新：贺麟文化哲学辨析》，《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6页。

注意的一个问题：要正确看待文化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既不可忽视，也不能夸大。当然，思想家是生活在自己所属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必然有其局限性，今人在评价时不能太过苛刻。

贺麟作为一代哲学大师，不仅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方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儒学的发展，同时，他所秉持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观在今天看来仍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贺麟文化观的理论价值

“贺麟指出，西方文化的传入是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重要契机之一，若能抓住这个吸收融会西方文化以充实和发展儒学的机会，儒家思想必能获得新生。”^① 贺麟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除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要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就要开展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和互鉴是文化发展创新的重要条件和环节。中国历史上凡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必是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之所以落后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加之没有正确看待西方文化的传入，不加选择地盲目排外，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衰落。

新时期，培养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贺麟的中西文化观是重要的理论资源。结合新时代的国内国际形势，深入挖掘研究贺麟文化观中的文化交流思想对于今天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必有重要裨益。

（一）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化西

贺麟指出，对于西洋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正确认识它的作用和本质，这是导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他明确提出西洋文化的传入将对儒学的新开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② 但是，在贺麟的时代，对于西洋文化常常处在两个极端中：即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贺麟对于这两种态度都持批评态度，提出对于西洋文化要正确认识它的本质，仔细研究它的精神，准确把握它的内涵。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也不能不加思考、全盘西化。只有在正确理解西洋文化的本质和基础之上，找到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引进其对中国文化创新开展有益的积极成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文化复兴问题，才能应对近代的文化危机。

贺麟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③，并反复强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④ 要做到贺麟提出的“彻底把握西洋文化”，首要前提就是要对西洋文化持有正确态度。要变革以前的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思想，理性地、客观地研究和了解西洋文化的本质和精神。这一思想对于今天培养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在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文化年、文化节、艺术节、巡回演出及孔子学院为主要载体和平台，不断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取长补短，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发展中国文化，真正做到贺麟提出的“化西”。

（二）研究外国文化的方法——体用并重

贺麟文化观中除了上述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之外，他提出的关于如何认识和研究外国文化的

① 柴文华、马庆玲：《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第39—42页。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页。

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7页。

④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7页。

方法也值得注意。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一文中，贺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总结了过去中国人认识和研究西洋文化的不足，二是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首先，贺麟总结了中国人在近代认识和研究西洋文化的不足是“我们认识西洋文化，一向只看外表，从外面去了解，而没有把握住西洋文化的核心”。^①正是如此，中国近代对西方的学习虽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进步，但总的来说没有学到西洋文化的本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也是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因为对西洋文化的学习借鉴停留在表面上的器物 and 制度，而没有深入了解和研究隐藏在其背后的理想、民主及宗教精神。贺麟的这一看法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交流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启示今天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能浅尝辄止，而要深入研究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精神。只有真正把握了其文化精神，才能很好地为我所用和吸收融合，囫圇吞枣式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其次，贺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研究方法。“要研究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体有用的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②贺麟的文化体用观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体”和“用”两个层面，“体”指的是精神和本质，“用”指的是现象和具体的东西。中国人在近代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学习仅仅停留在“用”的层面，贺麟则认为要体用并重，仅仅重视“用”的研究，对于文化的发展和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交流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我们不能只注重表面现象，不可盲目引进和跟风，如热衷过“洋节”等现象就值得我们深思。此外，贺麟的文化研究方法对我们理性认识和对待外国文化也有一定积极意义。

最后，贺麟特别关注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这一点也是他较之同时代中国其他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点。贺麟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西洋文化的根基所在，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西洋文化的“体”，就必须研究基督教文化。贺麟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中列举大量事实论证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从科学、民主、工业化三个方面解读了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重大贡献，并得出如下结论：“西洋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③所以，贺麟非常重视研究基督教文化，而且批评了忽略基督教研究的做法：“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知。”^④虽然，贺麟可能过高估计了基督教的作用，但他重视基督教研究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而且我们也应该正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和独特地位。

贺麟本着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学术良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文化角度对儒学复兴和救国兴邦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新时代，从文化自信的视域下重新审视贺麟的文化观，对我们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贺麟文化观的现实意义

从文化自信的视域来看，贺麟的文化观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理论借鉴，尤其是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正确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正确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⑤文化自信的根基深植

①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304页。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305页。

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310页。

④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310页。

⑤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正如贺麟所说,“返本”才能“开新”,所谓的“本”指的就是要重视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大力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之所在。贺麟的文化观启示新时代的文化理论工作者要在理论研究中坚守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本质内涵,做一个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文化理论工作者。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累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在文学、医学、天文、地理、农学、哲学、饮食、服饰等方面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正是这些历久弥新的文化资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要始终坚持在认真深入学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不可丢弃中国文化的血脉,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利用新媒体和大众传媒等途径,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通过《中国古诗词大会》《朗读者》《经典咏流传》《中国味道》等电视节目平台做好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最后,真正重视文化在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文化放到指引民族发展前进、国家繁荣富强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度,将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贯穿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 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新时代,贺麟的文化观启示我们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上,不但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不断借鉴和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问题,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过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全盘西化论和全盘否定论。全盘西化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的全面否定是不可取的;全盘否定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样是不可取的。贺麟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我们既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要分清文化的“体”和“用”,透过文化现象,把握文化精髓,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敞开心胸,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正如贺麟所说:“我们不需要狭义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文化的自身,我们需要真实无妄有体有用的活文化真文化。”^①

我们要重视对外国文化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不能搞“文化本位主义”,闭门造车、夜郎自大。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就是因为闭关锁国导致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落后造成的。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借鉴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在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充实、发展本国文化,做到贺麟所讲的“化西”,从而让优秀的外来文化为我所用。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化交流互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②“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们的愿望。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作为新时代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必须要在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人类文化异彩纷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文化交流互鉴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① 张学智编:《贺麟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②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33页。

（三）正确认识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据贺麟的观点，民族复兴的本质是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文化在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①可见，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稳步前进，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智力支持，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建设事关国家和民族发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早在1942年，毛泽东曾就文艺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和价值取向，为当时和之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极大促进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促成了一大批文化学术精品的诞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第一次开始把文明文化事业和国家经济建设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江泽民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说明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把文化作为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并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贺麟先生作为中国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著名哲学家，他从研究哲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学术观点。时至今日，贺麟的文化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文化强国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时代，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再次审视贺麟的文化观，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尤其是从哲学层面对中西文化提出的“体用合一”的文化体用观、“返本开新”的文化继承发展之法以及对文化重要作用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对当今中国如何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于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发展研究

中缅关系 70 年的经验启示

林 永¹，杨宝康²

(1. 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摘 要：中国和缅甸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历久弥坚。70 年来中缅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我们留下很多经验启示，主要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奠定了中缅关系长期友好的基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谋发展是中缅关系的主要特点；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航程；共同构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标志中缅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云南省在中国发展对缅关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中缅关系；70 年；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822.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2-0116-05

2020 年是中缅建交 70 周年。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他在中缅建交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的致辞中强调：“中缅关系已进入新时代，双方要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遵循，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夯实政治互信，扩大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使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胞波、好伙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将中缅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国和缅甸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历久弥坚。中缅两国建交 70 年来，中缅领导人友好互访持续密切，中缅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奠定了两国关系长期友好的基础，为新时代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中缅关系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由周恩来总理在 1953 年 12 月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随后在第一项和第四项的措辞上作了修改。1954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缅甸成为与中国、印度一道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为推动建立客观、公平、合理、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独立后的缅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在冷战初期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展开的，缅甸于 1949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阈下中缅边民跨境交往研究”(YB2019049)。

作者简介：林永，普洱学院科技处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杨宝康，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国际低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边疆历史。

年 12 月 16 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 1950 年 6 月 8 日与中国正式建交，是国际上最早承认新中国和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以来，中缅领导人保持着友好互访的良好传统，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都曾经到缅甸进行友好访问，缅甸领导人吴努、奈温、吴山友等也曾经多次访华。即使到了今天，缅甸社会各界依然流传着陈毅“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名句。周恩来总理 9 次访问缅甸和奈温 12 次来华访问的历史更是被两国人民传为佳话。

20 世纪 50 年代，缅甸外交政策的基点是在中立主义的基础上谋求本国的利益。^① 缅甸与中国、印度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中立，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允许外国在缅甸驻军，更为重要的是不干涉他国内政。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中印关系恶化，美国持续对华制裁施压。在此背景下，缅甸始终与中国保持着难能可贵的友好关系。中缅建交 70 年来，除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曾经有过短暂的不愉快之外，其余时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和缅甸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日益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②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不断向纵深演进，国际形势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各自主权、安全、稳定和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加突出。2020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缅甸时，在相关国事活动中多次忆及中缅老一辈领导人的深情厚谊，特别讲起周恩来总理 1954 年访缅时同缅甸总统巴宇、总理吴努亲切交谈的一张照片。^③ 访缅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缅甸领导人强调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携手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难看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的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扬帆启航，展现出历久弥坚的勃勃生机。^④

二、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奠定了中缅关系长期友好的基础

1960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主要内容是中缅界务北段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划归中国；在中缅界务中段，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划给缅甸；作为互换，在中缅界务南段，将班洪、班老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归还中国。缅甸成为第一个和我国通过互谅互让、友好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国家，1960 年作为“中缅友好年”载入史册。随后，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生效，中国政府向大约 120 万缅甸边民赠送了 240 万米花布和 60 万个瓷盘；缅甸政府则向大约 100 万中国边民赠送了 2 千吨大米和 1 千吨食盐。^⑤ 同时，为配合勘界工作，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在缅甸政府的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进入缅甸北部地区，与缅甸政府军共同打击盘踞在缅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这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联合行动，客观反映了当时中缅两国关系的不同寻常。^⑥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和由此形成的利益攸关，奠定了中缅关系长期友好的基础。

① 贺圣达：《中缅关系 60 年：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东南亚纵横》2011 年第 11 期，第 12—20 页。

② 习近平：《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③ 郝薇薇，霍小光：《中缅共命运 胞波情谊长——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 25 小时》，《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④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8 日电：《莫道君行早 是处有亲朋——习近平主席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缅胞波情谊步入了新时代》，《光明日报》2020 年 1 月 19 日，第 1 版。

⑤ 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第 72—81 页。

⑥ 贺圣达：《中缅关系 60 年：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第 12—20 页。

首先是地缘相近。中缅两国有着 2210 公里边境线,使中缅关系拥有“远亲不如近邻”的厚实基础。作为山水相连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的邻国,中缅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20 世纪 60 年代,陈毅曾经赋诗“胞波感情重,江水溯源长”。其次是人缘相亲。中缅跨境民族主要有汉族、回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布朗族、苗族、瑶族、哈尼族等 15 个民族。^① 中缅跨境民族中,中国的汉族与缅甸的果敢族同源,中国的佤族与缅甸的佤族同源,中国的傣族与缅甸的掸族同源,中国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同源等等,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或相近的民族语言,不仅是跨境民族维系民族情感的无形纽带,而且是中缅边民频繁跨境交往的文化动力,一定意义上还是促进中缅关系发展的润滑剂。第三是文缘相通。从语言谱系来看,缅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两者之间有不少词汇的发音相似,缅语与藏语、彝语同样有着很近的语言亲属关系。从体质人类学来看,缅族与汉族都同属南蒙古利亚人种。从文化习俗来看,缅族和汉族都注重礼仪,热情好客,表达含蓄。^② 中缅关系 70 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和缅甸有着唇亡齿寒、命运与共的关系。

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谋发展是中缅关系的主要特点

周边国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求和平、谋稳定、促发展是周边地区的主要特征,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③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两国不仅有长达 2210 公里的边界线,而且,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源远流长。中缅关系中,安全和发展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中缅在尊重和保障彼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始终致力于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近年来,在“亲诚惠容”理念指引下,中缅关系呈现出积极健康发展态势,中缅感情越来越亲,中缅两国以诚相待,中缅两国的互惠互利合作深化,中国倡导包容互鉴,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繁荣,为周边外交带来了新气象。2020 年正值中缅建交 70 周年,习近平主席新年首访缅甸,凸显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国对发展中缅关系的高度重视。

2020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会谈时强调,中国是值得缅方信任的好朋友,中方将继续在国际上为缅方仗义执言,支持缅方维护国家尊严和正当权益。同时,中方支持缅方推进国内和平进程、实现民族和解,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昂山素季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双边和国际层面给予缅方宝贵理解和支持,对此,缅甸人民铭记在心。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公平正义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国家以人权、民族、宗教问题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但缅甸决不接受这种施压和干涉。希望中方继续在国际场合为缅甸等中小国家主持公道,为推进缅甸国内和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④

中缅两国有句共同的谚语,“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⑤ 我们发现,习近平主席对缅甸的国事访问在中缅友好交往史上已经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下也必将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特别亮丽的底色。

四、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航程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先导项目,中缅油气管道于 2010 年 6 月开工,其中天然气管

① 付永丽:《论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保山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69—72 页。

② 李晨阳:《中缅关系的脉络和逻辑》,《世界知识》2018 年第 2 期,第 18—19 页。

③ 卢光盛、别梦婕:《新型周边关系构建:内涵、理论与路径》,《国际观察》2019 年第 6 期,第 22—42 页。

④ 杜尚泽、丁子:《习近平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会谈》,《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9 日,第 1 版。

⑤ 习近平:《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

道于 2013 年投产运行，原油管道于 2017 年投产运行。目前中缅油气管道每年可输送天然气约 60 亿立方米，输送原油超过 1000 万吨。^① 总长近 800 公里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有效保障了沿线能源供应。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致力于推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而缅甸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2017 年 5 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双方在共同发展的理念和合作共赢的目标方面观点一致。2017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与昂山素季在北京就“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达成共识，双方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则，加强交流合作，强调互利共赢。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相关事务，2018 年 12 月，缅甸成立了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昂山素季亲自担任主席。2019 年 4 月，昂山素季到北京参加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缅构建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政治与人文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习近平主席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进一步加强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这必将为中缅经济走廊沿线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缅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主动向缅甸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缅甸推进国内和平进程，增强了亲和力和感召力，两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正逐步形成，共同翻开了中缅友好关系的重要篇章。

五、共同构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标志中缅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中缅两国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2000 多年前，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厚重的历史、秀美的风光和琳琅满目的货物，就把中缅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拉开了双方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帷幕。如今，缅甸又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交汇点，承载着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任。2011 年 5 月，中缅正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昂山素季率领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时指出，中缅传统友谊历经风雨从未改变，两国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2 月，中缅就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达成共识，并在 2018 年 9 月签署了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

2020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内比都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举行会谈，中缅双方一致同意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中缅关系迈入新时代。当前，中国和缅甸要加强对各领域交流合作进行系统谋划并加以落实。一是加快发展对接，建好经济走廊。二是聚焦龙头项目，加强互联互通。三是扩大贸易投资，密切地方合作。四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② 昂山素季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极大深化缅中胞波情谊，促进两国务实合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访问。昂山素季还表示，缅方愿积极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全力落实皎漂项目，加快推进交通、能源、产能、人文、边境、地方等领域合作。

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缅关系已经具有非常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前景。在缅甸的多边外交中，中国和缅甸在地缘政治、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决定了中缅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面对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和缅甸发展对外关系的新形势，中国要巩固、发展和加强对缅关系，关键还在于既要重视共同安全也要注重共同发展，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巩固、扩大和提升中缅两国的共同利益。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缅随着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命运与共的胞波情谊必将更加和美醇香。

^① 袁梦晨，车宏亮：《中缅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云南日报》2020 年 1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杜尚泽、丁子：《习近平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会谈》。

六、云南省在中国发展对缅关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缅边界线全长2210公里,其中中缅边界云南段1997公里,西藏段213公里。缅方一侧为克钦邦和掸邦,其中部分地区长期以来由民族地方武装控制。此外,中缅边界两侧居住着傣族(掸族)、佤族、景颇族(克钦族)等共15个跨境民族,给中缅关系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复杂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在中国发展对缅关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56年12月16日,中缅边民联欢大会在德宏芒市举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缅甸吴巴瑞总理、缅甸政府军总司令奈温等参加了联欢。15000余人参加的中缅边民联欢大会不仅充满了和平友好的气氛,而且创造了中缅边民友好交往的典范,成为中缅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提出,希望云南努力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5年来,云南各族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着力深化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大路通过云南这个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不断延伸。

多年来,缅甸是云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同时,云南省也是中缅贸易中中方的第一大贸易省份。2017年,滇缅贸易额达63亿美元,占中国对缅甸贸易额的48%。2018年,滇缅贸易额超过65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缅甸贸易额的50%。同样是2018年,在同云南省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的63个国家(地区)中,缅甸的结算量最大,结算量为200多亿元人民币,占比为35.31%。^①2019年上半年,滇缅贸易额达41.64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据海关统计,2019年,云南面向缅甸的主要口岸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孟定口岸(包括清水河口岸及芒卡通道等通道)进出口贸易总值达52.41亿元,首次突破50亿元大关;作为中缅最重要陆路口岸的瑞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24.3%,保持稳定增长势头;腾冲口岸(包括猴桥口岸及滇滩通道等通道)的进出口货运量、贸易额均达到约80%的同比增长幅度;2019年前11个月,孟连口岸进出口货物货运量实现了90%的增长。^②作为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主要省份,云南省是中缅友好交往的实践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谐共处的守望者。自2008年首次与缅甸开展电力贸易以来,南方电网云南国际公司已累计向缅甸售电8.18亿千瓦时。自2013年以来,在云南和缅甸之间轮流举办的中国云南—缅甸合作论坛,在双方沟通协商合作、增信释疑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自2016年至今,云南医疗队帮助1800多名缅甸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2018年,云南省共有82所对缅开放的国门学校,缅甸在云南省高校就读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人数为3499人。2019年,第二届中缅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召开,走廊北端起点云南省的作用受到各方期待。^③缅甸民众用“金银大道”形容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中缅边境两侧的边民则同根同源。我们相信,未来可期,云南省在中国发展对缅关系中将继续发挥得天独厚的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李莎:《滇缅之间贸易投资外经合作更加便利》,《云南日报》2019年2月13日,第1版。

② 刘子语:《活力口岸为中缅经贸添动力》,《云南日报》2020年1月19日,第3版。

③ 韩成圆:《滇缅:同享“一路”情共绘“一廊”美》,《云南日报》2020年1月19日,第3版。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0年培训班开班式

徐彬出席并作动员讲话

6月15日，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省社院）2020年培训班开班式在学院三楼报告厅举行。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院院长徐彬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智，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国才，省社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及副院长陈友康、杨春禄出席开班式。省社院党组书记蔡勇主持开班式。

徐彬指出，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抓好“六稳”“六保”工作的关键时期，省社院新学年培训班正式开班。他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省社院对各位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特别是疫情期间关心支持社院做好疫情防控和教育培训工作的各有关单位、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过去一年多以来，省社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社院工作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和第十二次全国社院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在中共云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统战部的关心指导下，在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级统战团体的大力支持下，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社院姓社”，强化政治培训，凝聚政治共识，共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43期，培训学员3364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徐彬强调，今年是“大考”之年，在“大考”中聚焦目标任务，统一战线加强学习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形成合力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在6月11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国华同志代表省委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调研座谈会上，也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筑牢共同政治思想基础，全面提高五种能力，推动云南跨越发展。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省社院要认真学习，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和工作实践中。

徐彬就省社院做好今年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三个方面的意见：一是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要坚持“社院姓社”的办学方向；要把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作为主要任务。二是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深化教研改革，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的主阵地作用。要巩固深化教学改革成果，推动科研工作提质增效，做实做强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推动形成全省社院（校）一盘棋的良好局面。三是落实教育培训“三严”要求，树立良好学风，学以致用，推动统战工作新发展。要树立学员意识，遵守培训纪律；要突出实践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发挥积极作用，推进统战事业蓬勃发展。

省社院一级巡视员袁光兴，省社院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省委统战部相关处室负责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第1期）、省民宗委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学院全体教职工参加开班式。

（文字：肖莉莉 图片：罗雷 责编：朱家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 1999年创刊)

2020年6月 第2期(总第86期) 第22卷

主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 650031
电子邮箱: ynsyxbbjb@163.com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 Started in 1999)

June 2020 No.2 (Sum.86) Vol.22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 No.221 Wu Yi Road, Kunming City, PRC
Post code: 650031
E-mail: ynsyxbbjb@163.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 5300004000090
出版日期: 2020年6月20日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03

定价: 9.00元